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THE LURE OF DIASPORA:  
A CRITICAL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WEI YUN'S  
DIASPORIC WRITINGS**

离散的诱惑：  
马华作家韦晕的离散书写

**LEE WAN 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2018**

**The Lure of Diaspora:  
A Critical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Wei Yun's Diasporic Writings**

**离散的诱惑：  
马华作家韦晕的离散书写**

**LEE WAN RONG**

李琬容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18**

## 谢辞

首先，我要向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张松建教授，表示真挚的感谢。两年前报考研究生，从草拟计划书，到后来的选题、定题、撰写到最后定稿，张老师在过程中都不断向我推荐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也不厌其烦地提供我修改建议和指正，在此心怀感激。张老师秉持着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而有机会与老师交流论文以外的学术与人生的看法，有助于拓展我对科研的兴趣，这期间也让我看见自己的不足之处，未来将继续虚心学习。张老师的博学和耐心，启发了年轻学人投入学术必须要有的毅力和视野，他的教导，将会铭记于心。

再者，我要感谢衣若芬老师、关诗佩老师、方小平老师、丁珍珍老师、魏月萍老师、严寿澂老师，李气虹老师，以及南大中文系的老师，无论在科研知识或生活上，都给予我指点和鼓励，并从中获益良多。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匿名评审老师拨冗宝贵时间，给予了本论文不少的细致建议和评论，不时提醒了自己还有不少有待进步的地方。

此外，谢谢马来亚大学于2016年主办的研习营，这场为期三天两夜的研习营，让我有机会与马来亚大学的张惠思老师、台湾中央研究研究所的李有成老师等等，以其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同学互动。在几次的交流过程里，也使我更能体会不同区域学人视角里对华文文学的理解及其治学方法。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同学鼓励，尤其是周昊、筱雯、征达、思娴、忠明、维阳、云飞，和森林学长的支持，以及南大、国大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员，在我搜寻资料和写作方面，提供了热心的帮助。

## ACKNOWLEDGEMENT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eful to my thesis supervisor , Dr. Zhang Songji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TU, Programme of Chinese, whom providing critical comments and encouragement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of writing. Throughout the past years of guidance, Dr. Zhang had given m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broaden my academic horizon and interests, which included the imparting of intellectual knowledge, engaging discussions o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and th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These had enhanced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beyond.

Also, I thank Associate Professor I Lo-fen, Associate Professor Uganda Kwan, Assistant Professor Fang Xiao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Ting Chun Chun, Dr. Ngoi Guat Peng, Dr. Yan Shoucheng and Dr. Lee Chih Horng, for their concerns and the sharing of valuable academic experiences. Thank you the two anonymous examiners whom given detailed comments to make improvements on my thesis.

Moreover, thank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for hosting the symposium in year 2016. The interaction with professors and young scholars from local and overseas, through discussions in various literary key topics, allowed me to gain more insights and knowledge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st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goes to my family and classmates for their unconditional and pivotal support, without them, my postgraduate studies would not have been made possible. Last but not least, my appreciation to the NTU and NUS libraries staff, who rendered helpful assistance in handling my frequent enquiries for my research materials.

# 目录

<b>第一章 绪论</b>	<b>1-19</b>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1
第二节 韦晕与相关文献背景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解析	15
第四节 考察范围与章节安排	18
<b>第二章 本土的异客：马来亚与离散叙事</b>	<b>20-52</b>
第一节 “离散民族志”的建构	20
1. 「民族寓言」与文化政治	22
2. 乌托邦与民间叙述	25
3. 重访〈旧地〉：新马版本之“灰阑记”	29
第二节 殖民话语与文化协商	34
1. 被视为“他者”的离散族群	36
2. 华人眼中的异族形象	40
第三节 聚焦境内离散叙事	44
1. 无“家”可归：新村印象	44
2. 空间转移：从新村到乡村	47
第四节 小结	51
<b>第三章 多重的游移：跨国经验与寻根之旅</b>	<b>53-87</b>
第一节 重塑中国与香港经验	53
1. 自我认同之形成：历史记忆的钩沉	54
2. “双重离散”与摩登幻影	57
3. 时空之“层叠”、“栖居”之韵味	62
4. 荒诞人生与意识流	67
第二节 离散华人印记的“再造”	72

1. 都市与消费主义	72
2. “残缺”为失根隐喻	74
第三节 文化错位与认同抉择	76
1. 异邦想像：旅美经验	77
2. 从留学到“流亡”	79
3. 性/别与国族叙事	83
第四节 小结	86
<b>第四章 旅行的意义：发掘 东方人文风景</b>	<b>88-108</b>
第一节 从“珠江”到“巴生河”	88
1. 海域想像：民族情怀、诗意表述	89
2. 展现知性：自然与田园风光	93
第二节 “旅行”意义的转换	97
1. 反思西马殖民史与其风物	98
2. 游客的视角：怀古与异国情调	101
3. 华裔、大中华意识	105
第三节 小结	108
<b>第五章 结论</b>	<b>109-113</b>
附录	
参考文献	

## 摘要

离散（Diaspora）作为古老而重要的跨学科领域，它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文文学占有一席之地。自19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争论、华语语系文学论述的兴起，以及当前学术界以当代/旅台马华作家为多的研究对象，不少学者对“此时此地”、本土性诠释各持己见，以及对“离散”之说的众声喧哗，场面无非蔚为大观。不过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鲜少人从中关注早期南来作家的身影，尤其是他们是如何在马来亚内外文化场域中，具备建构“离散书写”的潜能。

对此，本文以马华作家韦晕（1913-1996）为研究个案，意在考究他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并借此厘清其作品的离散美学及主题，和对家园产生复杂的文化想像及认同抉择。韦晕具有不可忽视的跨国属性，他经由从香港、广东辗转南下新马，并活跃于马来亚生活与创作。自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乌鸦港上黄昏〉以来，韦晕笔下的“马来亚”作为具有文化杂糅、跨越历史、时代与区域的概念，也是镶入在诸多文本里的重要文化印记。这正是他重新对“离散”及相关次主题（流亡、旅行）的发掘和思考，在展现离散书写及其主体性之余，也朝向对“本土认同”进行反思。本文主要结合从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比较研究的角度，以离散、文化认同和在地性相关文化理论交织，绘制一副再域化的“文化马来亚”离散叙事模式。

**关键词：** 韦晕    离散    在地性    文化认同    文化马来亚

## ABSTRACT

Diaspora serves an importan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hich had never been absent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ry field. Since the Uniqueness of Malaya Literature debate in 1948, the emergenc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Studies, also with the major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Malaysian writers, these had echo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n diaspora and localit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literary discourse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early Chinese writers were relatively lacking, especially those have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writing paradigm associated with the diaspora discourses in Malaya.

Wei Yun (1913-1996) , a southbound writer whom travelled to Malaya during Second WWII, equipped with various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s i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China. This thesis will provide a critical analysis on his works since 1950s, adopting the framework 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y intertwining of cultural theories eg. diaspora, cultural identity and locality. These was deemed as Wei Yun's rethinking the idea of home, diaspora, and other sub-theme such as exile and travel along the line, which will shed light on his search of literary subjectivities and "local" identity. Therefore I coined "Cultural Malaya" as a re-conceptualised diasporic paradigm based on his literary portrayals. Ever since his first short story "*Wuya gang shang huanghun*" (乌鸦港上黄昏) published in 1956, I argue that Wei Yun's notion of "Malaya" was a cultural hybrid form, encompassed in a trans-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phere and contact zones, which deeply embedded in his writings.

**Keywords:** Wei Yun   Diaspora   Locality   Identity   Cultural Malaya

# 第一章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离散（Diaspora）作为一门古老而重要的显学，它在华文文学脉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早期的中国南来作家，他们以种种缘由离境来到马来亚和新加坡<sup>1</sup>。通过身体和身份的流动，也展现了不可忽视的跨国属性。作家们将跨界的经验落实到文学创作的实践里，也就形成了一副马华离散文学的面貌<sup>2</sup>。那么，尤其是早期第一代的华文写作人，他们在“异地”的创作面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以及在离开祖籍地和出生地，与殖民社会与文化的协商过程，他们又是如何展现其中的离散书写面貌？就此，本文以马华作家韦晕（1913—1996）为个案研究，意在考查他自50年代以来的作品及文论，并讨论当中的离散主题和策略，以及他在扎根“马来亚”之后，所以对家园产生的文化想像及认同抉择。

本文选择韦晕为研讨对象，最首要的意义在于他持有在马来亚、中国与香港的流动式离散经验。自1937年太平洋战争以来，韦晕从香港—广州南来而选择在马来亚定居，并在当地生进行创作和生活。在异乡披荆斩棘后的50年代里，韦晕经历过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新马社会去殖民化与本土政治抗争之高潮，和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时段。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韦晕写下不少与离散现象和移民相关的文学题材。加上本身爱好旅游，他在游历欧洲国家中所记录下来的，亦能展现出一种另类的马华离散文学面貌。

在介入讨论有关离散书写及其主题的再现之前，笔者首先必须与“离散”息息相关的关键词——“本土性”进行概念上的疏理。“本土性”

（locality），或称地方性 / 地域性 / 在地性，它属于在人文地理学范畴里所指各自不同地方，如何因应外来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势力，而在作业、制造、生活与习尚上，通过不同的地方特色来发展出各自有别的表达

---

<sup>1</sup>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1927—1948》，（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年）。

<sup>2</sup>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八打灵再也：友人出版社，2011年），页47。

方式<sup>3</sup>。“本土性”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除了是对于当地文化、人文和风土民情的记述，它也存在一定的承担 / 反抗文化霸权的作用。换言之，本土性的实质，一方面有助于将“他者化”的境遇中解放，促进发展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种误读、挪用和移植，而陷入本土性“迷思”，流入了偏狭的抵抗工具或地方迷恋<sup>4</sup>。至于有关本土书写的条件，必须由日常生活出发，例如：重复穿行的路线、听到的声音、街巷里的叫唤、人们的穿着、食物的滋味等记述<sup>5</sup>，来创造更具意义的文化载体。对此，马华文坛里有关本土性的讨论，可以追溯自1930年代提倡的“南洋色彩”，以及“马来亚文艺”意识的萌芽<sup>6</sup>。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当地华人在炮火中与马来亚土地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对马来亚本土认同，也逐渐转向“挑战”或“削弱”侨民文艺的“必要”。

在1947-1948年期间发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它确立了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历程。争论的核心，围绕在侨民和本土意识两大交织<sup>7</sup>，主要建构属于“此时此地”的马来亚本土文学，及其本土认同的面向。例如，南来作家李玄认为，推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方向，若只是对作品和题材内容中的语言风俗习惯作为独特性，其目的并不明显。而一概将南来作家的贡献进行清算，对“只要独特，抹煞一般”是狭隘之举。他建议从民族思想内容出发思考文艺独特性的意义与方向<sup>8</sup>。李玄作为争论中一方并不排斥侨民文艺，尤其它对文艺的本土性建构起到积极作用。马华作家方北方则认为，深入本土的关怀是有益于创造马来亚的独特风格，而马华工作者须彻底扬弃侨民文艺的内容形式，才是真正认识和反映马来亚的良策<sup>9</sup>。新华作家苗秀则以解放民族为首要目标，建议将马华文艺与“马来亚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苗秀也指出，马华文艺运动是政治改革运动（反殖民 / 反战）的一环，强调

<sup>3</sup> 廖炳惠 编著《关键词200》，（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147。

<sup>4</sup>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17。

<sup>5</sup> 贺淑芳《〈蕉风〉创刊初期（1955—1960）文学观递变》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7年6月，页242。

<sup>6</sup> 杨松年〈从新马华文学看当时的华人社会〉，见《马华文学座谈会论文集》，（吉隆坡：马大中文系出版，1987年），页3；作家炼青在〈文艺与地方色彩〉一文提及“地方色彩这问题，既然在文坛战友一席颇为重要的位置，见苗秀、李廷辉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页144-146。

<sup>7</sup>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福建：鹭江出版社，1993年）；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02年）。

<sup>8</sup> 李玄〈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见苗秀、李廷辉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篇》，（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年），页243-245。

<sup>9</sup> 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吉隆坡：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1981年），页152。

艺术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而且条件在于以马来亚的民族性为考量，以紧扣现实主义的文学脉络，深化本土精神<sup>10</sup>。

至于韦晕来说，虽然他未曾参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相关讨论，或是后来60年代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艺论争等等，不过我们可视他作为马华文艺语境的“独行者”，进一步发现他如何的本土化表述，以及身为南来作家，他是如何思考有关“离散”和“本土性”之间的书写和再现。

这场争论虽然成功推动了马来亚本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留下了“此时此地”与“本土化”之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尤其从中衍生出相关的文化认同议题<sup>11</sup>。例如，90年代旅台学者黄锦树、林建国认为，必须将马华文学的历史发展、继承与断裂，放入与“中国关系”的脉络加以辩证<sup>12</sup>，诘问马华文学文本里的“中国性” / “华人性”（Chinese-ness）<sup>13</sup> 问题，以盘清当中的文化符号及文艺传播。当然，前人对马华文艺本土性的建树功不可没，有助于钩沉马华文学的定位与位置。因此，无论是“马华文艺独特性”对“本土化”的众声喧哗，以及将马华文学讨论的“中国性”问题，我们也发现争论背后，遮蔽了和“再发掘”早期马华文人的离散美学与书写潜能。例如，我们可以思考在侨民文学的“退潮”后，这些作家的“离散”是否就此结束？在面临复杂而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在初访马来亚以对当地的观察，如何受到其文化政治及其殖民文化的影响，以审视自我的国族认同和本土之间的关系？以下则是本文思考的一些问题。

争论后40年代末的马来亚，仍属于未脱离英殖民统治，在本土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在具有马来亚本土性作品里存在的离散 / 漂泊意识的印记，该怎么去理解？在经历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事实，不像其他南来作家如方天、白垚、黄思聘最终选择“再移民”，而意于

---

<sup>10</sup> 苗秀 <论“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见苗秀、李廷辉 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篇》，页257-260。

<sup>11</sup> 张锦忠 <继续离散，还是流动：跨国、跨语与马华（华马）文学>，见《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年），页142-143。张锦忠指出，早期从香港南来一批作家如方天、白垚、姚拓、黄涯、黄思聘，无论是在马来西亚定居或选择再度离散，其中的书写包括文化回归、跨过流动与双乡离散的轨迹，皆是构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与文学问题。尤其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文化冷战与美元文化的效应，这批南来文人再马来亚开启了一波有关马华现代主义的讨论，也进一步对书写本土性和地方性进行探索。详情也请参看贺淑芳《<蕉风> 创刊初期（1955—1960）文学观演变》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7年6月。

<sup>12</sup> 游俊豪 <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页59-61。

<sup>13</sup>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关系》，（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

扎根马来亚的韦晕，他所体现的写作策略、刻画的人、事与物，以及有关中国移民的现象，如何突现对当地本土认同的程度？

长期以来学者忽视韦晕重要的文化背景——香港和中国。早年在香港生活和广州军旅经验的他，对两地的记忆也是丰富的。1960-70年代马来西亚虽已从英殖民政府独立建国，但韦晕笔下所描写的正是未脱英殖民执政的香港叙事和人物。对此，他的（非）在场如何彰显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对于这些多重的文化印记，韦晕借镜了什么样的文化资源，作为衔接、或深化有关离散华人的叙事与话语？自离开母国到异地生活接触的文化，韦晕踏上寻觅文化身份，这迫使他从不同的身份和角度，去审视自我的认同。笔下系列海域想像和马来亚风景再现，它们如何展现韦晕离散到马来亚后的文化身份？当中是否就有如一种永不休止“离散幽灵”（spectres of diaspora）贯穿再作品里，逐步体现“旅行”（travel）意义有所更替的潜能？

笔者将借由以上的问题，归纳出韦晕的离散书写与策略为三个部分：1) 马来亚与“本土认同”的关系、2) 多重离散脉络与跨国寻根、3) “旅行”书写与离散地景的建构，以拼凑出的有关文化符号、象征与叙事特征，说明韦晕对马来西亚的家国想像。我相信，韦晕建构的离散书写的对话面，其身影徘徊在马来亚以其跨国书写，以及在动态“他乡观照”过程中，创造出建构离散美学的条件。韦晕虽然视作为早期作家之一，但他对马来亚的地方性、多元文化、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解与想像，以及体现的离散叙事氛围与可能，是远远超越历来争论中能以概括。本文冀望以突破学术界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离散与本土意识的二元对立，来尝试构制一副再域化的“文化马来亚”离散图景，以呈现韦晕的主体性与华文文学的关系，弥补学术空白。

## 第二节 韦晕与相关文献背景

韦晕，原名区文庄，使用的笔名包括：上官彖、韩兵、秦系、山霞、丁凤、韦多等等<sup>14</sup>。祖籍山东济宁，出生于香港，青年时期曾在中国广州接受美专教育，参加抗日军，南来后时常往返马来西亚（以吉隆坡城市、霹靂州与彭亨州为主）和新加坡两地生活与进行创作。在抗战期间，他曾一度搁笔，担任起小买卖的生意、小学老师以及巴士公司经理<sup>15</sup>。阔别战后9年，韦晕重于在1954年写下〈乌鸦港上黄昏〉，此篇后来收入在1956年出版同名首部小说集。这篇小说展开对新马跨文化的关怀和地方性<sup>16</sup>，这能视为韦晕致力于马来亚地方书写的伊始，在文坛重新出发后的重要印记之一。

韦晕的创作生涯中，受到中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作家如鲁迅、张天翼、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安东·帕夫洛维奇·契柯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 1868-1936）；英美作家如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西奥多·赫曼·阿尔伯特·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 Lawrence, 1885-1930），以及捷克德语作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sup>17</sup>的影响。韦晕一共出版多达十六部文学作品，包括中长短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文艺刊物如《晨星》、《写作人》、《新生代》中数什篇文论及作品<sup>18</sup>。韦晕分别在1991年11月由吉隆坡暨雪兰莪的中

<sup>14</sup> 马仑《马华文学之窗》，（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7）；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6；骆明主编《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页222-223。

<sup>15</sup> 马夫之《新马作家论》，（吉隆坡：怀艺出版社，1992年），页5；马夫之《作家作品研究》，（雪兰莪：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页85；郑宜〈小说家韦晕先生访谈录〉，见谢克主编《新生代》，1969年，页69。

<sup>16</sup> 韦晕《东海·西海》，（香港：维华出版社，1961年），页119；韦晕《旧地》，（香港：东亚书局，1958年），页146。韦晕指明，五十年年代的创作是他人生和文艺重新出发的起点，意在告别昔日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关怀马来亚本土是他的目标。

<sup>17</sup> 区如柏《作家须有使命感：韦晕》，见《联合早报》，1987年5月28日，页6。

<sup>18</sup> 韦晕作品集包括：《乌鸦港上黄昏》（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6年）、《都门抄》（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8年）、《旧地》（香港：东亚书局，1959年）、《春冰集》（新加坡：新社出版，1971年）、《韦晕小说选》（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1986年）、《寄泊站》（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印务，1986年）、《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中篇《还乡愿》（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年）、《荆棘丛》（香港：上海书局，1961年）、《陨石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81年）；长篇《浅滩》（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海不变》（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7年）；散文集《东海·西海》（香港：维华出版社，1962年）、《野马随风》（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协会，1975年）、《文苑散叶》（吉隆坡：铁山泥出版社，1985年）、《馀尘集》（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8年）。

华工商总会，所颁发第二届马来西亚马华文学奖，1996年5月荣获东协（亚细安）华文文学奖，并在同年6月病逝，享年83岁<sup>19</sup>。后来文艺团体也将韦晕小说及其作品收编入选集，例如1998年出版《余尘集》，以及2012年由蔡晓玲编选的《风过处，水无垠：韦晕小说选》。在相关的研究成果里，学者主要将韦晕视为一位追求现实主义的作家，并持有“爱国主义”倾向的形象，以及“回忆叙事的写手”。

## 1、马华文坛现实主义的先驱者

英美新批评家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指出，现实主义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表现，它排斥了异想天开、神仙鬼怪、隐喻象征、抽象和装饰性的东西，也排除偶然和不寻常事情和情节”<sup>20</sup>。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和美学范畴，它与左翼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并发挥道德劝说和社会批判的作用<sup>21</sup>。当此主义“移植”到新马华文文学场域中，以方修的论述来看，它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现实出发，尊重客观现象及其规律；不主观地粉饰现实、歪曲现实，或无视现实，而是严肃认真……艺术地皆是实际生活本质地、合乎规律的东西”<sup>22</sup>。对此，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品，多数以刻画底层人物与平民社会为常态，促成50年代的文学核心主题之一。

韦晕作品包含了以上的特征，这不免使他成为评论家眼里一位马华现实主义的重要先驱作家，以及具有马来西亚“乡土文学”作家的称号<sup>23</sup>。新华作家赵戎曾在《韦晕论》中，以现实主义脉络分析韦晕的作品，并宣称作品其具浓烈的时代感，以及当中折射的多元种族，具有特色和社会意义<sup>24</sup>。

<sup>19</sup> 李锦宗 <韦晕年谱>，见韦晕遗著《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页169。

<sup>20</sup> 雷内·韦勒克著，刘象愚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页223—233。

<sup>21</sup> 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sup>22</sup> 方修《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烘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年），页21。

<sup>23</sup> 张建英 <一样风情两种思考：沈从文《边城》与韦晕《春汛》的比较解读>，见《海南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页44—49。学者同比较沈从文与韦晕的“乡土元素”及其刻画的风土民情，将韦晕视为东南亚华文“乡土作家”之一。按照王德威的说法，乡土小说的特征在于对于地方风俗、独特用语、节日传统、礼仪等规范，构成地方色彩。乡土作家并从他们熟悉的事物和时代，以陌生化、记忆、想像来强调时间性，来将过去和现在连结、整合或扭曲，形成错中复杂的时空框架，见王德威《矛盾，老舍，沈从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

<sup>24</sup> 赵戎 <韦晕论>，见李廷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篇》（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

陈鹏翔在《论现实主义三剑客》里也把韦晕、苗秀和赵戎，比喻为新马华文文学现实主义的早期文坛的“三剑客”，文中将三位新马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主要以历史大背景结合文本细读的方式，勾勒韦晕如何与其他两位写实特色的差异。

除了对写实美学的讨论，另外让学者关注的则是韦晕的“回忆和抒情的叙事”手法。陈鹏翔进一步指出，韦晕的作品使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技巧，而赵戎则认为韦晕的“抒情笔调”是贯穿小说和散文的写作特点<sup>25</sup>。方桂香、黄孟文肯定韦晕的写实风格，不过也一致批评韦晕作品创造的人物性格，虽然人物是充斥着苦恼和孤独的个性，但缺乏刚烈的个性<sup>26</sup>，具有迷蒙之感<sup>27</sup>。新华作家谢克认为，韦晕小说中虽然故事性不强，但善于营造氛围，这与韦晕有绘水墨画经验的有关<sup>28</sup>，例如陈雪风的论述中，他以〈乌鸦港上黄昏〉里展现的犹如一副“现代风景画”<sup>29</sup>。

纵观以上学者的评介，主要是侧重在作品中叙事策略和人物分析。然而，这就形成了研究盲点——有关的离散空间、本土再现、甚至全球化语境中对历史、文化与地景的处理和关怀，是相当欠缺的。例如，韦晕笔下的知识分子、渔夫、妓女形象，他们多数以“漂泊者”或“流浪者”的性质，这些皆是前人研究里忽略了与当地的文化政治、文化记忆，去结合思考的有关议题。本文认为，就艺术手法来看，若着眼于纯文学的分析或者以标签化的各类主义作为讨论焦点，就会遮蔽韦晕如何想像马来亚，与再现此地认同的层次感。要再重新考察具有历史价值的早期作家，必须将他们放在流动的历史语境里，即发掘他们自足性与创造性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从不同文化资源，进行借鉴与转化，来深化离散书写的可能。

---

年），页174-194。

<sup>25</sup> 陈鹏翔〈论韦晕的中长篇小说〉，见《华文文学》，2001年，第4期，页41-45。

<sup>26</sup> 方桂香《另一种解读：方桂香文学评论集》，（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2年），页42-60；《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年），页。赵戎〈韦晕论〉，页189-194；苏菲〈韦晕，广泛的题材，蒙胧的色调〉，见《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1991），页167-173。

<sup>27</sup> 陈慧桦〈论马华文坛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剑客〉，见戴小华，尤绰韬主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页182-183。

<sup>28</sup> An oral interview on Mr Seah Khok Chua (余克泉先生 @ 谢克),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002761/95 (Reel No. 52),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8 October 2003.

<sup>29</sup> 陈雪风〈一副生活的现代画：谈韦晕《乌鸦港上黄昏》〉，见《墨笔丹心》，（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0年），页66-75。

## 2、拓展本土性书写

笔者在重新翻阅韦晕旧文的过程中，发现韦晕并非是文选中那个一板一眼的“本土”写实主义作家，或是评论家眼里那位眼中善于“回忆”<sup>30</sup>写手。为了有效贴近和拓展马来亚地方性的关怀，韦晕一方面希望延续写实主义带给读者的“真实感”，从更多元的写实题材丰富马华文学的文化资源<sup>31</sup>。另一方面，他也不皈依和满足于早期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或中国写实主义的传统。他的目的在于阐明和搭建历史南洋、马来亚与其跨文化的印记，来扩充“本土性”的内涵。例如，韦晕在〈身后文章和有名的卡夫卡〉文论里说道，现代主义的艺术具有创新宗旨，并且自身在早年已留意台湾《现代主义》的文艺杂志里，如何介绍和译介卡夫卡作品进入台湾文坛<sup>32</sup>，认为卡夫卡能展现人如何在现代生活里求存的迷茫感，并发挥极至：

“卡夫卡主要是一个被非人格势力压迫，而他的内心反叛却在抵抗这种压力…我们总会发现他描写的现代人物多多稍稍给权贵人士的诡计所扼制。但同时卡夫卡的思想还不算是充斥了颓废和忧郁。例如《骑勇者》、《审判》。卡夫卡笔下的这些半真实半幻象的人物，体现一种焦虑和寂寞”<sup>33</sup>。

此外，韦晕以包容的态度接受美学的多样性，在推崇沃尔夫、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小说家同时，也认为若能在叙事文类里，引进现代派文艺观，会借此刺激文坛的发展：

“我们必须注入现代派文学的几种观念：一、象征主义；二、超现实主义；三、荒谬（异化）。现代主义在美学上的基础，其中包括了对于表现技巧的创新，加强空间感和韵律感来取代时间顺序的意识，以及趋向于反语、讽刺的风格和某种“非人格化”的艺术象征。如德国三十年代的剧作家布莱希特、现代中国作家蒋子龙的「找帽子」，「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

<sup>30</sup> 蔡晓玲〈交叠的时空：论韦晕小说中的回忆画笔〉，见蔡晓玲编《风过处，水无垠：韦晕小说集》，（台北：酿出版社，2012年），页5-17。记忆的作用克服异乡孤独，体现与“现在”的冲突，因此韦晕的笔调比写实主义更内敛深刻。

<sup>31</sup> 此评价收出自韦晕《都门抄》小说集序文，由新马作家杏影做序。见韦晕《都门抄》，（吉隆坡：文化供应设出版，1958年），页1-3。

<sup>32</sup> 韦晕〈寻求新突破的老作家〉，见《联合晚报》，1987年5月17日，页11。

<sup>33</sup> 韦晕〈身后文章和有名的卡夫卡〉，见谢克主编《新生代》，1969年，页62。

宗璞的「蜗居」，都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借镜于现代派手法来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果<sup>34</sup>”。

置身于马华文艺独特性文艺论争“之外”的韦晕，不像当时同辈作家如苗秀、赵戎、于沫我，或是张金燕参与马华文艺论争，极力推行本土意识的强烈使命，或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宣为马来亚本土进行宣传。他对外来的现代文艺流派并不排斥，尝试融合写实和非写实的方式，作为他的创作理念和一贯文风。

无论韦晕是披上现实主义、本土书写或是本土作家的称号，自身的离散经验连接其大时代的历史与记忆，这些条件是韦晕创作的主要触发因素（trigger factor）。正如文化理论家司徒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认为，文化认同并不是一种本质的（essence），而是標榜一种立场（positioning）<sup>35</sup>。例如，分别创作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荆棘丛》和《陨石原》，前者关注的是两位主人翁“于中”和“文青”从中国和香港归来后，反观马来亚生活面貌的差异，后者则从三位“旅台”的马来西亚女学生视角，展开一场由感官刺激和文化冲击下的跨国离散经验，两部小说呈现一批离散华人如何在一个高度资本化的香港和台湾社会下生存，以及面临认同的危机。此外，韦晕在1958年写下的短篇小说〈旧地〉中，尝试以非华人欧亚裔的视角，对马来亚家乡之“根”和（再）移民之“路”的辩证下，绘制出具有异国情调的离散与原乡书写向度。所以，通过这三部作品的特色，都可让读者感受韦晕善于掌握时代感的敏锐度，从城市和乡下对比的细微观察，到多元族群文化的关照，足以展现其跨境离散现象和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 3、韦晕与马华文学、华语语系文学 的关系

“离散”对于文化研究或文学批评领域而言，是一个饶富批评性和生产性的公共领域。它隐含了抗争政治的萌芽，在强势文化的支配下，突

---

<sup>34</sup> 韦晕〈从现代散文谈起〉，见《写作人》集刊，第16期，（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1987年7月，页9-11。

<sup>35</sup>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s.,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6.

现作品中阐述的民族主义、国族意识、阶级等文化政治课题<sup>36</sup>，是值得我们一再深究的层面。进一步聚焦在美学层面，离散也可以突出作家如何身于现代社会、政治及其对文化抉择的协商，以致呈现具有“内在离散”或“外部离散”<sup>37</sup>的书写范式。有关离散马华文学研究，学界具有丰富的研究著作。相关研究方法中，有不少学者从人类学家克里弗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框架介入，从“原生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深入讨论马华文学文本中所能带出的“深刻描述”（thick description）书写向度，从而关注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自然景观、审美情趣等方面，造就本土性的价值观<sup>38</sup>。

学术界有关马华离散书写的研究对象，较为关注的有旅台马华作家如：李永平、温瑞安、黄锦树、张贵兴、潘雨桐、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马华本土作家则包括：黎紫书、李天葆，以及美籍华裔作家林玉玲等，成果无非蔚为大观。研究的切入点横跨叙事角度到诗学，到从主题式的研究到意象的钩沉，展开对移民与原乡寻根情怀、马共与热带雨林书写、南洋文化的刻画、以及个别作家的身份 / 文化政治等议题，都有所爬疏与关注<sup>39</sup>。所以，相对有关早期南来作家为例的考究，或以韦晕为个案研究对象的，更是相对缺乏。若有之，学者亦是紧扣整体的文学脉络加以补充论述而已。

陈鹏翔在《现实主义三剑客》里稍微介绍韦晕有关离散书写的层面。他以长篇小说《海不变》的女性角色为例，指出女性形象与离散的关系，这作为提供本文的研究提供进一步扩展研究的线索<sup>40</sup>。许文荣则从文化政治的两大脉络“反抗霸权”和“弱裔文学”的角度剖析〈乌鸦港上黄昏〉。他认为这篇产自于五十年代“爱国主义时期”的作品，呈现种族之间和谐的愿

<sup>36</sup>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7年），页140。

<sup>37</sup>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台北：里仁出版社，2014年），页VIII。许文荣指出，“内在离散”指的是心灵的离散，具有自我放逐的特征，主体可以有或没有涉及外在身体的迁移。这类的书写主要指涉主体对官方或主流的疏离感，而且对于本身文化却有念兹在兹的情感。“外部离散”指的主体参与了实际的移民 / 再移民形式，或暂时旅居国外，或永远投入另一个国度，而在外国感受到祖辈文化的剪不短情结和原乡想像；其详情也请参看简政珍《放逐诗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作者以考察自60年代以来的台湾旅美诗人如：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张系国、陈若曦的诗文里有关原乡与离散的关系，以建构放逐 / 流亡诗学的可能。

<sup>38</sup> 张锦忠〈南洋论述/在地知识〉，见《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年），页130-142；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位一体：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同构关系〉，见《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创，2012年），页20-21。

<sup>39</sup> 有关马华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丰富多样，包括文学选集、论著、单篇论文到硕博论文类别，本文便不逐一赘述。

<sup>40</sup> 陈慧桦〈论马华文坛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剑客〉，页183。

景<sup>41</sup>，当中也点出华人移民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认同转变。不过作者经由分析一篇作品，难以解释韦晕在离散文学脉络中的本土和异乡的经验；而此文将此纳入爱国时期的小说，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韦晕具有“爱国爱乡”的绝对认同。

华人研究领域，由陈志明主编的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论文集，游俊豪曾以 ‘Chinese diasporas and their literature’ 的勘察，论述马华文学的历史性与离散性质，作者主要从离散华人的脉络和框架，以社会学的“场域”概念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历史和区域划分，扣紧历史背景加以疏理。无可否认，自二战之后兴起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本土化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核心。作者在引述韦晕中篇小说《荆棘丛》为例，认为故事里的主人翁面临独立后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过却对两国新兴国家政权前景的不乐观<sup>42</sup>，这其中也体现了在本土书写里体现反抗霸权的隐喻。

在美国学者贝纳子（Brian Bernards）在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他从后殖民论述以许地山、徐志摩、老舍等南来文人及作品的考究，尝试将他们划入一种跨语际、跨文类和跨文化的书写经验，来建构一种多重的“克里奥文化”（creolizing multiple cultures），作为诠释属于后殖民语境的多元南洋图景主题（Nanyang literary trope）<sup>43</sup>。另外，张松建新著《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中有关早期流亡作家鲁白野作品的分析，当中聚焦在流亡马来亚与印尼经验，族群和混杂性<sup>44</sup>。虽然以上两位学者并未将韦晕纳入研究范围中，不过从后殖民文化批评和跨学科研究，他们意在重新开启探索早期作家，探索他们如何建立本土诗学，以及刻画多元族群文化对话的必要。

---

<sup>41</sup>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页 69-70、259。

<sup>42</sup> Yow Cheun Hoe, “Chinese Diasporas and their literatur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edited by Tan Chee-Be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465.

<sup>43</sup> Brian C. Bernards,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p. 9-12.

<sup>44</sup> 张松建〈族群与国族的变奏：鲁白野的文化—政治论述〉，见《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7年）。

此外，近年有关“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兴起与讨论面向<sup>45</sup>，学者大致上以聚焦在“中国性”、“华人性”、“在地性”及“世界性”的辩证为切入点。华语语系文学从文学与文化研究角度，思考华人的离散与本土化的过程，打通历时和共时的维度，以不同的“地缘关系”（geographical affinity）以及不同文化“接触领域”（contact zone）进行互动。学者在超越国族和民族疆界与限制，从不同的立论基础和历史依据，论及离散与在地认同的辩难。例如，史书美以标榜多维批评和多元去中心主义论述（可以是批判美国帝国、马来西亚政府、英国、荷兰、法国等，在东南亚的殖民主义，不一定是只有中国而已<sup>46</sup>），以“帝国间性”（inter-imperial）的批判性思维立论。史书美承认离散为“历史”，而批判离散作为“价值”。对于“离散作为历史”，指的是承认华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现象，即不反对海外华人经验的贡献；而她提出的批判“离散作为价值”，目的在于反对永远保持“侨民”的心态，摆脱以原乡作为中心思考。放在华人研究的框架里，它是针对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国性”批判<sup>47</sup>。

笔者认为，两者的差别，在于“离散作为历史”说明了华人散居已成为历史事实，是无法重写或更改，而“离散作为价值”，（以为例海外华人研究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华人“离散以后”在居住地落地生根，主体必须重视“此时此地”，和争取实现自我在“当下”对本土的认同，所以必须摒弃所谓的“离散中国人”（祖国的留恋）意识。在史书美看来，她深信“离散者”来到移居地，应该摆脱“离散意识”，而不是固守着飘零无根的状态。因为持有原乡的本体论者，对融入本土会有困难，造成与当地之间产生隔阂与疏远<sup>48</sup>。因此，史书美的“反离散”中心在于批判“依恋中心”的价值观，以实现“离散有其终时”之说，致力于追求跨界和多元身份认同。我们能肯定的，华人的“根”与“源”并非是出自于同一个国家，前者并非是既定的“祖传”，可作是在作为离散到在地后的新“起源”，并强

---

<sup>45</sup> Jing Tsu, David Der-wei Wang,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10; Francoise Lionnet, Shu-mei Shih,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46</sup>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年），页226-227。

<sup>47</sup> 陈荣强〈华语语系研究：海外华人与离散华人研究之反思〉，见《中国现代文学》，2012年第22期，页85。

<sup>48</sup>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7年），页47-48。

调境遇性 (situated-ness)、在地性和现世性层面, 作为探寻后者“源”的多元性指涉策略<sup>49</sup>。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已成为华语语系文学中重要地缘符号<sup>50</sup>。对于王德威来说, 其讨论面应该是超越中国性 / 华人性论述, 以把对象和议题放置在“在移民社会的变迁、遗民意识的消长、夷民身份的取舍, 移民也应该跨越“离散”论。尤其移民动机和动线, 不再简化于“有去无回”或“落叶归根”的选择, 而传统的“根”与“径”的公式必须复杂化”来观察文学的驳杂现象<sup>51</sup>。这里与史书美的观念稍微有交叉之处。“根”与“径”的诠释是衍自于詹姆斯·克里弗德 (James Clifford, 1945 -) “根与路” (roots and routes) 的论述。例如, 王德威也是华语语系文学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他曾提出文学的“新三民主义” (移民、遗民与夷民) 之说, 并将三者附加“后”前缀 (后移民、后遗民与后夷民), 叙述的主体在时空的脱节中, 也存在某种剪不短的历史性延续。

#### 4、溯源与启示：“文化中国”的含义

如前文所述, 韦晕属于“第一代”<sup>52</sup>的早期南来文人, 虽说有学者指出他早已“卸下侨民意识”的包袱, 极力投入于本土性书写与建构, 不过, 即便在动荡年代选择南移, 这并不能代表他对曾经生于斯, 长于斯的原乡——香港和中国的情感就能轻易斩断。本文认为, 本土性书写能作为他的叙事层面, 我们是否能借鉴离散华人论述“文化中国”, 以说明其文化之“根”与“源”之间的互动?“文化中国”概念的萌生是由出生在马来亚霹靂州, 后来赴台求学的侨生温瑞安 (1954-), 在70年代率先提出。温瑞安以拥抱中国文化为首要任务, 在台湾兴办《青年中国杂志》刊物, 以复兴中华文化, 宣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在第1期创刊号《青年中国》的发刊词, 温瑞安写到: “不管是台湾、大陆、海外, 只要中华民族文化永不决灭, 我们

<sup>49</sup>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5-42; 史书美《反离散: 华语语系研究论》, 页49-50。

<sup>50</sup> Alison Gropp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3.

<sup>51</sup>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7年); 王德威《华夷风起: 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 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6年, 第1期。

<sup>52</sup> 韦晕作为他家族里的“第一代”移民, 和王赓武所论述的“第一代”移民 (王指的是19世纪初20世纪末, 中国人下南洋的大规模移民潮, 具有“侨居性质”(sojourning) 的移民) 有所不同, 见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Times Academic Press Publishing, 2001, p. 55-61.

就有救国救民的契机<sup>53</sup>”，有学者指出温瑞安颇有效仿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里《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其渲染浓厚的中国乡愁韵味<sup>54</sup>。因此，“文化中国”后来成为1979年第3期《文化中国》专号。针对文化中国的论述，并不就此停止。在这期《文化中国》里收入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韦政通的访谈。他倡导和畅谈有关儒家文化思想为主要中心论点，后来作为推动和支持温瑞安“文化中国”理念的学人之一<sup>55</sup>。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最初是作为海外华人一种“文化乡愁”的萌生，后来由韦政通、傅伟勋等台湾当代学人的相继推行。后来80年代由美籍华裔学者杜唯明，从新儒家的观点诠释，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存在的现实（chinese culture is a lived reality）。认为“中国”不应该由政治来定义，应该是以文化来判定，而视中国文化是可传承的文化载体，并且能因应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和地理环境（如：东南亚地区、台湾、香港或是美国等）对文化进行传播<sup>56</sup>。由此可见，经过几代学人的“挪用”和“发挥”，“文化中国”之说已成为非固化和流动性的文化载体。

韦晕从香港和中国离散到马来亚，何尝不是对“原乡文化”进行解构和“再建构”，以致于说明在祖籍地、出身地和移居地的文化和认同进行反思。其中是否因为当地政治的影响，而再度点燃起韦晕的“再离散”的心态，这也为他带来另一种书写的可能，也是本文致力于发掘的部分。对此，本文的中心论点意在考察韦晕离散书写，并非将他本人或作品的离散含义看作是某种“终点”或“回归”，或是追求某种唯一的本土认同。我认为，离散并不只有存在抵抗霸权的能力，而是有待发掘韦晕与“离散”<sup>57</sup>相近而重叠书写面向，例如：流亡、放逐、消费“旅游”等延伸书写及主题。离散的表述未必只有体现离乡的苦楚表现<sup>58</sup>，在另一个层面也避免在诠释和解读认同过程中，一味走向单一化或本质化，而能理解为本土性内涵，如何因不同

<sup>53</sup> 温瑞安〈青年中国〉“发刊词”，见《青年中国杂志：青年中国》，创刊号，（神州出版社，1979年），页3。

<sup>54</sup> 张宏敏〈“文化中国”概念溯源〉，见《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页56-59。

<sup>55</sup> 韦政通〈中华文化的新生：韦政通先生访问记〉，见《青年中国杂志：文化中国》，第3期，（神州出版社，1979年），页11-23。

<sup>56</sup>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re”, in *Daedalus*, Volume 120, Issue 2, 1991, p. 1-32.

<sup>57</sup> 有关流亡与旅行概念的解释，本文会放在第三和第四章，并结合韦晕文本案例进一步论述，以致可以加以区分与离散的属性，来突现韦晕离散书写和主题的变义。

<sup>58</sup>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页34。

地理和写作时宜的变化而丰富或延伸，作为寻找自身认同的途径。对此，本文暂且不将韦晕以纯粹的“离散作家”或“本土作家”简单视之，或是以相关主题的多少来衡量韦晕的价值。有关讨论华文文学与地方性等议题和范围颇广，不过这可以作为本文在思考韦晕本土书写的程度，来展示不同层次的离散主题为参照点。尤其学术界重在探讨当代马华/旅台华文作家的情况下，本文希望能透过对早期离散作家的再探，我们能从华语语系文学的观点与“文化中国”层面，重新看待韦晕与本土性，马华文学的关系。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与 概念解析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结合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角度，使用的研究框架以“离散”、“文化认同”和“在地性”等相关文化理论与概念的交织。本文也会在不同章节以相关华人研究、文学史与地方史材料进行补充说明，一来可以把握作品中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主体的跨文化性质，二来这可以避免西方论述的一面倒、偏向中心主义的论述（尤其有关“离散论述”，及其将其他概念如流亡、游牧，本以植根和围绕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我们必须关照离散华人的移民历史，和作者个人经验加以参照协调），以非掩盖对文本的阐释和文学性质（literariness）。

#### 1、离散、文化认同

有关于离散的概念，其 *Diaspora* 最早是由希腊词根 *dia-*（跨越）与 *sperien*（散播）组成，词义源自于《圣经》中记载古代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后的现象，具有“飞散”（*scattering*）之意义<sup>59</sup>。到了现代社会和跨国流动的语境下，由罗宾·柯恩（Robin Cohen, 1944 -）、威廉·萨弗朗（William Safran, 1930 -）、詹姆斯·克里夫德等文化理论家，他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角度，将全球不同地区离散群体、类型、移民路径和原因重组分析和归纳，意在打开、突破和超越，离散作为古老、负面，以及

---

<sup>59</sup> 赵一凡、张种载、李德恩 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页113。

被动的移民现象<sup>60</sup>。就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 -）指出，离散作为全球普遍的移民现象，既能召唤散落在各地的“离散群体”（scattered populations gathering in the global cities），以开启另一种新兴的社群和政治文化想像的可能性<sup>61</sup>。

离散作为研究后殖民文化作为文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利于反思殖民主义的表述，以及它如何与文化认同产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化的“认同”乃是由社会生活建构和挑战（forged and contested）<sup>62</sup>，而且始终是个未完成的身份建构（unfinished identities）。其中以文化的杂糅性（hybridity），强调主体的认同是一种非动态、本质化和固定的“生成”（process of becoming）<sup>63</sup>。具有离散经验的艺术家所创造出的作品，他们同时间也试图在寻找迈向“通俗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的潜能，所谓的本土世界主义，正是关注其的“居间性质”（in-between）<sup>64</sup>。它承载了复杂又丰富的跨文化交流领域，既有历史含义也能与当下对话，以再现一种“离散艺术”（diasporic art）的属性。在离散的艺术中有关的居间性质的探索，主要在解读作品内的交错或层叠感的文化符号，以及如何的“层叠”（layering）的方法，来展现文本里“杂糅性”的混合文化属性。例如韦晕在马来西亚的地方书写，当中对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处理，能符合他如何作为立足本土而进一步反思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多层性。因此，在“文化杂糅”的语境之下，通过文化和时空的交错里去连接过去与当下，如何体现文本、作家与现实始终在一种反复、亲密、和暧昧的关系里协商运作。这也就体现在所谓的现代社会“认同”的意义，它取决于自身的位置与身体的建构，而并不是固定的生理学、自然的实体，身体与自我意识形成一种互动、

---

<sup>60</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i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o.1, 1991.

<sup>61</sup>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4, in *Further Inflections: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the Future*, p. 317.

<sup>62</sup> Vincent B. Leitch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781.

<sup>63</sup> 保罗·吉尔罗伊对（Paul Gilroy）观点侧重于黑人主体性（black subjectivity）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或文化混合 / 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双重意识概念源自于非裔美国历史学者 W. E. B. Du Bois，而保罗则以非洲黑人为离散主体与殖民文化交往加以发挥。双重意识对于离散群体来说非常关键，尤其在于抗衡霸权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有关文化杂糅的观点在保罗的观点和霍尔有所相似，两者从边缘介入，而不为流动性的文化符号给予某种定位或概念。不过，霍尔更强调一种“未完成认同”，除了关注非洲黑人同时也包含欧洲白人族群的认同关系。见 Jonathan Rutherford eds.,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sup>64</sup>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占有与再占有的反复过程中进行抽象的认同体系<sup>65</sup>。对此，离散对于地方民族文化的记录与建构，以及追求的认同标准或准则，必须超越族群间纯正性（purity）的门槛，强调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文化认同<sup>66</sup>。

## 2、在地性 / 地方感

诚如李有成所言，离散经验复杂多样而无法统摄与画一。从文学研究角度来看，离散不仅是散居在各地华人作家的经验，它也是作家思考的立足点。他们必须与移居地文化、自身族群或国家现实保持对话，离散才能被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书写空间<sup>67</sup>。论及离散与地方性，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在印度学者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 1949 -）论述中，他所提出的五种景观预示全球性的文化流动，即：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以及意识形态景观。这些既是体现时空的协商（negotiation of space and time）<sup>68</sup>，辩证的视阈从跨国民族、离散族群、地方邻区的关系，以体现民族—国族及其跨国的交往关系，当中交往促成人类的焦虑、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离散与在地性意识的创造，当中需要“地方主体”（local subject），来绘制“地方邻域”关系（local neighborhood），才能有效的识别和组织（recognized and organized）本土知识的建构<sup>69</sup>。

这里我们可进一步借鉴詹姆斯·克里夫德以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的“民族志寓言”（ethnography allegory）。民族志寓言以叙事体为主，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寓言性的，其功能在于拓宽和丰富对地方文化的认识。对此，寓言的成分包含以当地民族文化以外的“附加含义”（beyond the local cultural meanings）<sup>70</sup>，这对于韦晕笔下不同离散族群的民族性体现。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从“在地性”延伸到“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探寻，如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对于地方性的认知、建筑、公共 / 私人空间的考察，

---

<sup>65</sup> 安东尼·纪登斯 著，赵旭东、方文 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页256。

<sup>66</sup>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eds.,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in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sup>67</sup> 李有成《离散》，页16。

<sup>68</sup> Arjun Appadurai, *Fear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g 29-30;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33.

<sup>69</sup>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 181.

<sup>70</sup>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这其中关乎人为主体如何与在地环境的有机相处。有关在地性 / 地方感的文化论述，这有助于思考韦晕如何在马来亚、中国、香港的离散书写，及其他如何对地方性、民族性与风景等阐释，提供启示。

#### 第四节 考察范围与章节安排

本文研究范围所涉猎的相关研究材料，除了韦晕从五十年代以来所发行的小说集、以及中篇小说、散文及随笔，进行跨文类的阅读研究。本文不以历时性的方法分类，而是将韦晕50-80年代以来的作品展开分析，以主题式的分析结合韦晕与“离散经验”，加以论证。笔者也会参照散落在文艺杂志如《新社文艺》、《新生代》及《写作人》的作品而纳入考察范围。本文引用的文学文本，以将未编入书集的文学作品，皆属于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则是其他学者对于韦晕的相关评论、评论家的访谈记录、马华文学史、相关华人研究书籍材料，以及中西方文艺与文化理论述，来做出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意在取得文本（text）与时代背景与语境（context）的互动。

本文共计五章。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陈述本文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文献回顾、作家背景、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

第二章讨论韦晕马来亚离散意识的形成。笔者尝试分析五十年代以来作品，展示韦晕有关离散华人与当地马来亚文化政治。本章将从离散与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结合民族与地方性与族群论述，探索文学文本中呈现的文化杂糅性质之际。例如韦晕对于民族寓言的建构，到衔接当时在新马五十年代发生的一场“玛丽亚事件”种族暴动中，例如在小说〈旧地〉里巧妙转变成新马版本的“灰阑记”，再现其如何“在家离散”的叙事脉络及主题。当中有关非华族与华族之间的文化协商，更是在去殖民和反殖民协商的话语（殖民主义的幽灵），以致衍生成从本土“再离散”的叙事潜能。此外，有关历史记忆如新村记述，乃是作为境内离散的面貌等等。

第三章则是关注韦晕的跨国离散书写，尤其讨论有关韦晕在马来亚与香港的“双重离散”与寻根的向度。韦晕作为南来的马来亚作家，这里探索离散华人到港台的生活经验，当中与中国和香港的文化记忆是一脉相连

的。例如作品中的主人翁，多数以“旅人”、“留学生”以及“流亡者”形象贯穿叙事。笔者发现，它们与新马有着相似的殖民历史和都市文化风气，可作为与马来西亚保持对话，凸现城市人面临现代化的焦虑。此外，韦晕写作手法中持有意识流手法，以及对西方文学经典人物的借鉴，以致扩展和深化离散华人印记的思考。对于相关放逐与流亡叙事，虽然韦晕本身并没有经历实际的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但是笔下的这些与“离散”重叠交叉的意义，它与边境、性/别、国族认同息息相关，乃至作者尝试穿梭在“虚与实”的在场文化场域，重在游移的本质下突出多重寻根的踪迹。

第四章主要侧重韦晕的旅行/行旅印记（散文和随笔），以致发现“旅行意义”的变化，如何影响韦晕对马来亚的感官认知与体验，体现离散主题与属性的多义与延伸。考查的方向目的在于韦晕在小说以外的散文中，发现他如何从以“离散华人”到“华裔”身份的视角转变，为他的系列旅行书写展开另类的讨论。就此，韦晕与其“旅行”书写相关的作品中，他是如何通过重返马来亚本土中，通过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和消费主义的现象中重视“他者”和“我者”的关系，以建构一种有别于西方/东方人眼中具包容的亚洲性。

最后一章是结论。本章主要是结合在前第二、第三和第四章里对韦晕作品做出的分析，并提出韦晕对马来亚的总体文化关怀——“文化马来亚”，亦是作为韦晕离散书写一个模式。所谓的“文化马来亚”的概念，这里与“文化中国”也有些许的内在关系，笔者将此做出初步的比较与探究。

## 第二章

### 本土的异客：马来亚与离散叙事

韦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南下马来亚，而生活在英殖民时期统治时期的他，可说是见证了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历程。自50年代以来，马来亚与新加坡先后分家，成为两个独立的新兴国家，韦晕的作品依然立足于马来亚为书写起点。且说离散，是在离开了“家”以后才能书写，韦晕将移居地马来亚视为“第二个家乡”<sup>71</sup>，那他“如何”与“为何”建构有关家园的离散叙事？而在家的离散主题，又能体现出什么意义？就此，本章主要勾勒出韦晕的“马来亚离散叙事”的三个面貌：即民族寓言、族群刻画以及离散空间的营造。本章的目的，在于展现韦晕对当地社会政治和殖民文化的协商，以及他对“本土认同”的检视与思考。

#### 第一节 “离散民族志”的建构

“人不一定要有家，有乡，才能生活呀！”

——〈非英雄史略〉<sup>72</sup>

“这栖迟在海外的老将军虽然怪惹人怜，总算有个归宿了，  
回顾我自己在番邦那漂流了二十多三十年，还是漂泊……”

——〈栖迟〉<sup>73</sup>

1937年，韦晕以“上官豸”笔名在《南洋周刊》文艺副刊发表短篇小说〈非英雄史略〉，此故事以反日本帝国和反战为背景，讲述主人翁“老潘”过番到马来亚番邦的境域，并感叹自身的流散处境。在老潘与当地人的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他认知到并非需要个稳定的归宿，才能做到安身立命与自

<sup>71</sup> 韦晕“后记”，见《东海·西海》，页115。韦晕是自二战爆发以后，独自选择来到马来亚生活，而也逐渐有认同于马来亚作为第二个故乡。我们不否认韦晕的书写里有大量描写马来亚的风物、文化和社会风气等等。可是，在面临殖民政府制订的“政策”，在他的叙事里却有“在地离散”的倾向，也不时想像遥远家乡如何。因此，笔者推断他对“第一个家乡”是持有一定的情感。虽说韦晕并无明示马来亚是他的“第二个家乡”，但笔者认为韦晕是因二战时期才选择南下，他心中的“第一个家乡”香港抑或中国（在本论文第三章会讨论），是与马来（西）亚对应的，前两者自然是他主要的精神归宿，而且他并没有否定或贬低马来亚的文化风俗。换言之，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家乡，韦晕的创作中始终尝试围绕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书写模式。“第二个家乡”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是作为韦晕离散到马来亚半岛，作为一种地理空间上的“先—后”顺序。

<sup>72</sup> 上官豸〈非英雄史略〉，见《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页16。

<sup>73</sup> 韦晕〈栖迟〉，见《乌鸦港上黄昏》，（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6年），页46-47。

我实现的可能。对此，以上出自于〈非英雄〉和〈栖迟〉的两句对白皆能说明这点。这或许代表韦晕离散到南洋后寻找新起点，另一方面隐含作者的意识——在文字里萌生出将离散、移民和漂泊现象的本土化。能够肯定的是，笔名由“上官彘”到“韦晕”的改变并非偶然。而是将一种纯粹的流离感投身于马来亚的文化场域里，尝试建构一种具有马来亚在地感的离散书写，奠定了50年代之后的写作定律（momentum）。这其中融合了来自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离散群体（diasporic community）<sup>74</sup>和不同民族的声音。在四部小说集《都门抄》、《旧地》、《春冰集》、《乌鸦港上黄昏》里，韦晕分别从人物和环境的再现，再现具有浓厚例的南洋本土书写。

本文的重心主要结合韦晕本身的离散印记，如何建构马来亚本土离散书写的面貌。这里有必要交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并加以参照，以获知一二。二战以后，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为了重新巩固政权，在1946年成立了“马来亚联邦”（Malaya Union）计划，在这个制度下的华人可以拥有公民权，然而却削弱了马来亚半岛皇室苏丹的权力象征，以及马来人在马来亚半岛地位，而迎来了马来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殖民政府在对此协商后，将计划改为“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l of Malaya）<sup>75</sup>。此外，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制订了“马来亚化”（Malayanisation）政策，以鼓励当地华人成为马来亚公民，促进对马来亚的认同，效忠马来亚，冀望迈向多元又统一的马来亚社会，即“马来亚民族主义”（Malaysia Nationalism）作为表层意义，实际上背后则是在拉拢华社去抵抗共主义，另华社反感<sup>76</sup>。那么，自40年代末英殖民政府实行的“马来亚联合邦”、“马来亚化”等计划，这些如何间接影响韦晕后来书写马来亚的印象？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叙事趋向？本文认为，韦晕为了营造若离若即的本土叙事氛围，尝试以塑造不同的民族文化符号、生活常态及民间现象，尝试体现了一部贯彻离散意识的创作体系和民族志。

---

<sup>74</sup>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in *Diaspora Spring* 1991, p. 83. 赛弗朗认为广义的“离散群体”说法是由不同的比喻性代称（metaphoric designations）组成，他们包括：外籍人士（expatriates）、被驱逐者（expellees）、难民（political refugees）、移民（immigrants），以及少数族裔群体（ethnic and racial minorities）。

<sup>75</sup>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19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Bangi: Univeris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0), p. 96-99; Halim Salleh,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to Malay Nationalism as the Malaysian Nationalism", in Leo Suryadinata (e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ast and We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rn Asian Studies, 2000, p.135.

<sup>76</sup>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19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p. 139-143.

## 1、「民族寓言」与 文化政治

自1956年出版《乌鸦港上黄昏》以来，韦晕除了为底层人民发声，他所追求的马来亚本土化书写，也不再是纯粹的乡土、扎根于异乡的情怀与认同。这时期作品中折射的马来亚社会的地方表现，更多是通过字面上较为隐晦的符号、象征或是叙事，进行传达有关马来亚文化政治的寓言故事。这除了视为韦晕深入表现当地的民族与社会风貌，也能体现韦晕展现的离散叙事美学。有关寓言（*allegory*）的概念，它在传统文学的领域里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历史与政治寓言”，指的是字面上描写的人物、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第二种“观念寓言”，则是通过故事里的人物象征和故事情节，来阐明抽象的训诲或论点<sup>77</sup>。另外，有关地方性研究的民族寓言书写，我们可参考詹姆斯·克里弗所提出的“民族志寓言”（*ethnographic allegory*）。这也与文学的寓言有些许相通之处。文学里论及的寓言，指文本中的表层字面意义借助比喻表现另一层相关的意义，达到指桑骂槐的效果<sup>78</sup>，而“民族志寓言”，则是属于人类学范畴，主要侧重在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和分析，在书写过程中注重叙事文体中个别出现的“声音”（*specific voices within the text*），以致对族群刻画起到文本化（*inscription and textualization*）的作用。换言之，民族志书写不乏透露出作者的道德（*moral*）与无意识（*unconscious*）的指向<sup>79</sup>，因此也是属于寓言性质书写的一种。

写于1958年的〈冷门〉中，故事描写“四婆”在新年前夕病危，不知何故慕名而来的远方亲戚，纷纷打探和尝试觊觎四婆的家产分配（胶林）。经过一番挣扎，四婆忽然回阳，但却被视为“尸变”的她惊吓到大家，最后亲戚之间放弃争夺，故事由此结束<sup>80</sup>。〈冷门〉可看作是马来西亚独立后成为英殖民政府接棒政权的隐喻。文本的四婆是第一代华人移民，而刻画老妇人的病危 / 死讯，呼应马华族群在二战后新兴国家如何“再生”的讽刺。面临新兴政治步步逼迫，四婆不肯般离老屋，坚持终老死守。四婆的出现更是出

<sup>77</sup> M.H 艾布拉姆斯 著，吴松江 等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1。

<sup>78</sup> 廖炳惠 编著《关键词200》，页6-7。

<sup>79</sup>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98-120.

<sup>80</sup> 韦晕 〈冷门〉，见《都门抄》，（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8年），页15-28。

自于一种中国旧传统的延续。但是家国不复，死灰不再燃，四婆与其房屋只是个名存实亡的文化象征一种“历史遗物”（history remnants）。另外，与〈冷门〉相似的〈让位〉中，故事以政治领导人在选举拉票为背景，议决在独立后的马来亚的某个村落，以拆迁废芭来获取建设新区为目的，而此行动逼迫老妇人“陈东婆”拱手“让位”于她的旧住宅。叙述者“古鲁三美”则是从客观角度描述陈东婆，是如何被选举乱象与选举人的操弄：

“先前在椰芭被两人挟持，从木屋出来，被推进车厢。那个像个木偶的老家伙身上穿的，就是这黑绸唐山衫裤”<sup>81</sup>。

后来在陈东婆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在旧宅中奄奄一息过世。故事中频繁出现老妇与“旧唐装”的关系，而文中的新兴政党却被看作是另一波紧接着英殖民后续的统治者，似乎在隐喻某种旧时代必定随着时代洪流被迫淘汰。以上两部作品创作时间虽隔50年之久，但文本中所出现的寿衣、尸变，死灰、僵尸、寿板等死亡意象，与故事设定的新年场景气氛（年货、新鞋子、年红、炊年糕）形成强烈的对比，不时让主人翁不时想回到“月是故乡明”的冲动。在这场看似一场由政治游戏操控着〈让位〉里陈东婆的生与死，背景交织着错中复杂的气氛和意象，在于说明老妇在历史洪流下无论如何挣脱过，它展现的族群间华人在马来西亚政策面临的矛盾与困顿。

故事中不仅讽刺华人生活在以马来人居多环境下的恶劣，也再现了马华社会与种族政治分权的不平等。即便是世代移民生根的华人，也必须不留情面被逐出“家门”和被逐出境外的预言。这说明韦晕对于底层人民的刻画，无论是从内容和形式，都是带有寓言性的。论及寓言书写，必然会联想到詹明信的第三世界“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本文认为，马华文学与第三世界国族寓言是大致上是吻合的。只不过韦晕植根在马华的情况更显为复杂。笔下的国族认同超越第一世界的霸权压迫与第三世界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因此，本文以民族志寓言的角度切入，这更贴切与说明从不同民族如何受种族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民族寓言”。再如，小说〈水墙〉里通过空间

---

<sup>81</sup> 韦晕〈让位〉，见《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页38。

调换的叙事，“王老初”因无法避免时移世易的洗劫，成为在种族体制中的牺牲群体：

“我吗，闭上了眼睛，就看不到前面的光景，把我王老初拖回几十年前，那段幸福的时间去<sup>82</sup>”。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王老初。他的尸体被黑箱车到县政府的[老君厝]（医院）去解剖了……高脚屋外面虽然还有疏疏落落几个看热闹的，不过，显然，好戏已经过去了<sup>83</sup>”。

故事中王老初的儿子因为在二战中作为军补，最后不幸丧命。二儿子因父亲染上肺癆病把他赶出家门，让他孤身一人居住在废弃的巴刹里，导致王老初病逝。有学者指出，马华文学中对于“寓言体”的使用，虽并非适用于任何文本，但其展现的政治性和美学性的效果，可折射出离散、游移、认同及其主客观情境中。以寓言体贴马华文学的书写，更能窥探日常意义下书写主体的暗影<sup>84</sup>。韦晕善于以第一代华人“老移民”与“死亡”主题贯穿其中，起到捕抓在境内消失的传统，也具有“救赎型”的寓言性质（*allegory of salvage*）<sup>85</sup>。攸关疾病、死亡、及病危作为小说的明线，成为韦晕的离散主题有着密切关系。再加上通过第一人称的使用，更能彰显死亡作为某种政治抵抗的张力，以及实现真实的归宿所在。

韦晕深入马来亚社会观察，笔下刻画的不公平及不合理制度，并非是自出于猎奇，而是尝试从在地题材和自身的扎根经历后，达到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反省，与强调马来亚文化的丰富性。例如，在〈都门抄〉里描写道：“红毛鼓吹，唐山鼓吹，马来和印度鼓吹都在大坡和舢板上团团地转……胶园和王梨园成千上万地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混种人！男的，女的和孩子们汇合成人流想大草坪走过”，这个场景则是再现马来亚多元种族社会和平的

<sup>82</sup> 韦晕〈水墙〉，收入《春冰集》，（新加坡：新社文艺丛书，1971年），页25。

<sup>83</sup> 同上，页51。

<sup>84</sup> 高嘉谦〈历史与叙事：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见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化，2012年），页70—71。

<sup>85</sup>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p. 113.

“乐景”。文中后来出现“巫协的大象花车”<sup>86</sup>字眼，也就熄灭了众人对花车游行的热情。叙事角度后来将把视点转移到“八哥”身上，这位因地方选举政策的改良而负担不了生活的主人翁，面临被迫搬迁的困苦。对此，这是从多元种族的背景里增添了几分讽刺，而迎来的则是对马来亚华人的不平等政治隐喻。

卢卡契（George Lukacs）认为，成功的写实主义小说家善于体察周遭日常生活，并从中刻画人物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去塑造具有的“伸缩性”（plastically）的人物性格贴近“现实”<sup>87</sup>。韦晕笔下的这些人物颇有这类的特征，尤其面临在一个多语的社会中，以突现他们适应环境及应变能力。由于卢卡契的说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对韦晕笔下的人物并非能直接对应，不过我们能从中借鉴韦晕具有“写实传统”，更能带出他们作为离散群体的流动性。

## 2、乌托邦与民间叙述

“离散族群主要是因为直接参与了集体的流散和暴力历史（collective histories of displacement and violent loss）的进程，而受到结构性的偏见和历史暴力侵害。因此，当个人身份意识在建构过程中，并不可能因为参与到一个新的国家或社群的建设便能将历史遗忘…离散文化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主体的紧张生活来调试分居的经验，当中隐藏了在此地另寻另一个地方或归宿的渴望<sup>88</sup>”。

韦晕的表述在詹姆斯·克里弗德说法里获得了印证，笔下的华人移民从中国飘洋过海以后，即便再如何尝试认同本土，也敌不过受到当地殖民与文化政治的影响。文本中的人物产生出对家园的距离感，始终以保持一种“离散姿态”应对当地环境。这种在家的离散表述，也不一定就是对“原乡中国”绝对的向往，而是带有某种远端的，想像的乡愁意味在内。

---

<sup>86</sup> “巫协”是属于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协会，在马来亚也另称“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sup>87</sup> Georg Luka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lated by Hannah and Stanle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 205.

<sup>88</sup>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Further Inflections: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the Future*, 1994, p. 308, 311.

有关于祖籍地及其文化符号的幻影，在文本里也不时被召唤而出，以作为突现离散华人的历史伤痕。在韦晕笔下，寻找乌托邦情景和刻画民间叙述里，除了能表现出自于完全同化于本土提出反省与审判，而在家园书写离散之余，也不至于与本土或民间色彩，视为对立的姿态。例如，这个特征主要体现在〈春汛〉里，故事则讲述一位阳光青年“阿菩”，长期居住马来亚东海岸以捕鱼为业，向生活在这岛上少女“阿玉”承诺。阿玉抱着这个梦想与阿菩白头偕老，并承诺迎娶阿玉为妻。阿菩离开渔村捕鱼几年后，发现整个渔村的变化及自己衰老不说，也听闻阿玉失踪或“化为鬼魂”的消息：

“慢慢来，这个小岛就闹起鬼来。夜归的一些渔夫们，会看到小丘上的麻石建立的神庙有闪闪烁烁的火光…那些想赶早出海的渔夫们听到呜咽声，有些说是阿玉的阴魂不散，常常在这海岸游行…阿菩只是看见那座小神庙的衰老态，自己的手就轻轻摸了一下，自己腮帮那凹下去的双颊，长着茅草似的胡须。他叹了口气，觉得离开这渔岛不过几个年头，一切都变得异样…。看了这荒凉的一片，这青年，但心情异常衰老的渔夫再弯下头去，望着自己穿的，仍旧是过去出海那条中国蓝布逢的袄子，只是比过去更加破裂<sup>89</sup>”。

即便隔着渔村与海洋的距离，作者通过对阿菩的细节与肖像描写，我们已得知事过境迁，阿玉最终是否离开了人世无人知晓。当阿菩重返回来岛上，阿玉已随之流散在外，下落不明。文中以印尼民间故事〈香水河〉为线索，不失跨民俗色彩。〈香水河〉的故事叙说一位爪哇王子随着风浪打转而漂流到故事中的这个小岛，便跟渔夫女儿恋爱的故事，以传达一个道德纯净与充满憧憬的乌托邦净土<sup>90</sup>。笔者认为，同样作为喜庆的篇名最后的悲剧也成为一种反讽效果，一再将离散与生死离别的题材，放大为当地人的生存困境，〈春汛〉也被视为一部苦命恋人的悲剧。民族志的深度描写，除了带有在地文化描性质（cultural description）的指涉，也已不再是单纯的再现或象征，而是其具赋有道德的故事（morally charged story）<sup>91</sup>。另外，在〈桃源

<sup>89</sup> 韦晕〈春汛〉，见《春冰集》，页14-15。

<sup>90</sup> 潘钥〈浅谈印度尼西亚四大风物传说的文化内涵〉，见《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页68-71。

<sup>91</sup>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p. 100.

行》里，与其说是仿拟王维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作，实际上是此主人翁“阿丕”听闻山林里的奇珍人物，进入偏远山区寻找道教“降童”的踪迹以寻求发财。当中描写足踏在隐蔽和茂密的山林间的情景，充满着对森林的奥秘和对于原始自然的渴望：

“新村的人全知道了，祖师爷降身指示你们的童子，到高原去找寻那个富翁。阿丕立心独自去那儿干一番事业，即使找不到人，拿不到那笔丰厚的奖金，可是他记起神仙故事中，有一段姓刘和姓阮的入山仙境，给仙女接待的故事。即使没有仙女，山族里的女孩子也够动人心魄<sup>92</sup>”。

当中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情结及情感结构，缔造一种在家园寻找乌托邦式的情景。韦晕聚焦在当地民间与山林的刻画，不乏借鉴华人新村的生活风貌，以突现当时英殖民政府迁移的压力，以及马来亚华人于民间宗教信仰的普遍。故事的视角锁定在马来亚某个设定的山芭中或东海岸的一角，这不就更加贴近了原始、平凡纯朴的乡间生活，恰当的结合民间故事或宗教类元素，书写里暂时远离复杂纷争的文化政治氛围。不少收入在小说集《都门抄》里诸篇描写华人移民及和民间信仰的叙事，当中不少当地华人与移民对于民间宗教的敬畏，甚至利用宗教信仰来谋利等情节，以致传达某种具有共同和集体意识的道德与价值判断。在《降童》、《沉香宫》里，虽然笔墨则转向在华人民间信仰方面，如何借助于神魔力量进行“除恶”，构成幽默和极为讽刺的短篇，作为韦晕建构“民族寓言”的其中一个面向。

另外，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蛇》，故事以“捕蛇情节”贯穿全文，以捕捉“青竹蛇”的骚扰之举，扰乱了公园和周围住户的静谧。韦晕在文中有提示说明，《蛇》的创作背景，于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建国两年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sup>93</sup>：“这里指一九五九年的国会大选，在大选前各候选人都深入各地去宣传，所以最宁谧的地方都变得热闹”<sup>94</sup>。

<sup>92</sup> 韦晕《桃源行》，见《流霞》，页53-54。

<sup>93</sup> 有关此大选的历史背景，请参考黄进发“马来西亚50年：选举型一党制国家的打造”，见孙和声，王国璋主编《风云五十年：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吉隆坡：燧人事业出版社，2007年），页32。

<sup>94</sup> 韦晕《蛇》，见李过主编，《新年的悲剧》，（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年），页10。

“自从九月后，这路边植满了樱桃和素馨数的住宅区，又恢复到过去那一片死寂”<sup>95</sup>。

后来文中出现的“青竹蛇”，虽非毒蛇类，但它的出现却惊扰了周围的民众而引起骚动：

对面河那农夫失望地瞅了低下那条青斑的，不及得一迟长的青蛇，有点责怪的语气向那个相熟的园丁说：这种青蛇什么地方没有？在我们的盖角棚下就多得很啦！孩子们见了都不怕它！<sup>96</sup>”

农夫顺利将蛇捕获，也道讽刺了居在乡村外这户人家的园丁不用“大惊小怪”。虽然此文并明显传达有关离散的层面，但笔者推测，韦晕有意借助基督教中“蛇”的负面意象（魔鬼或邪恶力量的化身），借机讽刺有关马来西亚第一次大选所引起的“热闹”。文中的蛇、捕蛇人员、居民，三者正处于一种玩味的叙事载体。对此，这篇小说与其有一层“政治寓言”的含义，但实际上更多是借由动物误闯住宅区，来调侃选举热潮后的“余温”。故事以第三人称角度，来呈现一个全知，客观、和冷静的叙事氛围，反倒更显韦晕是一个“局外人”来对马来西亚政治进行观察。

史书美指出，离散总有终点，移民融入到社会，离散的情感会随之淡化或消失，而是要移民被视为当地人的机会。不过，韦晕笔下不那么反映，而是试图将马来种族政治（视为另一波被异族“殖民”的态度在内）带来的不平等，选择一种较为远距离的叙事，另一方面也并无对马来亚拥有的热情或认同。此外，当中不乏以象征物与不同民族交织的构图替代，作者以冷静的笔调去建构一种民间论述，比起一般的观念或政治寓言，韦晕所要再现的更多是在于批判其中制度内所建构的民族性质。

---

<sup>95</sup> 同上。

<sup>96</sup> 同上，页15。

### 3、重访〈旧地〉：新马版本之“灰阑记”

有关异族通婚以及与不同族群的互动现象，是新马华文文学常见的书写模式之一。韦晕笔下刻画的欧亚裔（eurasian）及土生华人（peranakan）形象，他们与“离散”、“漂泊”和“家乡”之间有紧密联系，亦是作者致力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亮点。韦晕曾提到：

“要使这新生国土的崭新文艺的长成，彼此各民族得将本族的文化精华撷出，混合成另一种新的文艺，选择题材也如此另这儿的新文艺富于土地爱的气息。「旧地」的短篇小说中，很多篇都是描写新国家的景物和复杂的民族文化交流，然而这只是一种尝试”<sup>97</sup>。

在《旧地》小说集里的同名小说〈旧地〉，可说是韦晕书写民族和立足本土的一部重要作品。这篇小说可看作是作者力图把视角聚焦在故事男主角“杜邦先生”身上。这位早年来到马来亚的北欧的小商人，十年前到访过此地做生意，跟随他一同来到南洋是他的妻子“黛丝”（别名“阿珍”）。杜邦先生性格友好，受到当地人华人的支持与爱戴。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一名同籍背景的朋友“史蒂芬”通风报信陷害，日本皇军误以为他是为英国人效劳，被当成间谍被扣留在印尼爪哇。当时身怀六甲的妻子误听史蒂芬捏造的实情，决心前去爪哇寻夫，不过到了当地后被迫充当军妓。数十年过去，二战已结束半载，杜邦先生从监狱释放，成功返回新马一带。除了以寻妻为目标，他也再度重访当时生活的旧地，曾经是战乱现场如今却成为夜间消费场所，遍布都是酒吧和红灯区，导致寻妻的过程颇多阻碍。事实上，阿珍曾透过身旁人的关系，已经知晓杜邦四处打探她的消息，只不过自己害了肺病及沦为军妓成为人生污点，无颜再见丈夫和孩子一面。对此，〈旧地〉看似通过异族视角的寻根之旅，实际上小说的历史背景是源当时新加坡于1950年12月年间发一场为期两天的“玛利亚暴动事件”（Maria Hertogh Riot）。有关于这场种族暴动的导火线，也在故事中透露一二：

---

<sup>97</sup> 韦晕〈题记〉，见《旧地》，（香港：东亚书局出版，1958年），页148。

“那当口播音台播放着玛利亚事件的新闻时，这班（英国）绅士们只垂底了头在喝着冷酒。这高贵的俱乐部恢复了寂静<sup>98</sup>”。

玛利亚事件是在殖民时期有关生养与寄养父母一场争夺抚养的官司。最后演变成种族与宗教冲突的暴动血案，成为当时新马重大种族暴动事件之一<sup>99</sup>，对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暴动简述。“玛利亚暴动事件”是有关荷兰少女“玛利亚·赫托”（Maria Huberdina Bertha Hertogh）于1937年出生于印尼爪哇的西部“芝麻虚”（Tjimahi）。她的父亲 Adrinaus Petrus Hertogh 是在1920年期间驻扎爪哇的荷兰皇家东印度群岛的陆军军官（Royal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Army）。玛利亚一家早年是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是属天主教徒。直到二战爆发期，父亲沦为日治时期的战俘（prisoner of war），其家眷在逃亡时母亲将年幼女儿托付给居住在马来亚的妇女“安米娜”（Che Aminah）抚养。玛利亚的童年随着养母从文化习俗、语言、穿着，都皈依回教信仰、语言。二战结束，玛利亚父亲从监狱释放，举家回返荷兰之时，尝试寻找玛利亚的踪迹边尝试将她接回国。不了玛利亚面对父母亲的文化与认同上备感生疏，便没有意愿回到原来的家庭，另一方养母不放弃寄养权，双方提交法律诉讼。由于玛利亚在宗教和认同身份的模糊，便引起回教徒和荷兰天主教徒大列的反响和舆论，加速冲突的前奏。对此，殖民地警方镇压回教徒的抗议，酿成社会暴动，造成18人死和多达173人受伤，而玛利亚最终也回荷兰<sup>100</sup>。

笔者认为，这场种族暴动“事件”也成为韦晕〈旧地〉笔下有关离散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启示。发生在新马的“灰阑记”，是如何与比较文学中灰阑记的异同？在比较文学的谱系中，“灰阑记”作为具有跨文化和地域的题材和主题，最早的雏形是《圣经》里《旧约·列王纪上》的〈所罗门断案〉、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元代李潜夫《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佛经《贤愚因缘经》故事；到了中西现代语境中有香港作家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以及布莱希特舞台剧《高加索灰阑记》。在横跨与交叉在中西文化里，“灰

<sup>98</sup> 韦晕〈旧地〉，见《旧地》，页33。

<sup>99</sup> Syed Muhd Khairudin Aljunied, *Colonialism, Violence and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ria Hertogh Controversy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28-130.

<sup>100</sup> Syed Muhd Khairudin Aljunied, *Colonialism, Violence and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ria Hertogh Controversy and its aftermath*, p. 16-21; Tom Eames Hughes, *Tangled Worlds: The Story of Maria Hertog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0, p. 1-17.

阑记”的母题离不开“孩子争夺抚养权”，其中则是从不同宗教信仰、舞台剧的陌生化、中国古代法律；以及西西对“97大限”香港回归前夕的困境为背景。“灰阑记”故事无不从法律之争、国土之争，甚至到了有关“国族认同”的方面，也构成比较文学中具可比性的对象。中西方比较文学学者认为，主题的变义取自于作者能随着不同场合，以及如何赋予母题的主观性和思想性，因此这样母题和主题两者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历时与共时的两重性<sup>101</sup>。

从平行比较角度看待〈旧地〉，它则属于一部南洋版本和本土化了的“灰阑记”母题再造，当中更看重的是主人翁离散与寻根主题。只不过故事中削弱暴动中的血腥暴动和权审判等情节。无论韦晕是有/无意识对于跨国文学主题和玛利亚事件的改编，但其中再现和突出当时殖民时期多元种族，华人与非华人的互动结果。因此，作为灰阑记母题在“旅行”到新马华文文学语境后，也发生了转变。〈旧地〉中以杜邦先生为主角，在他的形象塑造方面，身为讲得一口流利华语的“混血北欧人”，因此早年结缘于当地华人“阿贵”，使杜邦在入狱前夕将儿子“米奇”托付给他照顾。米奇在阿贵的经济能力范围下，有机会到国外生活深造：

“杜邦，你们在欧洲，还不知道我们怎样挨苦的托大了米奇，那时黛丝又没有踪迹<sup>102</sup>”。

杜邦寻找米奇的踪迹：“领事馆向我报告，花了很多钱，我才把孩子找到。这几年来，那孩子也着实逗着老粗的欢心。但阿贵得知米奇要被带走了，也不由的他老粗怒气<sup>103</sup>”。

过了数十年的光景，米奇被送到国外念书，不久将回来与亲身父母相认。当杜邦先生得知米奇决定回来探望时，便写信给父亲说要来新加坡度假。与此同时，儿子这次回来主要是希望能与母亲阿珍相遇。不过杜邦在寻妻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家三口的团聚过程实在曲折。〈旧地〉虽然已脱离原来

<sup>101</sup>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218；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页141。

<sup>102</sup> 韦晕〈旧地〉，页30。

<sup>103</sup> 同上。

法律和严酷的灰阑记中有关母题，与其从尊严政治与严肃的法律问题，到了韦晕笔下成为一段寻根之旅。从小生长在华人家庭的他，米奇在这个华人家庭的能力范围下报送美国留学。趁着暑假，儿子回国度假与杜邦先生相逢时，但是儿子对南洋的记忆是缺席的。故事中的米奇成为虽是混血形象（creole），属于“后移民”的类型。俩人代表了迷失和脱节在时空的主体，是续杜邦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形象的延续，也是这是王德威提认为的一种错置的解散，也是再措置的结果”<sup>104</sup>。有鉴与此，相对父亲的米奇对这个殖民土地的认同却不以为然。或许米奇就代表着新兴国家诞生的隐喻？或是全球化移民叙事在韦晕笔下逐步展开？这些乃值得深思。当儿子来了马来亚半岛之时，因为自幼被父亲送到北欧生活，作为不属于移民，自然视父亲的“马来亚”家乡为“另外一个故乡”。当父亲对他说起他的回忆，米奇却瞪着红灯码头的驳船灯火：

“米奇只是个大孩子，他杜邦的意思他懂得啥呢？…孩子沉醉在海的怀抱中，给爸这末一问，倒证了一下，噙着沉默的微笑，点了点头<sup>105</sup>”。

以“灰阑记”为母题，<旧地>的宗旨意在突出主人翁回归“母国”（马来亚作为母亲国）的隐喻，令人吊诡的是，主人翁在身心方面扎根马来亚之后，却找不回从前的“家乡”，体现在家的异乡人（a stranger at home），展现在家的无奈，是要留在此出或者离开皆是个未知数。杜邦先生对马来亚本土的诠释，持有若离若即的态度：

“为了怀念自己的过去和那分把东方和西方的情感融洽的憧憬，这绅士不只一次雇了出税汽车，到旁海滨的山芭去，他竭力的想拾回十年前那片碎梦<sup>106</sup>”。

“你别小瞧了这污浊的河流，它却比欧洲莱茵河更赋予诗意，不是嘛，这河流曾经用过亚洲人的鲜血冲激过这大地的污秽<sup>107</sup>”。

---

<sup>104</sup> 王德威 <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页6-7。

<sup>105</sup> 韦晕 <旧地>，页38。

<sup>106</sup> 同上，页11。

<sup>107</sup> 同上，页38。

放在比较文学视野中，跨文化的母题与〈旧地〉中的主题有显暧昧，其中更加突现杜邦与米奇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随着二战的结束和革命年代的去，遗留下来的是寻找逝去的回忆。即也是对南洋故土的寻根之外，也体现一种对家园情怀的吊诡。杜邦先生的“恋家”（homesickness）程度之所以产生，无疑是对过去家乡的神话（myth）贯彻在想像之中。乡愁并不表示一种思乡情绪的向往，还有对缺席者的渴望（longing for an absent）。这样的情感渴望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对家中痕迹的记忆，反而更能突现缺席者个人对家的向往，反倒对家产生厌恶感（sick of home）。就此，与其说〈旧地〉等于“灰阑记”的改写，小说中里的杜邦先生并非是单纯历史中玛利亚生父的模仿，韦晕从中小说化的处理，从族群和阶级的角度切入，更显玩味：

“作为一个被皇军和她们走狗的搜寻的白种人，当时青年的商行雇员杜邦，白天像耗子一样，躲在亚答屋后的防空壕<sup>108</sup>”。

反之，〈旧地〉里的人物、题材或设定的场景，毕竟中西方版本的“灰阑记”大不相同，虽不能相互媲美但可有所借鉴。以杜邦先生的角度来看，最终目的在于与妻子破镜重圆，从战后的创伤走出。这里不乏折射出一位混血北欧人对于马来亚风情的强烈认同与坚持，但因自己暧昧身份在英殖民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在生计和认同无法如以往在社会立足。从反对原乡论的角度来看，原乡之神话有强化民族意识的功能，但即便在眼前出现的“家园”，因诸种在政治上、意识形态或社会印象所构成，这成为主人翁非记忆中的客体存在，所谓“原乡”或“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sup>109</sup>。换言之，马来亚对杜邦而言是充满隔阂与陌生的地方。韦晕版本的“灰阑记”并不是纯粹的如国与国之间争夺抚养权或是是非对错的道德审判，则是借助历史真实事件，关怀非华人的身份、文化、族群，以及寻根与认同。这或许想要道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协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妥协（compromise）的关系<sup>110</sup>。本文认为，〈旧地〉除了解构原乡神话之余，通过以代际辈份的分离，亲疏

---

<sup>108</sup> 同上，页11。

<sup>109</sup>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p. 91.

<sup>110</sup> Homi K. Bhabha,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s.,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16.

关系以及族群景观的刻画，将“灰阑记”再诠释以致更加“在地化”和“民族化”，突出离散群体与当地文化政治的辩证。

另外，写于1968年的小说《流霞》，叙述一位名为“阿霞”的年轻女子，因丈夫阿康患病，急需大笔巨款治病，才被迫到南洋当交际花，被富商保养后改名“花妮”，自己女儿也就托付给在香港的姨母抚养。时隔多年，女儿长大，闻见母亲的职业而倍感羞愧。花妮飘洋过海谋生，却得不到相应的解脱，身理上和心理始终“没有束缚和归宿”，居住的豪宅象征“监狱”；最终不过庆幸那位富商并没有把自己困在那件种满了棕榈树德洋房里囚禁，甚至折磨到死，把自己送回自己的故乡来<sup>111</sup>”。作者借由花妮身不由己的身世，在故事中逐渐被放大和丑化，即使女儿不肯与她相认，最终以回到自己的相干故居仍感到欣慰。《流霞》这篇小說的场景则是扣紧马来亚与香港之间，当中对于“家乡”的归寻也是落在寻子的目的之上。由此看来，韦晕笔下的“灰阑”不是由粉笔在地上划上的圆圈，而是借助主人翁的跨国印记，再现对母国文化的抉择，由寻根、寻子与寻女为隐喻。

由此看来，韦晕自身的在场性书写位置解构自身的文化体系，重新开启马来亚民族书写的向度。作品中所使用相关的民间传说、历史事件、或是相关的隐射对象，都是逐步体现韦晕建构在地离散的基础。无论是蛇、死亡意象、印尼民间传说的穿插、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选举、乌托邦的净土；或是杜邦先生及其他们的子女所建构的移民或“遗民”的角色，皆能看作韦晕朝向书写在家的离散叙事的面向。这也能说明韦晕通过对在地的观察，衍生对马来亚本土的深层和复杂的认同面向。

## 第二节 殖民话语与文化协商

按照后殖民理论家的说法，后殖民（post-colonial）其论说，意指殖民者来到殖民地开始殖民或登陆的第一刻，就以先入为主和较高阶级的角色代表，对当地文化族群进行文化和地域的统治<sup>112</sup>。韦晕曾翻译过丹麦作家约翰内斯·威廉·延森（Johannes Vilhelm Jensen, 1873-1950）一篇散文

<sup>111</sup> 韦晕《流霞》，见《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页83。

<sup>112</sup>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Empire Writes Back: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9.

〈奥莉维亚·玛丽安〉。威廉·延森曾到访印度、中国、马来亚与美国等国家旅行。这篇散文讲述作者到访印尼爪哇“贝登索格城”，看见新加坡开埠者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1731-1826）妻子“奥莉维亚·玛丽安”（Olivia Mariamne Devenish, 1771-1814）的坟地。有感而发写下了悼念文。文中描写莱佛士在成为爪哇总督后，奥莉维亚·玛丽安与孩子因没办法适应热带的环境而相继逝世：

“这些小生命都保留着母亲的容貌，母亲灵魂的最后一线光芒，玛丽安血统最后的温暖。白种妇女很难在热带上住上多年，儿子死亡后第二代的白种人稀少了，第三代更在未知数…这些子民的强项性格，无论怎样，都以延伸了英国的势力…百年以前，一切东西都远比我们所想像的困难，热带现在所有的安适不多，酷热是消耗的敌人，疾病的天然发生是不明白的<sup>113</sup>”。

在约翰·参逊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记述英殖民者开埠背后的一段心酸史，也描述莱佛士登陆后在爪哇任期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面临这热带环境带来的重重考验，让开埠事业难上加难。全文贯彻一部具有“白人负担”（white men's burden）的殖民叙事。虽然有关韦晕选择翻译这篇文章的动机已无从考据，但仅能在这篇文章所展现的，英殖民者在马来亚半岛留下来的殖民文化的，是经历了几代人眼里，根深蒂固的历史事实。韦晕曾坦诚指出，面临新马多元社会里所根深蒂固的殖民文化熏陶，要进行“去殖民”是困难的<sup>114</sup>。从后殖民角度来看，再结合这篇译文与〈旧地〉对应得以表现，欧亚裔形象的刻画虽然是跨文化的代表，但面临文化焦虑和逐渐失根的依赖尤其文中所展现的背景一开始在公民权身份上的模糊，到争取为当地公民的过程<sup>115</sup>，体现了身份转换的挣扎与融入的曲折。因此，这段殖民话语嵌入在族群之间的辩证叙事，展示了对族群文化的刺激与分化，作为离散族群刻画与在地之间的协商。

---

<sup>113</sup> 韦晕译，约翰·参逊著，〈奥莉维亚·玛丽安〉，见《学非所用》，（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60年），页16-21。

<sup>114</sup> 韦晕〈后记〉，见《旧地》，页145。

<sup>115</sup> 温任平《马华文学板块观察》，（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页98。

## 1、被视为“他者”的离散族群

借鉴印度人类学学者阿君·阿帕杜莱所指出“缺憾与焦虑”（anxiety of incompleteness）的说法，人类在社会中与不同族群和文化习尚的交往中，不免会面对异文化而感到焦虑，这与文化在社会的流动性速度息息相关。这种关系介于一种“非稳定关系”（volatile relationship）而具有所谓“威胁性”的象征，大部分原因涉及有关认同的纯度与本质论（purity and relationship to identity）<sup>116</sup>。这种认同焦虑可从韦晕所刻画的英国白人、欧亚裔和峇峇形象中便知一二。尤其后二者代表社会的少数（small number），它们的成为社会主流和普遍的居间甚至边缘族群（between majority and totality）。借此，从族群的角度切入，我们能发现韦晕通过这些族群景观（ethnoscape），再现离散（非）华人形象与在地认同的辩证，拼凑出殖民文化与文化杂糅的话语，不过，当中是否就有隐含了（去）殖民的愿景，来刻画这些离散的族裔形象？

据之前的观察，韦晕居多以华人的视角，来批判在马来西亚政治下的华人如何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象。他也试图从异族和混种人的视角对于族群和国家认同的思考。紧接着继续以〈旧地〉为例，杜邦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事中除了突现出他对华族妻子以及儿子的重情义、厚道、念旧，也极力打破“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的欧洲中心主义形象。杜邦先生到处寻找寻找害肺病的华族妻子，却被英国人视为污秽和倒霉的象征，而频频受到这些自认贵族的歧视：

“这一天，那高贵的外国人俱乐部却聚着几个绅士在喝着蜜酒，兴奋地谈得耳根也涨红了…（省略号由笔者所加）。到杜邦闪身进去时，这班把玻璃杯子愤激碰着的绅士们冷冷的撇了他一眼，沉默下来，连那个从前每天都跟他喝酒玩桥牌的史勿夫也只冷淡地向他打了一下招呼<sup>117</sup>”。

<sup>116</sup> Arjun Appadurai,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6, 11, 52-53.

<sup>117</sup> 韦晕〈旧地〉，页32。

俱乐部内的场景象征一个小殖民地的缩影，酒客们代表大多数的英国白人<sup>118</sup>处于优势地位，而杜邦顺理成章就成为一个劣势，就连在俱乐部的华人管事也因杜邦先生的关系也一并被排斥：

“自从那北欧绅士跟自己探听了从前几个朋友的下落，厮混热了些，就连那些从前跟他很合得来的士勿夫都把他冷落下来了”<sup>119</sup>。

之后杜邦先生说道：“我不是荷兰人，怕什么”<sup>120</sup>。

文本中始终离不开有关“玛利亚事件”的穿针引线，可见英国白人将暴动事件的荷兰人与北欧人身份并列，将杜邦与华裔女子通婚看似有损了血统的“纯正度”，树立一种顽固的种族主义与血统的偏见。据学者的观察，虽然欧亚裔人口的比例是仅次于印度和马来族群，是新马社会中的“少数族群”，但在新马社会他们是缺一不可的族群。也有学者发现，相对于华族、印度族和马来族，他们如何在社会与其他族群的同化与相处，更多是出自于生存的必要<sup>121</sup>。早在16世纪，葡萄牙殖民势力来到马六甲，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西方势力来到马来亚半岛贸易开发，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后来提出的“多元合成的殖民主义”（mottled imperialism）说法<sup>122</sup>。17世纪荷兰殖民时期也与当地土著或华人通婚，后代的族群在当地的发展后，形成所谓的欧亚裔族群。在荷兰殖民退守后，由英殖民承袭殖民政府，欧亚裔需要重新适应当权殖民者的势力，身份也因不同殖民政权受到动摇<sup>123</sup>。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长篇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里描述英国殖民者的眼光，看待欧亚裔为“他者”，从中展现殖民者对于少数民族藐视

---

<sup>118</sup> 有学者指出，效忠英殖民政府为 colonial lackeys，一种带有贬义和刻板印象的称号，见 Myrna Braga-Blake, Ann Ebert-Oehlers, Alexius A Pereira eds, *Singapore Eurasians: Memories, Hopes and Dream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7, p. 23.

<sup>119</sup> 韦晕 <旧地>, 页34。

<sup>120</sup> 同上。

<sup>121</sup> Myrna Braga-Blake, Ann Ebert-Oehlers, Alexius A Pereira eds, *Singapore Eurasians: Memories, Hopes and Dreams*, p. 7.

<sup>122</sup>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s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 p. 5. 对于此概念的提出，安德森目的在于肯定东南亚自19世纪前，甚至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与不同殖民者的交往与殖民经验，而形成不同层次的“帝国主义历史”，其中也瓦解了历史性的霸权势力，反对“民族主义”以偏概的方式来阐述东南亚历史与其定位。

<sup>123</sup> Myrna Braga-Blake, Ann Ebert-Oehlers, Alexius A Pereira eds, *Singapore Eurasians: Memories, Hopes and Dreams*, p. 22, 24; Ronald Daus, *Portuguese Euras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p. 68-69.

的态度。这些欧亚裔在面临失根焦虑（loss of place）和缺乏归属的情况下，成为“后遗民”的一份子。就如拉康所言，没有“他者”（the other）的审视，就不可能出现有“我者”的认知。这也说明一个主体经历离散的洗礼，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要进行同化似乎是不可能的。

〈旧地〉中的“英国白人”则是通过认同与维持他们在英殖民地中所谓的“意识形态”与谱系，来持有所谓的优越感去漠视“非白人”族群为异类他者，说明族裔的建构是依靠殖民者的殖民事实，所带出的象征性含义（symbolic in character），从而展现族群之间的优越与卑劣之分<sup>124</sup>。族群（ethnic）或族裔（ethnicity）两者可视为一种共同体，但成员之间有一套共同的遗产，即由共同语言和文化来强调“共同祖先”的说法与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互相认同，并与其他族群进行识别<sup>125</sup>。出现隔阂的情况是因族群间缺乏一种相似的认同（lack of resembles of common ethnicity）<sup>126</sup>。这有助于我们离家离散华人与流亡海外的欧亚裔，在当地求存的生活经验的紧张。

换言之，韦晕承认白人的生存合法性，但一方又不能忽视处于少数的欧亚裔族群，一方必须忍受主流“英国人”群体的偏见。〈旧地〉中的杜邦、儿子米奇、英国白人，或阿贵第一代华人移民，可展现多重角度，在解构了“夷”与“遗”的关系，成为一批被主流社会排斥，并且他们需要通过跨界流动来获取自我认同与归宿。且说二战过后新马华人在社会的认同已经超越族群（方言、地缘、血缘）范畴，不再以马来人、华人、异族人划分优先地位<sup>127</sup>，但文中揭露了处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人仍然将自己视为国族的象征，其余种族则是由不同的族裔和族群组成，形成“国族一族裔”的张力。这样情况或许让韦晕意识到，“英国人”与“欧亚裔”/“华人”和“非华人”之间，以及华人移民如何“凝视”混种人的观看，而混种人如何带着不同的“眼光”看待华人，形成复杂玩味的关系。

<sup>124</sup> David L.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6.

<sup>125</sup>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 21-31.

<sup>126</sup> 同上，页1-5。

<sup>127</sup>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页6-7。

再如，〈使徒行传外记〉里讲述的是一段混血后裔“士蒂芬”。因身世“不明”而自幼被社会歧视。为了向社会报复和换回尊严与认同，他不惜沦为“汉奸”。“汉奸”是韦晕正想要批判的对象，但其中不乏有另一层主题，就是阐述有关“离散混血后裔”的叙事：

“我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个弃儿，从小就给人们看不起、妒视，和丧失了自尊心，直到“一天杜里斯神父到一个甘榜去传道才把这个弃儿养过来，在修道院长大…（省略号由笔者所加）他的妈妈是个娘惹，跟一个欧洲海员同居生下他。那海员回国后，母亲又跟了另一个中国人，士蒂芬的传奇身世就这样流传开来<sup>128</sup>。”

虽然年幼士蒂芬被神父收养，再遇到了“我”（老移民）之后，还是躲不掉世俗的偏见，周围的眼光不时在他的身体和精神上施暴，因此积累满腹委屈与憎恨。因长期受到这种“血统论”的指控，也养成了自卑和扭曲的个性。为了摆脱身份认同的危机，他选择投靠日军，沦为汉奸，“穿了白反领的黄衬衣，装扮的跟东洋人那样，带着 [映] 慰安所的藤田所长在这小坡一带的以色列人和欧亚混种籍人的集居地打滚”<sup>129</sup>，改名为“小喜林一”，四处残害无辜百姓。这个身份也就成为他报复和发泄的利器。在光复后，生活在马来亚的欧亚裔反倒集体追捕名为“魔鬼”的士蒂芬。他失去了日本殖民这个“靠山”之后，沦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笔者认为，韦晕虽然表层上是处理有关反军国主义题材，但背后也借着士蒂芬的“身世”来批判这样的“血统不纯之说”，间接揭示在“多元文化”社会背后族群之间内部的紧张与隔阂。在这两个主题相继呼应下，折射出一段离散混血后裔悲剧，士蒂芬就代表了被“族群化”和“边缘化”的离散群体类型。

相对在〈旧地〉里杜邦先生的遭遇，同样也被英国绅士瞧不起。虽说两位男人翁的结局大不相同，但两者存在相似点：其一、混血、异族形象已背负着“英化”的刻板印象，他们在马来亚社会必定遭受歧视，而被其他族群的排挤，亦成为理所当然；二、华人在殖民社会始终被视为“外

<sup>128</sup> 韦晕〈使徒行传外记〉，见《乌鸦港上黄昏》，页99、100。

<sup>129</sup> 同上，页103。

来者”，身上被赋予了“中国性”的原罪，他们不仅不被殖民社会承认，连与他们往来的混血群体也遭受同样的待遇。应霍米·巴巴的话，当西方的人民成为了“公民”，而被殖民的人民却变成了悲惨的主体<sup>130</sup>，他的论说无不没有道理，并且能提供我们一些启示，即一种离散族群与当地殖民地社会之间的隔阂，以致难以融入，成为在地的放逐者。

## 2、华人眼中的异族形象

对此，韦晕欧亚裔形象属于少数民族，主要是给予前者同情和批判殖民文化的优越感。但吊诡的是，笔下的土生华人“峇峇”形象，则是他嘲讽的对象。尤其不少早期新华文学作品中，多有从种族识别、阶级分化的角度<sup>131</sup>，以中国中心主义及排外主义为衡量标准，扭曲土生华人的形象。例如，在丘士珍《峇峇与娘惹》、方北方《娘惹与峇峇》、铁亢《洋玩具》里，这些土生华人的刻画，主要以奸商、崇洋媚外、文化失根等形象在文本里出现。至于韦晕，他则是从一个离散者的角色窥探在异域流亡和少数族群的形象。虽然对于殖民主义有所批判，但在文本中殖民者的“现身角色”是缺席的。

除了对“欧亚裔”群体抱着同情的理解之外，韦晕对于峇峇的“凝视”，也是促成书写里另一个难以抹去的刻板印象。例如，在〈热带海洋上〉故事，叙述者以一位“老番客”在船上与峇峇的交往，不乏对他的趋炎附势的态度表示反感：

“这个老番客倒醒觉了，躺在自己身边那个一脸丧气的中年峇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溜了，可一回想起昨儿风雨中那家伙恶畏缩哭丧脸，那畏死贪生的神态，心坎里就差不多笑出来，连骨节的疼痛也忘记了，只轻轻地诅咒了一句：「真是江山易改，品性难移！」<sup>132</sup>”。

我们可以发现韦晕在塑造华人与非华人形象之间，或许本身也含有某些“中国中心论”的角度看待峇峇。当中除了讽刺不雅举止，也对他人

<sup>130</sup> 生安峰〈后殖民性、全球化和文学的表述：霍米·巴巴访谈录〉，见《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页36。

<sup>131</sup>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7年），页132—137。

<sup>132</sup> 韦晕〈在热带海洋上〉，见《乌鸦港上黄昏》，页70。

充满仇视深感不满。此外，〈今宵〉里描写南欧与北欧的女性风姿：“那些北欧或是北美洲的娘儿们的头发，给阳光一照射，连苍白的甲板也镀了金，但是耐久个南欧女人，整个铜体都充斥着地中海气候，连暗赤了的发鬓都喷着火花<sup>133</sup>”，当中参杂了异国情调和些许调侃的意思在内，把族群和种族问题美化和国际化。对此，从韦晕的意识到“文化杂糅”对建构本土意识的重要性。

纵观以上小说里的人物肖像，在某个程度上从“中国中心”的角度批评或将这些异族“他者化”，尝试丑化这些效忠殖民文化的遗民子弟。有学者研究指出，土生华人在新马社会中，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如：饮食和衣着方面主要是偏向马来化、思想文化是沿袭华人的传统习俗，而教育层面是接受了英国人的教育理念，政治倾向于大英帝国，所以他们是属于“三元文化的合体”。另外，在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居住在市区的土生华人，他们有机会与英殖民政府接触，成为欧洲商人的合作对象，以及充当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中间人”（middleman），所以受到殖民政府的重视<sup>134</sup>。就如新加坡土生华人的先贤之一宋旺相（Song Ong Siang），自豪的认为自己是“效忠于英殖民地之子”（The King's Chinese）<sup>135</sup>。

由此可见，他们以英国子民自居，这与在19世纪初20世纪末的移民潮的中国移民形象（多数是以苦力、契约劳工（猪仔）居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分化，两者之间是有明显的区别，也形成两种不同华人的特征。为此，新马华文作家眼里，这里也可以包括韦晕，笔下刻画出具有负面含义的峇峇，当中也不免也夹杂着些许的“偏见”。

不过，与〈使徒行传〉和〈今宵〉不同，在〈暮紫〉故事中，它缺乏种族之间的漠视和冲突，文中以“我”和“菲莱亚”先生两人相处融洽的背景。韦晕通过使用第一人称的“我”，回忆起在送别曾在二战时期帮助逃亡的欧亚裔“菲莱亚”。菲莱亚原是曾经担任新村移植官一务，在他的掩护下“我”顺利逃过日军的铁蹄。在过程中生动描绘两人的一见如故，

<sup>133</sup> 韦晕〈今宵〉，见《新社文艺》，（星洲：教育出版社，1967年），页76。

<sup>134</sup>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226；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页60；崔贵强《星马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

<sup>135</sup> Song Ong Siang, "The King's Chinese: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6, p. 38-44.

深厚的友谊，加上菲莱亚的经历与“我”相似，年少时离开了故乡，而他辞别北欧的故乡，驻扎在东北、山西，甘肃等一带的医院服务，直到二战时期负笈南洋：

“虽然是个欧亚裔，却只像东方民族那么短小，更难得的他却有着一颗爱护东方民族的心……他没有一些白种人的优越感……这位异国朋友常跑了一段不近的路来到我那儿聊天，喝东江山茶，吃落花生<sup>136</sup>”。

“我爱这爱好和平的民族根爱护我自己的祖国一样”，道出菲莱亚中心形象。在菲莱亚与“我”离别时说到：“总希望咱们会在东江沿岸再会面，不然能在香港的浅水湾滩头漫步也好，我是那么热爱着东方！”，体现这为欧亚裔如何“拥抱南洋”的热情，为此塑造缺少如欧洲白人的形象。最后，小说末端以一条“三藩市十九日综合电”结束故事：

“ [肤色歧视打击了跳水冠军]

——园丘主人轻视李三美。

原文标题：Colour Bar Hit Diving Champion

Estate Men Snub Sammy Lee

我心里正自庆幸，这种极大的讽刺没有抵触到菲莱亚的眼帘<sup>137</sup>”。

〈暮紫〉进一步突现以非华人的视角，来建立一种离散与“再离散”的面向。这除了在抑制以华人为视角的道德审判，菲莱也通过不断旅行的行为，显示出对他的文化身份以及异文化的见解，呈现一种包容和温和的态度。介于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欧亚裔从一个殖民地出走，或许也是与冀望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认同，从一种内在离散 / 放逐（意识性的）转向“外在离散”的向度。这不仅联想到曾行脚于东南亚的欧亚裔韩素音医生兼作家，曾于1960年8月在《东方视野》杂志 *Eastern Horizon* 里发表 ‘Social changes in Asia’<sup>138</sup> 一文（中译“亚洲社会的变化”）。文章探讨在亚洲觉醒下，人性的再发掘。她从东方社会语境与经济前景对女性地位的关心

<sup>136</sup> 韦晕〈暮紫〉，见《旧地》，页77。

<sup>137</sup> 同上，页80。

<sup>138</sup> Han Suyin, Social Changes in Asia, in *Eastern Horizon, Monthly Review* Vol 1, No.2, August 1960, p. 12-18.

，结合文艺复兴以来至席卷六十年代全球社会运动背景下，展开对第三世界的“亚洲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sia）论述，并对亚洲人的期待提出重要启示：

“今时今日的亚洲人，已不再相信“自由”是上帝能够恩赐的。人民的自由和自主，是通过人为行为举止（made by man），而这些举止主要遍布在衣食、住所、社会上的保障、生活工资、社会正义、教育体制上，亦是人们必须所要争取的东西…在西方成千上万的人有的而东方人所缺乏的情况下，正是我们在这场亚洲革命中，人的生存基础是会改变的<sup>139</sup>”。

本文认为，这篇文章或许与韦晕在塑造欧亚裔形象，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处。韦晕在〈人权种种〉散论里略有提及，他曾对于国际局势的关注、反对种族歧视，也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尝试从一个社会风气的大环境以普遍的“人本主义”出发，将自身放在亚洲场域中思考人、族群与跨国的问题，这些是值得借鉴的<sup>140</sup>。在这样的文化建构的过程，无论是华人或欧亚裔，他们始终是交织在社会与身体政治之间不断“混合”的过程（process of hybridity）。基于大同的人文主义理想之下，韦晕塑造的部分异族形象虽具备超越种族与国族论述，不过在未彻底解殖民的前提下，〈暮紫〉的菲莱亚从一个殖民地“离散”到另一个殖民地“香港”，形成对马来亚在地认同的吊诡。他即抱着持有“热爱东方”的价值观，最后却选择“再离散”的移动。由此可见，去殖民的话语在韦晕笔下更显讽刺，然而这也能看出对笔下对殖民主义的理解，也并非铁板一块的“负面形象”或论述。

如此，针对以上所分析的，韦晕塑造族群景观与离散主题下，提供两种面向：一、韦晕书写中摒弃一般白种人的身份优越感，加以同情被边缘化的欧亚裔群象，其中也超越一般的宗教和宿命论，体现他们与在地华人的和谐面貌与关怀；二、文化杂糅看似在多元种族社会下一种“乐观”

<sup>139</sup> Han Suyin, *Social Changes in Asia*, p. 12-13, 英语原文如下：“What do Asians want? Today’s Asian no longer believed that this freedom will be a gift from gods, they know it will be a freedom made by man. This drives men into action: food, shelter, social security, a living wage,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what millions in the west have got and what millions in the East do not. In this enormous revolution of Asia,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s of the person also change”.

<sup>140</sup> 韦晕〈人权种种〉，见《馥尘集》，（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8年），页116-117。

的表现，不过也是在地华人或欧亚裔面临离散，漂泊无根的后果。换言之，“文化杂糅”是韦晕建构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当中也存在了对阶级与种族的差异与偏见，正是面临无法“去殖民化”的窘迫。因此，笔下对于混合文化的再现，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就如萨义德给我们的启示：“后殖民时代是思考殖民主义的历史经验”，韦晕是否在进一步针对去帝国主义并加以批判，英殖民主义带给离散华人也好，异族形象也罢，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创伤？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马来亚社会的文化政治与英殖民风气紧密联系。

### 第三节 聚焦境内离散叙事

韦晕对马来西亚本土的种族政治，以及英国殖民文化所衍生的批判意识，可视为“在家写离散”的重要文化背景。吊诡的是，韦晕是否有明确进行去殖民化的立场，在此是有所保留的。或许从有关族群论述的部分开始，我们得以发现所谓的殖民话语与离散，他所对于殖民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扩张较有保守和温和的态度来对待。

本文认为，“去殖民化”或“反殖民”是作为韦晕立足马来亚本土书写的指标，但两者未必是处于对等关系。前者是在于承认殖民文化传播的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后者是在认知了殖民主义的霸权，有起到反抗或逃避的意念/行为。对此，当韦晕把视线投射在马来亚新村的刻画中，大部分更是从反殖民的角度，以此批判殖民主义实际的“暴力”行为，在文字中刻画另一波“境内离散”的现象，展现集体的创伤叙事。

#### 1、无“家”可归：新村印象

另一个能连结殖民话语与离散之间的关系，是韦晕笔下有关新村印象的叙事。本文认为，韦晕对新村（new village）的刻画，不仅作为一个文化意象，也能代表一个属于马来亚历史语境中特殊的“离散空间”（diasporic space）。当中不仅围绕了南洋本土风物，也贯彻和深化离散书写和向度。处于殖民地新村作为离散空间，也代表着马来亚境内的特殊地理格局。在大历史叙述下，除了早期移民潮作为华人跨界流动，新村的迁移

也能看作是马来亚人民针对“再移民”浪潮下的后续。虽然移民的规模不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潮相比，但其英殖民定制了系列剿共政策，而华人就在这个体制下面临失去家园，创造出另一种离散的迁徙。对此，在接触有关新村风貌的韦晕，曾有感而发说道：

“过了紧急法令一段时期，那小镇的居民给迁移到附近的新村去住，那些爱土地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的农人，逼得群莺乱飞，有些搬到文东岭去，继续菜农生活，有的索性改行了，搬到城市去谋生…<sup>141</sup>”

文中描述搬迁到新村居住的居民，看似一场在州府内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人民必须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从境内迁移到大城市的过程令人感到不安与焦虑。韦晕在马来亚场域中折射出的离散意识，虽说范围较为小，却有相当的历史意义。他在笔下常以“蒙古游牧民族”和“吉卜西”<sup>142</sup>族群字眼，正是用来形容迁移到新村的人民的比喻。

在1950—1954年间，英殖民联邦政府制订“毕礼斯剿共计划”（Briggs Plan），将住在胶园或森林的居民，迁移到指定的新村居住，为的是将居民和马共分子区隔开。据学者的统计，被迁徙到新村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在时间和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管制，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心灵受创伤和活在焦虑之中。直到1958年马来西亚从殖民政府独立自主，地方选举开启新治理环境，新村从黑区变成“白区”，当局拆除铁丝网并允许村民自由进行社会和经济活动，重获更多的自由空间<sup>143</sup>。

居住在新村的人民，始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个隔着与外界接触的樊篱<sup>144</sup>。剿共时期的新村，有分“黑区”和“白区”，然而针对韦晕本文里叙述的，笔者意为归纳为一种马来亚的“境内离散”叙事。在〈白区来的消息〉里，故事呈现的是在迁徙后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新村的形象貌似一个“小型社会”，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

<sup>141</sup> 韦晕〈夜宿山城〉，见《东海·西海》，页21。

<sup>142</sup> 韦晕《浅滩》，（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页51。

<sup>143</sup> 林延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页12-14。

<sup>144</sup> 林延辉，宋婉莹《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

“他老是这山城里的红土上茁壮出来的，可七年后一切变得那么陌生。自己用染过的树薯芭头的矮小的亚答屋，不晓得什么时候被烧成平地，只是长长的丝茅还没发完成掩蔽了那虽然是破碎了却露出灰暗脸面的士敏土结成的地基”<sup>145</sup>。

“这中元普渡是鬼节，尤其在这新移植区里，这一页更冷寂了。连各家门前的衣纸灰烬都熄灭了，给夜风吹得四散，月亮冷得像一片死灰色。他梁牛虽然酒意退了，心情却多少还有些晃晃荡荡，摄手摄脚的出了甘邦德木栅，随时白区，木栅还像着一段阴影印在大家的心头上<sup>146</sup>”。

新村作为马华文学的重要文化符号，代表着一代人对战争及境内迁移的集体记忆。新村在日治时期已经存在，并由华人、欧亚、混种人、天主教、马来与印度人划定的村落，以便日本军统治政权。光复后至紧急法令时期，新村更是延续二战时期的暴力，成为营养不良和疾病传播的中心区，以及英殖民政府救济医疗工作人员的场所<sup>147</sup>。作为殖民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作家笔下有着不同的风貌。例如，新华诗人王润华有关“新村”系列诗歌如《新村印象——一个小孩记忆中的紧急法令》、《沉默的橡胶树》、《在橡胶王国的西岸》、《猪笼草》等，当中从热带植物连接儿时记忆里居住在新村的日子，也勾勒出使人如何历枪林弹雨、暴动事件和华人迁移的病痛与苦楚，为此作为民族寓言看待<sup>148</sup>。

这说明殖民者为了取得绝对的权力优势，强硬地向被殖民者实施各种措施如人口迁移、任意划分边界、强制生产等，以达致完全监视、改造与统治的欲望<sup>149</sup>。因为政治变动，人民必须放弃之前耕种的辛劳，华人里“安土重迁”的愿景也随着破灭。这里有必要补充，韦晕书写新村故事并非单纯的有着反殖民或去殖民的意图，更是想要反映流离失所的焦虑。

迄今为止，新村遍布马来亚的诸多市镇的事实，体现与早期华人下南洋的移民史，以及成为在马来亚半岛内的重大“再迁徙”历史现象。虽

<sup>145</sup> 韦晕 <白区来的消息>，见《都门抄》，页74。

<sup>146</sup> 韦晕 <白区来的消息>，页80。

<sup>147</sup> 巴素 著，刘前度 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社，1950年），页183-184。

<sup>148</sup>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页104。

<sup>149</sup>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00。

说新村的遍布整个马来西亚各个角落，但韦晕笔下的新村空间没有一个指定的指涉或特定名称，将集体创伤凝聚在个人之上。〈白区来的消息〉叙述居住在里的“梁牛”在迁移到新村以后，得知妻子不守妇道，与其他男子勾搭成奸。在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之下，选择投河自杀，结束这段残酷现实残的胁迫：

“靠近出海的地方，浮起了一条臃肿的尸首。起先没有人认识这尸首尸谁，后来才知道浮尸是才刚从拘留所营放回来的可怜家伙”<sup>150</sup>。

这个发生在新村的悲剧，主人翁以死作为解脱。在面临空间上的迁徙之苦之余，加上妻子通奸，生活上无法回到过去的痛苦，梁牛身心受挫，最终把将新村视为结束人生的地点，当中充斥着暴力与恐怖的氛围。此外，〈印度洋的守候〉和〈白区〉两篇故事，虽然反映的搬迁到新村以后的日子，但其中涉及有关历史记忆与异性通奸之间的纠葛。人物以自裁的方式，作为政治抗议的形式。阿帕杜莱认为，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建构，是通过“地方主体”（local subjects）和“地方邻区”（local neighbourhood）的结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发现韦晕笔下的叙述者，是扮演着“地方主体”的作用，而被叙述的新村人物与环境，则是机器的“邻区”，两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理想的自我生产的空间（an own self-reproduction）<sup>151</sup>。

对此，新村作为一种“现代式”的迁徙经验，而身在家乡的却回不了那个原来的“家乡”，已经说明其“乡”的归属和定义，早已被大环境的文化彻底解构。至于将新村作为日常经验和题材来处理，韦晕也把“境内离散”叙事，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 2、空间转移：从新村到乡村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主体）与空间（客体）来阐释“距离感”关系。所谓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态度的产生，而主体和客体之间攸关“切身的”与“距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会对事物产生有或无之距离，往

<sup>150</sup> 韦晕〈白区来的消息〉，见《都门抄》，页82。

<sup>151</sup>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 181, 191.

往涉及“个人的主观经验”的介入，在这个层面可被视作一种“距离的美学”<sup>152</sup>，所以，韦晕的“主观离散经验”有益于呈现一种在马来亚境内离散美学。对此，新村作为韦晕建构境内离散的宏观空间，他也尝试进一步把“新村”的概念，进行个人化和地方化的处理。

如之前所述，韦晕在本土塑造的离散美学，他对在地感产生一定的距离。那么他又能如何借助排遣离散之苦呢？在马来西亚的他其实也深感其中。面临离散焦虑和孤独下，以借助黄昏、河流、乌鸦以及聚焦在“乡村”的表述，作为笔下常见的意象代表。蕉风、椰雨与乡芭书写是构成南洋地方性书写的标志。这些符号意义随着环境的切换其具多变，意在消解被囚禁或流散的苦楚。例如，乌鸦在中西方文学有着复杂的形象，它有象征死亡或是“灵魂摆渡者”，而鲁迅《药》中的“乌鸦”与坟墓挂钩，体现不同的文化特质。以韦晕新村书写的角度来看，乌鸦正是映照南洋乡村甘邦的地方景色：

“这乌鸦港的薄暮天，那末一碧无垠，弯弯的新月轻轻地抚摸着那高耸地颤抖的椰树梢头，喙咯，一声，一只乌鸦给月亮惊觉了似的把翼子拍了拍椰梢的些花丛，沙拉沙拉的掉了一些发着暗香的椰花下来，洒在他老那癞疤头上...<sup>153</sup>”。

〈乌鸦港上黄昏〉描写黄昏映衬下乡村景色，群鸦从斜阳飞过呈现熟悉的马来亚地方成为战后冷漠、惊悚的空间，在具有抒情笔调背后多一份凄凉和冷静。这不仅让人联想古诗中出现“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烘托出苍凉凄苦的意境，感慨战乱后的萧瑟画面，两者基调也有些许的呼应。

此外，〈乌鸦港〉除了刻画族群之间的和睦，他更要带出的是迁移到城市的人之渺小，即便回到了故土，必定随着历史中的暴力侵蚀着记忆，对原乡的记忆甚是模糊与不记得。此外，借由此篇小说中叙述的“黄昏”

<sup>152</sup>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23-25。

<sup>153</sup> 韦晕〈乌鸦港上黄昏〉，见《乌鸦港上黄昏》，（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6年），页19。

，作为城市和乡村在时空轴的区隔。当中折射人物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的生活方式、人文环境以及思维模式，都大有不同。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仅仅以“黄昏”作为时间从白天过渡到黑夜，黄昏、“乡村”与“内在的自我发现”有什么关联？本文认为，韦晕作为散居者心态的映照，体现空间与地方的辩证，故事中每每有三者意象的交织，是作为贯穿在文本中的主线，其作用在于映衬人物对纯朴乡村的追求，对都市灯火阑珊下的寂寞，以作批判和逃避对历史暴力隐语。例如在《日暮·荒原》散文，韦晕曾鸟瞰的方式，写下黄昏的时刻描写荒废已久的山丘：

“我又到了那个小山丘的荒原上来。那个荒原，其实只是个小土丘，过去，或许是个甘榜，或许是个有钱人庭院…这荒凉的小原野，这些落叶淹没的山径，我是熟悉的。走出你自己的小圈子吧！在空荡荡中，我自己向自己说出了这句话<sup>154</sup>”。

经过叙述者“我”的回忆以及和坐在山丘附近和一位陌生人相会后感到不适，被长期浸染在都会的喧嚣，瞬间视无边的郊区，折射出内心被掏空的反思。另外，韦晕向往的“东方海的尽头”、“棕榈树”、“太平洋海岸”等意象<sup>155</sup>，植入在荒野的背景呈现“荒凉”的南洋布景，对从新村迁移到城市中，冀望回归到朴实的生活中，加深乡城之间的离散印象：

“只有在黄昏，独自个儿，骑上脚车，到离市镇几厘的港口去，看看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飘过来的白浪，吹过来的海风，向着苏门答腊那方面，慢慢沉下去的夕阳。这些，只有这些景物是可以留给孤寂者，永远眺着，也只有供这孤寂者，自由地嘘口宿气<sup>156</sup>”。

对于这个文本空间的渲染，超越一般的空和地方，具有深邃的哲理趣味在内。就此，“乡”对韦晕来说是个不定性的概念，即便当中指涉“南洋”整个地理为模糊的家乡指向，通过故事的叙述建构下，“乡”的意

<sup>154</sup> 韦晕<日暮·荒原>，谢克主编《新生代》文艺杂志，1969年11月，页59。

<sup>155</sup> 韦晕<说是拥抱黄昏>，见谢克主编《新生代》，1968年11月，页102。

<sup>156</sup> 韦晕《浅滩》，页58。

义更具复杂性。再如〈无影族的落户〉写到：“乡村的黄昏，比都市来的早。这是一般在乡村生活习惯的人的看法。因为每天下午六、七点钟以后，在乡村生活的人早就吃过晚饭，预备上床睡觉了，不比都市人这个时候正下了班，不是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就是泡咖啡，吃下午茶。这样说起来，都市其实只有白天和黑夜，没有黄昏这段时间<sup>157</sup>”。

这些意象与乡下描绘的结合，超越空间化和地方化的含义。就如巴赫金提出的“时空体”（*chronotope*），它组织情节和事件，发挥离散艺术和打破叙事时空之作用。作者尝试将黄昏、乌鸦与乡村的文化符号并列，无论是从马来亚到香港、城市与乡下、日常与非日常的辩证下展现出叙事模式，始终伴随着身体移动，处于韦晕在马来亚境内“在场”的观察，以连接个人经验来处理这段“在家的漂泊史”。从“新村”到“乡村”的聚焦，不仅是地缘格局与离散所在，它是韦晕召唤复杂的儿时记忆、本土记忆，也是基于塑造共同认识经验（*communal memory*）的功能。

有鉴于此，韦晕从境内离散的“新村”到“乡村”的空间转移，以及两者的相互交叉的映照下，突现作为离散主体寻找自我定位和安身立命的目标，其中以马来亚为取材的背景书写向度，不减对地方的关照和思考。抒情主人翁的忧郁和苦闷则超越了青春与爱情的哀怨，在战乱后和尊严政治下，恍悟到人存在的偶然性、虚无性、多余性和荒诞性，从而体验到一种茫然无从、进退两难的局外人之感。在时空措置和意象的拼凑，以及围绕家园和本土意识浓厚背景，尝试把离散悲苦化为一种沉静的，孤独的散居写照。

---

<sup>157</sup> 韦晕〈无影族的落户〉，见《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1年），页120。

#### 第四节 小结

本章抽样分析韦晕自50年代以来的作品，发现文本中有关离散和文化认同的层面，在二战后英殖民地统治期间，显示了在争取公民身份过程的曲折和可贵。这或许展示韦晕尝试立足在马来亚场域内，对于种族政治的预言，以致建构在地离散书写向度。然而，本文并非将“离散意识”的对立于本土书写，而是通过韦晕对日常经验与生活秩序的观察，如何受到殖民文化对族群之间的分裂，以及当地民族与文化政治因素而对峙，朝向一种在文化杂糅背后的“非直线式”的本土认同，展示本土与离散之间的一体两面。

这种认同并非直接拥抱本土的热情，韦晕是采取较有寓言性质的语言和叙事模式，及其多元族群的刻画等，来建立一种离散的美学，当中不少也参入了相悖于新兴国家崛起事实的叙事分层。历史暴力与国家文化政治的交叉，迫使主体或被叙事的主体，面临归国的意念、选择死亡或再移民、以及选择一种在家的孤独感及其苦中作乐，成为韦晕在新兴国家制度“新生”的自讽。因此，对于马来亚的文化认同，韦晕是有选择性的，尤其我们能从不同的叙事主体和文化身份，来展现出不同的马来西亚面貌。此部分将在第三和第四章继续详论。

需要表明的是，韦晕虽在本土书写中大量突现出的距离感和离散意识，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些在大时代人物的勇敢和承担能力以及冲破教条的可能，是作者书写过程中的局限所在，不过笔者则不以为然。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当时的新马正处于政治动荡的时期，作者更有可能是赋予了主人翁“如何落地生根”以及生根以后的“抉择”。这个抉择是一种开放式的诠释。本文从离散的角度切入，发现不少故事确实并未提供完整的“大团圆”结局。这并非指韦晕忽略了人物和故事铺排，而是他的“在场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重新审视对于“本土化”的倾向，及其马来亚文化及其表面的文化杂糅的“乐景”场景中暗藏不少种族、阶级、性/别正义之严峻问题。

韦晕作离散华人的一份子，这些皆是他通过非大团圆结局中致力思考的。反过来看，我们不能冒然将韦晕视作“反离散”作家。他体现的是

马来亚离散族群为融入 / 建构本土性话语的努力，但面临种族政治的区隔，足以突现韦晕作为一名书写本土的“异乡人”，充分对马来亚具备本土知识做出了历史的关照，体现一副在“家乡”离散的面向。

## 第三章

### 多重的游移：跨国经验与寻根之旅

身为南来作家的韦晕，在扎根马来亚本土之后，不厌其烦的投入于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建树。随着面临当地新兴政权的更替，和英殖民政府制订的系列政策，韦晕对马来亚半岛的地缘和文化政治的细微体察，对其“本土性”的诠释，更使他不时化为在家的异客。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协商过程中，他并非一味的采取狭隘的本土观，或是表示纯粹批判/维护英殖民殖民文化的态度。

本文认为，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层面，是有关中国和香港文化背景。这里涉及“身体”和“意识”的跨国流动，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作品里背后的离散主题，以及韦晕身份和文化认同如何进一步复杂化。在致力于书写离散同时，韦晕对在地理位置（loci）的扩张与丰富，并以“双重离散”的审视角度，对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城市文化、现代化提出反思，也做出对本土题材通向的“世界化”和将个人记忆“在地化”的面向。对此，本章将继续秉持“文化杂糅”与“地方性”为两大原则，探寻其中马来亚、中国、香港及美国等跨界的叙事，以及多重寻根的表达及形式。

#### 第一节 重塑中国与香港经验

韦晕年少时期曾在香港居住，后来定居在马来西亚后，也时常往返此地。在重新踏上“故土”之路，他也彻底意识到香港是如何的一个“殖民地文化和遗老遗少文化混合体”<sup>158</sup>及其社会氛围。对此，笔下作品中展现的人、景、事物与不同地域来往的切换，或是情感的迁移，都不乏体现对于这座城市里新旧交替，中西文化杂糅的文化背景。

在进入探讨韦晕的“双重离散”（马来西亚和香港之间）叙事之前，首先一提的是有关系列中国文化记忆的钩沉。这段属于韦晕的个人的历史记

---

<sup>158</sup> 韦晕 <我的创作过程——代后记>，见《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页169。

忆，是韦晕建构双重离散主题的前奏，也作为开拓与反思城市和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 1、自我认同之形成：历史记忆的钩沉

历史记忆指的是超越个人经历与个体生命的范围，它建构了某种集体认同和历史的内容，以及反映了某个社会共同体的当前文化。然而，历史记忆并不直接与“个人经历”有所直接的挂钩<sup>159</sup>。查尔斯·莱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1962）曾指出，个人在定位自己的时代，必须与历史制度和社会变迁建立关联，才能恒测自己的命运。那么“记忆”又如何连接历史，它与个人经验是怎样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记忆本身虽难以在迅速变换的时代与公共场合被固定下来，但唯有通过叙事、建筑与风景，记忆才得以重生、发展、变化和传承。因此，有关发掘和探究的记忆的“有效性”，我们务必借镜历史语境，才能发掘主体是如何选择性的处理个人记忆。有关韦晕对自身离散历史的观感与记录，可追溯自他在广州的军旅生活：

“渡着小兵生涯的时期中，因为在军营生活里，不能够随便发表和写文章…我沿着美丽而古旧的东江，那故色殷然的「循州古道」，青翠的龙川渡头，以至夹着东江两岸，血红的杜鹃，那赋予历史传奇的苍翠的梅岭…这一切，都促成为我日后写作的根据材料<sup>160</sup>”。

军旅生活确实赋予韦晕对江河与山川的观感<sup>161</sup>。在二战之际抵达马来西亚霹靂州彭亨一带的山脉，无非激起他对远端中国的情愫。经历周折的离散过程中，自然环境与景物切换所带给的感官和心灵的刺激，让他写下不少有关军旅经验和抗战的题材。在他不少作品中出现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一直南下至广州、东江、惠州、古竹、紫金、博罗、河源、龙川等小县城的地景，无非通过虚构人物将地域串联起来<sup>162</sup>，展现与连带中国情结的离散意识。因此，韦晕重组了个人记忆，在文本中去重构某种过去，将二战争

<sup>159</sup> 杰拉德·德兰迪、恩忻·伊欣 主编，李霞、李恭忠 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580—581。

<sup>160</sup> 韦晕 <后记>，见《东海·西海》，（香港：维华出版社，1962年），页115-120。

<sup>161</sup> 韦晕 <大江>，同上，页1。

<sup>162</sup> 韦晕《荆棘丛》，（香港：香港上海书局，1961年），页88。

与南来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移民性质。例如，在〈太平小品〉里三个副标题：“渡头”、“咆哮了的荒岭”以及“碑碣”，记述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一回到了这个抖擞地蹲着古堡的渡头，听到滚滚的黑流激荡着那两岸都长了芦苇的河床，拐过一堆乱石，便是那一片白晶晶的沙砾。这沙砾，我亲自看过它曾经渲染成了紫色，也曾经亲自看不到不少孩子在那沙砾上挖龟蛋，扒出了很多不完整的白骨，也曾经看到那些善男信女们发起过[海陆超幽]的善事”。

另外，在〈大江〉里记载：“过了不久，东海岸的豪雨，已经把那些零乱的车撤走，那滚滚的河水，也将那些扔到河流里去的残余军用品，带向下流，更下流的地方去”<sup>163</sup>、〈鸦背夕阳红〉中“我”望着那似乎是死寂，其实心脏还在跳躍的古渡头，又抬头望着上空那渐渐变成晚霞的残阳，那一队队黑得发亮的鸦群，背脊镀上最后的夕阳余晖，却闪成了金色，它们成群结队寻找食料<sup>164</sup>”、〈灰鸦〉里描写死尸、血红眼睛的鸷鸟、沙漠，秃鹰、野兽的比喻则是“给鬼子刺刀的阴魂变成的”<sup>165</sup>，以及于1956年写下的〈这不过是春天〉的“向北方凝望”。这些文字里带有重温故国与战争记忆的痕迹。战争的残酷一再提醒韦晕离乡背景的不得已与苦楚。然而，当中参杂个人主观的离散情绪和抒情笔调，为了也是对于故国文化记忆的保鲜。身为早期南来移民写作人，即便书写南洋，韦晕不免也存留着异乡人的眼光和视角去想像马来亚。当然，这并非指出作者回归或寻找单向对中国原乡的认同，而是他更能够体现在历史旋涡中的记忆，重新尝试在异地寻找一种遥远的呼应。

此外，〈太平小品〉里描写武器及现代科技书写颇多，则电船、气弹、原子能、摩天大厦、水泥跑垒、人造卫星、月球探险<sup>166</sup>等等。加上以上及有关鸟兽类的指涉，掀开对战争提出控诉，亦是对于现代文明的认知与批判，从记忆的钩沉将自己放置在广大受苦战争年代时代思考。这些符号不再是将隔空的地理空间的分化，而将它连成历史记忆和文脉载体，对“在地性

<sup>163</sup> 韦晕〈大江〉，见《东海·西海》，页1-5。

<sup>164</sup> 韦晕〈鸦背夕阳红〉，同上，页55-58。

<sup>165</sup> 韦晕〈灰鸦〉，同上，页53。

<sup>166</sup> 韦晕〈太平小品〉，同上，页26-34。

”的位置进行灵活性的转移。萨义德曾认为，记忆的建构，主要在于作者冀望能寻找立身之根本：

“记忆的塑造并非是永不静止的，它可使每个人拥有并融入自身的东西…重新塑造的记忆，尤其当它以集体的形式出现，能够给他们一个清晰的身份、一种国家叙事以及在一个世界中的位置<sup>167</sup>”。

韦晕以回忆作为利器，将个人记忆与自身离散情结“合理化”。如中国九叶派归侨诗人杜运燮，他与韦晕有过的相似的参军经验，俩人可视为创伤的幸存者（trauma survivor）<sup>168</sup>。他们既有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在场属性<sup>169</sup>，提供他们重要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泉源，以促成一种双重认同与文化意识的表现，来连结两地的情感与历史变迁。这也是韦晕在这个层面认同杜运燮与“双乡认同”的游子情怀，以及对远端的故土充满幻想<sup>170</sup>。在短篇小说〈栖迟〉里贯彻跨文化交往的族群观，但叙事里对中国与香港情结不能被磨灭。当“我”，在码头遇见一位白俄“杜夫斯基”，他曾是一位俄国的老将军，因战乱而最后选择靠联合国难民救济机构的帮忙，与妻子一同以“难民”身份，从香港辗转和迁移到南洋。在老将军向“我”谈起“厦门的公园，有时谈起普陀山”、妻子妮娜是“从香港来淘金的歌女…怀念期黄浦江滩头的高耸海关大厦，香港的皇后大道和北角”、“从哈尔滨流浪到长春，青岛…上海和厦门”。就如前文提及的〈暮紫〉的“非莱亚”欧亚裔形象，或许这也能印证在韦晕本身的经验，通过在诸多文学身份里，保留着一颗若离若即的离散情怀。由此看来，无论是在异族或华族形象刻画中，中国和香港是作为连接中华文化和马来亚情怀的文化符号，主人翁不失对香港这个摩登都会文化色彩的迷恋。不过，这种“迷恋”，并非出自于一种贬义，更多是在逝去

<sup>167</sup> 萨义德〈虚构、记忆和地方〉，见 W.J.T 米切尔 编，杨丽、万信琼 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页265。

<sup>168</sup> 美国创伤研究学者卡里·塔尔（Kali Tal）把创伤事件以大屠杀、越战、以及妇女和儿童性侵犯为文化编码。她认为若通过这些事件的书写，则将创伤记忆不断被符号化。本文认为韦晕与杜运燮的个人历史记忆与参军经验、二战历史相关，并通过在地的观察重写离散主题。见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sup>169</sup> 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页87。所谓“在场”与“非在场”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场的符号需要依赖于不在场的符号。换言之，现时的呈现依赖于不在场的过去和将来的踪迹。本文认为，韦晕虽立足马来亚，从年少记忆里的香港，到70年代香港的演变，体现他作为一位非在场的历史见证人，而是能通过在场和非在场的关系，呈现出“双重叙事”的写作向度和可能。

<sup>170</sup> 韦晕〈近乡情更怯〉，见《馥尘集》，（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8年），页108-109。

的时间里，缅怀失去的家乡情绪。文本里使用回忆手法，加上第一和第三人称的穿插，正是在体现这样的情感在时空的断裂。就此，〈栖迟〉里的“我”或“杜夫斯基”或是其妻子的境遇，三人虽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同样面临迷失在回忆和现实里；这也是“我”选择再度出走或持续的漂流，或许是要在无法满足现状之余，寻找一份微薄的容身之处。本文认为，无论是记忆里英殖民时期的香港、原乡中国、或是已经历过独立后的新马国度里，韦晕始终离不开及徘徊在这“三个家乡”的印记。然而聚焦在香港与马来亚来说，更是他念兹在兹不过的写作向度。韦晕虽并非有具体在香港长期创作的经验，然而在刻画人物“旧地重游”的面貌，则是从两地的殖民文化与文化杂糅的板块，企图展开“双重离散”的叙事模式。

## 2、“双重离散”与摩登 幻影

韦晕多借由非华族形象，展现马来西亚与香港两个区域间有相似的殖民背景和文化杂糅特质。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香港与马来亚有类似的英殖民经验，正好体现作者用心之处，作为论述殖民主义的“幽灵”如何塑造出笔下其具摩登性和文化杂糅的香港离散城市。韦晕立足于马来亚，这也不妨碍到他对“香港”这个殖民地的兴趣与关切。香港的摩登面貌，是韦晕70年代时期主要创作参照的背景<sup>171</sup>。

基于香港的文化背景之下，韦晕两部中篇小说《荆棘丛》和《陨石原》，贯彻的离散情结，并且反映离散华人如何其中迷失在摩登城市，以及文化杂糅带来文化认同的议题。这两部中篇里，韦晕分别展现了两种不同往返马来西亚和香港的经验。前者是主人翁是以赴台念书为主线，而后者则是反映二战后连接新马与香港的记忆和跨国寻根经历，反映了华人再落地生根后所认知的地方，感受到“旅外”冲击及城市经验，选择再度离散的态度。

《陨石原》讲述的是由“青瑶”、“小珍”、“秀安”三位到港台留的马来西亚学生叙述展开。她们初次搭飞机离开马来西亚半岛，带着少女般

---

<sup>171</sup> 有关“摩登”非西方原创的“现代主义”，它是西方的 modern 和 modernism 当作时尚加以模仿、复制而流行，迎合大都会与市民阶层追逐的时髦和新鲜性，具有世俗化性质。因此，摩登性的本质难逃与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相关。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言说，摩登还是有别于现代主义的不从众、反时尚和反庸俗的表现。见：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304—305；郭双林、史敏〈“modern”之前的“摩登”：从“摩邓”到“摩登”的言说〉，《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页9。

的兴奋踏上另一个岛国香港求学。这篇故事以“青瑶”主要的叙述者与洞察者出发，从她自香港转机到台湾前，在途中偶遇多年不见的同乡“金水伯”，在两人的相会和对话中体现离散华人在城市生存的面貌。金水伯马来亚生活多年，因马来亚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放“归国华侨”政策而回中国，不料被“右派”视为资产阶级而逃到香港，孤身一人立足于香港开出租车谋生。一晃就是数十年的光景，在这个大气候下的驱使下，金水伯从中国大陆一路逃到香港，见认识到香港作为中西交汇的地段，并调侃道：

“大家喊这帝国殖民地为 [阴阳岛]，意思是到了这个地方人也会变成鬼。噢！我过去第一次到了这里，把它看作是个 [中途岛]，以为过了这个中站，就不再回头了。想不到，过了十年，又回到这里来<sup>172</sup>”。

“说得好听，这地方是什么 [窗橱]，实际是个阴阳界地区，说来好笑，像我们这种 [文王不收，武王不管] 的浪荡汉更不必说，那些过去所谓前进分子，不少也溜到这里来，籍着过去的招牌，在这阴阳界地区开启摊档来发卖什么 [专家论调] 的也真不在少数。不过，在我看来，不管左也好，右也好，大家只把这地方当作个中途岛，一有机会就从这个岛跳上天堂，或是跳进地狱去<sup>173</sup>”。

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阴阳岛”或“中途岛”在小说中指向香港，尤其当中以“文王不收，武王不管”的离散话语在小说中多处的重复，也说明作者尝试对香港这个殖民地文化居间处境，进行一番的嘲讽。从金伯的口吻得知来到香港谋生的困苦之外，阴阳或中途的表述，并不只是香港这个地缘区域的情况，更多是指文化上处于“不中不西”、传统文化的缺失，让离散华人对香港印象倍感困惑。香港不免形成来去方便、流放和归来的特殊文化场域。

---

<sup>172</sup> 韦晕《陨石原》，页18。

<sup>173</sup> 同上，页26。

《陨石原》故事背景设定在马来西亚区域青年的无根，而到海外求学更是体现马华知识青年有意拓展机会和自我实现的时代<sup>174</sup>。马来西亚于70年代颁布的“国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里将马来文化作为国家官方文化，华文教育被打压和学子面临求职危机，导致不少人被迫离家到海外求学。文中的香港作为中转站，学生到台湾求学的困境，而不惜一再强调“这里（马来西亚）不承认台湾大学学位”、“学习国语（巫语）”等叙述，文化霸权迫使她们离开半岛的同时，又面临了在居留地的生计与认同困境的夹攻。韦晕曾在《还乡愿》里写到：“抛弃那种种旧的怀念，旧的幻想，我们已不再是海外的‘孤儿’，我们是这新生祖国土地爱的孩子”。反讽的是，这里体现“认同与被认同”的差异。《陨石原》所要表现的也是马来西亚华人自觉和自决“出走”的选择。为此，韦晕本身虽没有如李永平、黄锦树、张贵兴等马华作家有实际的旅台经验，而《陨石原》出现的“海外孤儿”之说，是结合有关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的情景的产物。

60-70年代的香港正处于英殖民时期，距韦晕离年轻时离开香港，已有50多年之久。那么，韦晕笔下的香港是具有中西文化交融为背景的城市，这些书写是否是拉开或拉进马来西亚的距离？从离散马来亚与香港的离散叙事，有什么可比性之处？有学者指出，60年代是香港摩登身份的诞生。香港没有经历如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宣告能独立自主，其国族身份是不可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互对应。他坦诚说明，当时香港的文化身份实际上因中西不定，而构成了非稳定的主体（not constitute in a stable form）。

香港的‘摩登’特质的萌生，是在“六七暴动”后为分水岭，香港英殖民政府为了推行改革方针，注重城市规划发展的产物。系列的政策带来给香港社会的“开放性”，导致当时香港人民大量接触西方流行文化，为此诞生香港摩登身份（emergence of Hong Kong modern identity）。这也造就了当时香港本土文化的特质——交织摩登色彩的离散文化（local and popular cultural identity, a kind of diaspora culture）<sup>175</sup>，因此香港的摩登性才被催生。此外，香港经历文化冷战，而香港在文化上扮演中国与外界的沟通与转口的

<sup>174</sup> 马夫之《作家作品研究：评论集》，（吉隆坡：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页86-93。

<sup>175</sup> Matthew Turner, *60/90s: Dissolving The People*, 见潘毅、余丽文主编《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1-36。

中介身份<sup>176</sup>，是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区城市。如梁秉均所言，它也是一个“包容的空间，私人和公共之间是重叠的，很难发现什么是本来、外来、自己、他者、传统、现代、东方、西方<sup>177</sup>”。

就如《陨石原》里秀安与娜娅的行为举止凸显了香港摩登性的另一面，膜拜西方流行文化；对于在马来西亚“南洋”土生土长的青瑶，不断对自身文化与当地文化产生困惑：

“说什么深造，其实是变相移民。秀安感慨万分的叹气，跟着苦笑的说：「那些港、澳来这里读书的，又够海派，不比我们这些南洋客那样寒酸。我们这些海外孤儿比得上吗？不谈也罢，谈起来更使人丧气。」<sup>178</sup>”。

“这里兴的是个洋名啊！譬如玛利、露斯、马嘉烈…这些洋人名字呀，人家叫起来多么好听啊！阿瑶，你要这里的人看得起你，一定要有个洋名<sup>179</sup>！”

“青瑶在南洋生活时，一向是淋浴的，才感到舒服<sup>180</sup>”…“记忆起在故乡时吃的望白肉花生，就比这里的花生好吃的多。想起这些，青瑶心理想起月是故乡圆的乡土观念，她笑了<sup>181</sup>”。

无论在造型、名称、工作单位、生活方式，不乏体现作者对西化香港形象的调侃，分别从秀安和娜娅的口中发现，这也促成她们具有“崇洋”的心态贬低或想要摆脱南洋“落伍”的文化身份。此摩登性的展现更多是折射出现代化社会里的丑陋与恶习，当娜娅对西方流行文化进一步嘲讽（mockery）模仿（mimicry）抑或变形，更加突现香港殖民文化及华人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讽刺殖民话语和权威，成为霍米·巴巴“文化杂糅”的生动说明。反倒是青瑶通过味蕾唤起记忆，强化了对家乡的认同感。

<sup>176</sup>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 主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8；朱耀伟《香港研究作为方法》，（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页18-20；罗永生《殖民无间道》，（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sup>177</sup> 梁秉均 主编《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页8-9。

<sup>178</sup> 韦晔《陨石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81年），页73。

<sup>179</sup> 同上，页19。

<sup>180</sup> 同上，页36。

<sup>181</sup> 同上，页62。

在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ik, 1940-1970）提出的“接触空间”（contact zone）说法<sup>182</sup>，主要连结和建立文化之间的交界点，这能对应在《陨石原》里以青瑶和娜娅为物代表。她们在同个时空下因受殖民文化熏陶，而又展现各自区域的“本土个性”的差异。对此，文中刻画的城市文化，在染上具有摩登性色彩之余，它也有助于主体重思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相对在马来亚所经历的殖民主义及国家独立后的现象，这些实情也开启主人翁离乡的另一个理由。他们虽然不被再背负所谓离家的“叛徒”，但青瑶和友人在自称和调侃自己为“海外孤儿”，这当中涉及对自己的“根”持有怀疑。这里或许能遥相呼应了在“现代认同”的建构过程：“随着身体日益为抽象系统所侵入……它变成了个一个互动、占有与再占有以及将反思性的组织”<sup>183</sup>。青瑶的表姐“娜娅”因长期居住在香港，她对西方流行文化的接触已经达至“内化”的境界。从她的外表和服饰的效仿，这里不免也暗示了香港的华人，如何从花国飘零到国族“无根”的再现，到自我洗脑的程度。这也许说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份，他至少能在所谓的给定的“传统”里，重新选择、强调、遮蔽或切断某些联系，以解放自身面临的认同窘迫。

韦晕借助这批旅台生“视角”，展现“华人性”如何越洋到了另一个华人地区，在这个层面观察而其文化、风俗、习惯及眼光，以及她们如何在另一个文化杂糅的都市文化中摸索自己。以青瑶为代表的这位看似出污泥而不染的女性，在她细微的观察和在文化的路途中，对马来西亚乡土文化的传统的守护足以看出和娜娅的不同之处。对此，这篇小说呈现主人翁的离散印记，除了体现都市文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冲击之外，更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是当中华人的跨城经验。三位女主人翁从马来西亚半岛到港台经验，并非只展现离乡的悲苦，而是通过跨境华人如何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诸种商品文化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而换来的城市体验。故事中除了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如倒叙、补叙、回忆，以及使用日记体和书信体的模式，这样属于拼贴式

---

<sup>182</sup> 阿里夫·德里克，李冠南、董一格译《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162、164。

<sup>183</sup> 安东尼·纪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社会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页256。

和非线性叙事手段突现时空的断裂，也把马来西亚和香港之间的时空视野和文化差异，通过不同女性视角的进行拉锯和比较。

此外，《陨石原》里除了展现人物的跨城体验，韦晕从中将香港这个摩登区域作为以作离散城市加以看待；而香港的摩登性质与中国人流散的分布有关，例如文中提到：

“在香港地头，除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人之外，不管你是山东人、江苏、浙江人、还是湖南人、四川人。大家都被称之「上海人」。这样一来，自从大陆变了色后，这港、九一带就到处是「上海人」天下了<sup>184</sup>”。

文中提及香港在1949年后有了“小上海”之称的现象，当中受到文化冷战的干扰，具有的摩登城市之称上海与现代文化元素，也随着政治与移民浪潮“旅行”到香港“定居”。这不仅构成了华人流散身份的背景，摩登元素因大环境的改变而随之迁移另一个场域，这段“摩登话语”的出现，也再现香港社会文化的杂糅性质。就有学者所言，以当年的香港来说，文化身份是可以随着政治气候不断在瓦解（dissolve）和重组（reconstitute）协商，人民的身份亦是在分化（divided）或归类为成为社群之间的尴尬<sup>185</sup>，这无形中形成离散华人认同与身份的暧昧。如是，在《陨石原》中韦晕将马来（西）亚和香港构成两个岛屿的双重离散叙事，对于城市文化媚俗的解读与批判，不失具有来自南洋与马来西亚的文化身影以抚慰乡愁，以致突现韦晕对于混合文化认同的关照。

### 3、时空之“层叠”、“栖居”之韵味

与《陨石原》不同的是，《荆棘丛》讲述了一段跨时代故事，两位主人翁分别是“文青”与“于中”，俩人曾各自具有在香港、新马辗转和居住的经验，重于在世隔多年重逢于新加坡河畔。从俩人的谈话中，除了感慨时间的仓促和人事的变幻，尤其针对眼前所看见的高楼林立住宅和喧嚣场所带来的生疏感，当中更是充斥了对战争的残酷以及离散的苦闷提出批判。小说

---

<sup>184</sup> 韦晕《陨石原》，页33。

<sup>185</sup> Matthew Turner, *60/90s: Dissolving The People*, 见 潘毅、余丽文 主编《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与文化》，页37。

的篇名为“荆棘丛”，意味这周遭环境布满了刺与危险，具有“险境”之隐喻，但反讽的是，主人翁所在的周遭不都是由高楼大厦和诸多现代交通和建筑构成而符号，以此作为现代文明丛林的“荆棘”，每当“文青”穿梭在新加坡的巴西班让、丹戎巴葛的街道，他所瞧着的人群和交通的快闪而过，让他倍感晕眩<sup>186</sup>，而友人于中选择结束流浪生活，在放弃入州府的决定后，选择重返香港<sup>187</sup>。

故事的开始，韦晕首先刻画两位主人翁无不对繁华环境里生活感到厌恶，以描写道“也许我离开这海岛太久，对这庞大的建设，没有什么亲切的感觉”，其中弥漫着对于旧甘榜情怀的感叹和对现代建设的漠视。当叙述者在直视城市景观下所看到堆砌在周围的现代建构，体会自身在摩登都会的空虚与两难，犹如身处在一个被历史和暴力掏空（exhausted）的城市生活：

“这儿的年轻人已经不是跟我们的祖先那样，成天想着发财返唐山。我们都充满了热情，要为新生的祖国工作<sup>188</sup>”。

“你们香港人有句时髦话：站在太平山顶望下来，可以看到多式多样到他们的穷形尽相么？…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碰见各式各样的人物，可是他们的影子在文青的脑海都像闪电一般，一霎那就消失了，没有留下印象<sup>189</sup>”。

对此，本文认为《荆棘丛》视一篇离散作品，它折射出离散华人在亚洲华人城市的游离感，以及在文本内部中包含了多元种族文化的符号和描述，将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视为三座离散城市看待，突现身份认同的焦虑。对此，这里所呈现的“本土性”和“本土认同”的面向就不仅仅只有单一的认同。那么，在讨论其中现代意象的措置，以及如何带出现代“栖居”之意义，可以借鉴有关离散艺术作品中“层叠”（layering）技巧与《荆棘丛》的关系。“层叠”的离散艺术美学，是由当代巴基斯坦籍美国艺术家莎奇雅·斯坎达（Shahzia Sikandar, 1969 -）所提出。在她看来，作品中出现的层

---

<sup>186</sup> 同上，页96。

<sup>187</sup> 同上，页94。

<sup>188</sup> 韦晕《荆棘丛》，页42。

<sup>189</sup> 同上，页64-65。

叠意象、线条和色彩，可以通向文本中所要展示的一种“双重视界”，即能发现作品的美学密度和紧迫感，尤其读者能处在“迷失—发现—迷失”的重复阅读体验，一种能改变观看过程的视觉运动<sup>190</sup>。对此，层叠的方法也亦能介入到跨文类如小说、诗歌的解读，并突现创作者（主体）如何在面临时空和文化的措置感，来展现一个离散作家背后寻找自我认同的途径<sup>191</sup>。就此，在《荆棘丛》中描写在新加坡中的组屋，具有如香港“鸽子笼”屋子般的现代住处与环境，进一步说明这部小说内部的重叠意象和文化符号，以及所要带出的文化杂糅特点和主体的离散感性：

“房子，像鸽子笼一样，闷得于中频频地咳呛<sup>192</sup>”。

“蓦地，二楼的收音机也开响起来，大约主人是吃土库头路的，听到三楼住户的咿咿哑哑的广东小曲，就生气起来，把广播电台中的中波转播很嘈吵…那正在播送印度的旁遮音乐…吱吱啾…啾啾…于中把眉头仅仅的皱起来，着薄薄的嘴唇说：像这种如大笪地似的地方，怎么可以放置一个家庭呢<sup>193</sup>”？

这也是于中和文青时常出入的场景，导致他们在城市化的生活让长久居住在“甘邦”的于中倍感困惑与不适。这从两地的人文环境来看它赋予了主人翁被迫生活的境况。《荆棘丛》的场景将此情感嵌入主人翁的生活细节里，比起从前寄宿在乡村的记忆，现代化的设施凝聚了多重的焦虑感。在主人翁眼里的马来西亚居住里，从收音机到租户的噪音不断，居住环境的声音、颜色，体现感官的大杂烩，更显这个“地方”是一个单纯粹的生活“空间”。巧妙的是，当中除了这个具有混杂文化类似于马华语境的多元种族，加上混合香港人的“下午茶”和新马华人贯有的“冲凉”习惯，以香港“大笪地”的平民广场和空地，更比喻回到自己家乡的不自在，不见从前在马来亚家乡的纯朴与和睦。就如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 中来自不同社

<sup>190</sup> 霍米·巴巴 演讲，马楠、唐晓琳、刘萧、张静 等译，《论离散艺术：关于意义措置的思考》，2014，（演讲录）。有关于这篇访谈录的内容，笔者尚未看到相应的英文原文，目前会暂使用访谈录里的内容。此外，有关“层叠艺术技巧”的部分和相关论述，请参看 Homi Bhabha, Seán Kissane, Eleanor Heartney, Shahzia Sikander eds., *Shahzia Sikander*, Charta: Irish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7, p 38.

<sup>191</sup> 同上。

<sup>192</sup> 韦晕《荆棘丛》，页32。

<sup>193</sup> 同上，页33。

会阶级人士，居住在拥挤的住户中，在缺乏空间感的现代社会里给予人一种不安和燥虑（aroused unease）<sup>194</sup>。《荆棘丛》在刻画处于隔空与共时的两个不同地区，展现文化混合的现场氛围。这亦是通过“层叠”的过程中，所要带出归国后决定。从层叠的手法而言，它意在制造一种超越视觉上的文化杂糅，而是在“迷失-发现-迷失”的漩涡中的重复体验，从日常经验展现出陌生感，形成朴素迷离的幻象叙述，也带出对地方认知的延异。就如韦晕曾说道：

“三藩市也好，纽约也好，伦敦也好，阿姆斯特丹也好…凡是华裔居民多的地方，都有这种所谓「唐人街」的出现。这跟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在很多城市里都有所为的「犹太街」…（省略号由笔者所加）大部分的犹太人聚居在各地的「犹太街」，跟华裔在各地的「唐人街」一样，过着与居留地脱节的生活方式<sup>195</sup>”。

经历错中复杂的离散经验，韦晕清楚地认知离散华人的感性和意义，他也联系散居在各地的华侨、华裔或是犹太人，如何在经历了历史中大规模的离散迁徙后所面临的现代与过往的脱节。因此，分别从《陨石原》、《荆棘丛》到以上的散文中，其篇名与文本中作者借助的意象点题，它寄托了对于拯救国族和民族灵魂的反面。换言之，韦晕笔下那种不安、焦虑、漂泊、流散，以及“无家可归”（homeless）的状况，或许能比做海德格尔笔下的“现代栖居者”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一种冀望在被陌生化的家园里，寻求精神自由的可能：

“我站在太平山下，盯着维多利亚海面的浪涛，把海面的光和影…那波光的海面竭力地想找出一片半片漂浮的枯叶…可是我失望得很，那海面只是洋船漏下来的油渍…这孤岛（香港），过去是铺满了杂树、野草，现在都用时敏土把土地封住了，怎会有浮叶在海峡上漂浮呢？历史是永不会回头

<sup>194</sup> Yi-fu Tuan, *Landscapes of F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p. 162.

<sup>195</sup> 韦晕 <一点感慨>，见《馀尘集》，页68。

的呀！就算偶尔有几片落叶掉下海面，但浪涛一打滚，它就永远沉下去了<sup>196</sup>”。

韦晕在散文〈浮叶〉里阐述香港在过度西化，从而召唤出韦晕的在新加坡的记忆，体现在面临两种文化之间的出入。此外，对于大城市的想像与批判，并非指向虚无的都市媚影，而是贯彻古都、西方殖民文化再度浮现。例如，〈浮叶〉里所提到的〔宋王台〕，名称具有中国古典意象与象征，但此台实际上只是作为一块普通的石头。宋王台作为旧式王朝的隐喻，实际上正在扮演着古代中国文化屈服于现代社会步伐的一颗“绊脚石”。此物经历二战数十载后，却成为存于城市中一角毫不起眼的“石块”，不禁使作者站在城市化的香港鸟瞰山下景物感叹。而〈雨伞〉里的“雨伞”可为人遮风挡雨，在象征的层面上，可作为“抵抗现代文明异类”，历史记忆成为“浮叶”召唤起文化乡愁，象征自身漂泊无根的主体。另外，〈记相思〉中则以香港进口的“相思树”贯穿全文，作者以个人记忆将香港、马来亚椰树及台湾南部乡土气息连接一起，以树木唤起对热带的想像<sup>197</sup>。当中夹杂历史与现代的交错，在还未回归之前的香港如水面上浮萍，体现作者对文化措置感的志趣。

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论述，正是展现人与自然、建筑空间的一种生存—文化关系，而人之为人的存在，是一个所居住的与主体“栖居”的定为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从其与外物之“所在”关系中而非从空虚中获得解释的。作为“所在”，是场所中的事物和事物的处所之统一，它们都是由人的筑造活动产生的，或受到人们空间实践的形塑。人们筑造某些物，使空间成为具体的空间，有了“所在”的规定性，由此引出了空间的生产及其社会、文化的意义<sup>198</sup>。换言之，人若能领悟栖居的意义，那么他居住在哪出都不觉得无家可归的痛苦。韦晕在记述有关人与大自然的一篇散文里提到：“雨，快要来了，你就到我那河口的破屋子躲躲吧！哈哈！那破屋子，我自己，终会有一天倒塌下来，给海浪冲

<sup>196</sup> 韦晕〈浮叶〉，收入《馥尘集》，页4。

<sup>197</sup> 韦晕〈记相思〉，同上，页8—10。

<sup>198</sup>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and introduction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71, p. 141-159.

走，哈哈！<sup>199</sup>”。在老人与年轻人的一段交谈里发现，海岸边的岩石与沙滩成为老人眼里，是发现所谓“栖居”之意义。就如在第二章有关境内离散的新村到乡村的离散空间，这或许可以视作韦晕如何从“乡村话语”道出栖居的志趣。从哲学意义上看来，栖居者在寻求栖居的过程，始终不会穷尽而固定在任何的栖居方式，就如文中的老人与海岸的关系，阐述心灵的慰寄才是“存在本质的所在”，并不是有实际的居所才就是“家”；而有家未必有居所的存在。

要将离散主体定为在现代生活与栖居之间是件复杂的事情。不过，我们能通过韦晕的这些表述，在批判现代生活并不增加日常生活环境的安全感，反而被技术驾驭，导致多数人迷失其中，导致在生活经验中欠缺精准的判断，展现了认同的迷失与融入的两难。《荆棘丛》里所要带出的城市是作为主要的标志性书写，它汇集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城市的一般资本化的特点，令人感到丰富又空虚。这里体现韦晕从在地性的离散表现，以及也从离散的意识寻找栖居感。

《荆棘丛》的描述有关香港和马来西亚城市的形貌，对于自身的未来持有莫名的未知数和不安。是故，香港经验具备有影响力的文化载体，主人翁对“星洲的海滨夜色真美，香港是比不上的”夜色的眷恋，到“这岛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不能离开它！”<sup>200</sup>，当中从异国对于母国文化反射（refracted）与弹力，说明城市文化虽浮华艳丽但犹如空壳，虚无短暂，不都显示主人翁对马来亚贯穿主线，才迫使于中再度点燃“寻根”之旅。在叙述新马故事之际，香港与新马抑有相似的“文化殖民”经验，这也作为韦晕笔下所挥之不去的。

#### 4、荒诞人生与意识流

韦晕在作品小说所展现的零碎的片段，都是由于长期旅居和离散之下的结果，随着不同叙事声音不断的更替、流动，殖民文化就无意识的镶入（embedded）和渗透在日常书写中。韦晕所表现的散居性质，在书写马来西亚与香港之间至关重要，尤其通过从在地境况的理解连结生命经验，开启了

<sup>199</sup> 韦晕 <黑岩石上>，见《野马随风》，页105。

<sup>200</sup> 《荆棘丛》，页16。

对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寻觅。香港本身代表高度资本物质的象征，其城市文化虽具体现程式化的现象，充斥着中西高度混杂的地理及文化符号<sup>201</sup>。

为此，“香港”与“城市”就成为韦晕密不可分的切入点，这可看作是韦晕打破“此时此地”的本质，与过去记忆追溯的张力，以虚构某种自我放逐。因此，在城市中思考就如人性处于一种在“在狭缝想像”。正如就如韦晕将“香港”和“城市”在文本中的发挥，便能看出其中的“双重狭逢”的再现。相较于同时代的新华作家如苗秀、赵戎，韦晕采用意识流的书写模式，体现现代社会的离散主体，则是超越苦难与非苦难的叙述，而是通向一种虚无 / 拥有的精神表现。那么这个写作动机有何而来？韦晕曾对于加缪与卡夫卡的介绍和推崇，尤其有关现代书写方式，使得韦晕从中对于城市人性格的荒谬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

“卡夫卡主要是个人被非人格的势力压迫，而他的内心反叛抵抗这种压力。卡夫卡的作品里，我们总会察觉到他描写的现代人物，不算是充斥了颓废和忧郁<sup>202</sup>”。

韦晕对卡夫卡的评介，再结合他刻画的离散华人经验，更加能折射出人性如何在一种无根或边缘的氛围里，更加显得荒诞和非理性。因此，韦晕笔下的中产阶级人物，具有类似“卡夫卡式”的文学缩影，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步伐催促下的无力感，对社会事物无能力承担。

意识流的叙事技巧，素来具有将“心灵戏剧化”的企图，尤其叙述者所要抵抗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展现内心的表现手法<sup>203</sup>。韦晕尝试将意识流贯彻在叙述过程中，也打破“本土化”的成规来展示原乡和他乡的关系。加上韦晕在香港九龙、大角咀和大南街一带住过些许日子，对当时香港氛围也

---

<sup>201</sup> 陈清侨 <代序：文化想像的时空>，见《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页xvi、84-85。陈清侨指出，在撤出这块殖民乐土之前，英国政府固然想要在此地留下长远的历史名声、道德气势以及政治经济利益。国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概念，看来都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因此，从后殖民理论来看无疑是当地的文化受到这些西方文化及思潮，或殖民风气的影响。夹缝性这个概念指的是，从夹缝清楚引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sup>202</sup> 韦晕 <身后文章和有名的卡夫卡>，见谢克主编《新生代》，1969年11月，页62。

<sup>203</sup> 韦勒克著，刘象愚译《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页230。

颇有体会<sup>204</sup>，也产生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意识。虽然《陨石原》和《荆棘丛》与距离韦晕50年代的写作风格并大不相近，但两者的叙述和情节安排其具时空跳脱性，相似点在于叙事空间的转换和叙述主体的随意调动，增强个人的感官体验。《荆棘丛》里大量使用“白烟”、“烟圈”为回忆的媒介体现一种叙事模式的空间措置感，直到写于80年代的〈风过处，水无良〉，后者更加偏以双重格局的模式来带出离散华人在城市中展现“归根”的隐喻。介于香港与马来亚的寻根之旅，韦晕采用的“意识流”的手法，更显挑战当时以现实主义独大，也为开启离散书写策略的另一面。之前论文的讨论中有关韦晕民族志书写、意象和象征符号的使用，加上不少学者以写实主义来讨论他的叙事模式，而“回忆”作为交叉和贯穿在叙事中，体现了时空的断裂<sup>205</sup>。这或许能说明艺术手法的转变，能对建构离散主题更为恰当？与其说“在家”的离散更显曲折，在外的情况更是展现“再移民”的表现，来贯彻一种不得不离开但又得受到良心的谴责。

〈风过处〉通过一段离奇的“无头血案”将主人翁“送回国”的非写实性小说，淋漓尽致发挥离散主体游离在跨城之间，对归根的目的进行讥讽。这篇看似由碎片化的情节和不连贯的叙事模式，以及由多段的意识流展现杜秋和阿萍的心计，实际上也是反映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人物，中缺乏担当的人物角色，以及塑造像杜秋这类反英雄人物的“寻根经历”，呈现一段离奇的叙事架构。例如，韦晕在故事中打破了杀人偿命等守旧的因果关系，突现阿中如何从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吉隆坡的空间替换：

“他心想，幸而报道跟自己居留的地方没有邦交，自己到了香港后，多花了十五块钱长途电话费，通过那半官方的侨务机构，申请到[回国观光]的入口准证……自己能及时离开现场，回到香港，免了趟这淌浑水。杜秋心想，这是祖宗有灵<sup>206</sup>”。

看似杜秋以荒谬的表现行为，实际上展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属于这高度现代国家的产物。〈风过处〉除了展现边境作为当时政治氛围的复

<sup>204</sup> 韦晕《文苑散叶》，（吉隆坡：铁山泥出版社，1985年），页114。

<sup>205</sup> 苏晖、蔡晓玲《论韦晕小说的回忆叙事》，见《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页71—77。

<sup>206</sup> 韦晕〈风过处，水无良〉，见《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1年），页19。

杂，也体现都市人性的自私与高度扭曲的人格。对此，这表现韦晕通过个体的意识流表现，倾向于采取一种有限视角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表现出个体由于各种限制而陷入困境，人物的自相矛盾、多疑，并且能够进行自我嘲讽和自我批评的面向。故事的双线格局叙事模式，相互替换阿萍与杜秋的叙事视角，通过切换各自的行为与电话通讯记录，各自揣测对方的来历，将人性的自私发挥到极点：

**杜秋：**“杜秋想到阿萍是管理这里招待所的人。不然的话，她怎么会有那么大权力，把自己接待到这里来暂住。

…会不会阿萍是这房子主人的情妇？

…那台北小姐跟阿萍有什么关系？

…怎么阿萍会知道自己到台中来？<sup>207</sup>”

**阿萍：**“自己觉得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阿萍了。

…这不能怪阿中见到自己就认不出来。阿萍一壁抚摸自己的铜体，一壁叹气。

…会不会那家伙在外边种了什么降头，见到自己人都认不得？

…他们当兵的人，有不少染上了同性恋，会不会害上了什么艾滋病…

”<sup>208</sup>。

实际上，杜秋在台湾与旧情人阿萍重逢之前，朱蒂是代替阿萍的影子出现在杜秋的生活中。当然，两人在见到隔了数十年再见的后果，表面上虽平静，但却难以掩饰自我纠结和怀疑的心结。故事中的“阿中”原是在二战期间作为日军的“军补”，战争结束后改名为“杜秋”以用之来撇清这段历史的包袱。后来，杜秋从友人“李天禄”得知“阿萍”这个失散多年的知己，决定前往台中寻找她的踪迹。不料杜秋到台湾而偶遇女导游“朱蒂”，来到台中寻找杜秋，谁知她意外被汽车撞倒导致失血身亡。这一幕刚巧被阿萍瞧见，便一概嫁祸给杜秋，而以“因奸不遂”成为一段弃尸案。杜秋为了自保连夜搭飞机到香港然后转机到吉隆坡，就此回到他的故乡“避祸”。小说

---

<sup>207</sup> 同上，页10-11。

<sup>208</sup> 同上。

中人物怪诞、冷漠的举动以及充斥了怀疑和猜测，逐渐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生活惯性的语言。此外，小说的叙事充满个人想像的碎片，缺乏线性的叙事脉络，将城市书写带入一个错中复杂，梦魇般的离散主题，充斥着人性的冷漠，背负离奇和无厘头的命案指控，杜秋在文中可被视为弱者，以及一个彻底被淹没的男性主体。他频繁自称为“异乡人”，加上韦晕善于将杜秋和阿萍两性的博弈和身体书写，更是反映离散主体人格的缺憾与担当：“这个在南洋打滚了二三十年，早就成了异乡人的杜秋，听到老朋友那可怜女孩子一连串悲惨的遭遇，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只让自己额角的青筋，不停抽动”、“杜秋记起那台北小姐含笑对自己说过一句话。面对着那现实失散后重逢的女人，心坎里一片冰冷”<sup>209</sup>。有学者指出，都市书写的特点主要将城市、帝国主义、工业文明、城市蜗居视为现代化的“人造现实”（artificial reality），当这些“现实”与“城市”的符号镶入在文学形式中，它关系到文本与实体城市存在某些文本性（textuality）。尤其西方文化是趋向物质主义，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对它的敌意。这种敌意既是对启蒙价值的怀疑，不仅建构起来的“城市身份”揭露隐秘性的文化价值，这些元素取代了原始冲动，个体变得更加私人化、专注自我的身份显露<sup>210</sup>。

从《陨石原》到《风过处》的叙事方式，更多是从碎片的式的描述连结过去和当前。或许我们能从后见之名来看，从《陨石原》开始的创作及故事女主人翁的旅台经验，以至到《风过处，水无垠》的跳脱式的逻辑里，这些叙事内体现的断层，或许是母国种族政治为独大情况下，将碎片化的华人性与艺术手法为另类的写作起点，重新将中国性 / 华人性，放在跨国流动的语境重新思考。本文认为，韦晕虽然意识流作为来展现的离散主题，不免落入形式主义的嫌疑，不时的抽丝拨茧而陷入回忆的旋涡，起到了模糊小说中新的焦点；这看似形式决定来思想内容，加上过多的细节描写，逐步削简了“说故事”的驱力。

---

<sup>209</sup> 同上，页4、8。

<sup>210</sup> Richard D. Lehan, *Literary Modernism and Beyond: The Extended Vision and The Realms of Text*, US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12;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6-9.

## 第二节 离散华人印记的“再造”

韦晕曾在五十年代写下的〈旧地〉，恰好与“灰阑记”母题相关，这也是他介入马来亚书写与社会文本对话的体现。从这脉络下来，我们或许能从互文性的人物对应，表现和连结离散书写中。这可作为作者通向文本之间存在作为一种合作、并存关系，按照各自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两者关系互换不断<sup>211</sup>。那么，为了进一步彰显东南亚华人认同的复杂性，韦晕叙事中离不开与记忆的钩沉，也超越当时一般马华写实主义作家的偏好，将华人性的诠释与论述带入另一层次，他也尝试从西方现代经典人物的借鉴，再造离散华人的踪迹。

据笔者统计，除了传统的俄国写实主义作家，韦晕小说共出现多种英、美与法国作品的对话与化用，题材围绕女性在社会地位、现代文明，以及人性异化之主题。当中包括的文本涵盖美国、英国与法国经典文本如：李察·梅臣《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西奥多·德莱赛《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弗朗索瓦丝·萨冈《日安忧郁》*Bonjour Tristesse*、以及法国诗人夏尔·佩罗《蓝胡子》*Blue Beard* 等等。

在紧扣本文所讨论的文本，本文并非是采取宏观的比较研究，而是从中发现韦晕如何巧妙化用人物来贯穿华人叙事，以致对于城市书写的一角。笔者则以德莱塞和劳伦斯的小说人物为例，作为体现韦晕对跨文化的认知与影响（*impact*），如何对笔下人物进行对照和转换（*response*），在深化小说的主题之余也体现对双重离散书写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 1、都市与消费主义

黄万华指出，“本土”既是具有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旅外”向“在地”的转化，也促成“在地”表述的多元性<sup>212</sup>。韦晕对于德莱赛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是颇受青睐，也曾

<sup>211</sup>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页19。

<sup>212</sup> 黄万华〈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见《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 第4期，页157-165。

发表相关评论与见解：“美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写实作家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里的乡村纯洁小姑娘“嘉莉”，到了大城市打滚后染上城市的毒素，变成一个虚荣淫荡的女性。虽然说她是个由文人的创造人物，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终会被时光或环境改变了自己的定见<sup>213</sup>”。詹明信曾对德莱塞《嘉莉妹妹》提出批判，指出为了突出美国高度资本主义社会迫使嘉莉性格的形成与情妇通奸情节，对人性道德批判的忽略<sup>214</sup>。《陨石原》则是聚焦处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与离散到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对此，我们不难从“青瑶”眼中便可发现她们纠葛在文化碰撞与焦虑：

“在这座机场大厦中，镁光灯从这里闪动，从那里闪动，配合笑声、吵声，教青瑶记起过去那美国作家得雷赛的 [嘉莉妹妹] 里的嘉莉小姑娘初次进都市得焦灼情形，大约跟自己得自己差不了多少…嘉莉这个小说人物，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旧人物。在青瑶的心目中，嘉丽这个乡村姑娘的幽灵，并没有随着时代死亡，还紧紧附在一些人身上，她想起了娜妮、娜娅、小珍。嘉丽这个乡村姑娘是给虚荣浪潮淹没，给崩坍下的现实埋葬了<sup>215</sup>”。

作者无不展示出对于消费文化的迷恋和抗拒之间，写实的背后无疑带出对商品化社会的诱惑与迷茫。基于这些“旅台生”的经验和求生存的目的无不展现与资本主义的进程挂钩。嘉莉这位女性人物，出身社会的底层，为实现自我的理想和欲望，到大城市闯荡，她不惜抛下面子和荣辱只求得事业和爱情两全其美。最终嘉莉挤入上流社会，置身于光辉灿烂的环境之中。这或许也是韦晕要叙述和批判的一面：叙述者赋予青瑶这个具有分辨意识的角色，从文化不适应和文化差异和考虑现实利弊的过程，我们则能以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出《陨石原》中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加上作者借鉴《嘉莉妹妹》的嘉莉人物形象，去拟刻小珍的性格，更可以突现她如何在高度资本化和消费化的社会文化的浸染，而更加趋向于精神分析学里强调的“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梦想和生命逐渐走向幻灭。在弗洛伊德看来，人要

---

<sup>213</sup> 韦晕 <谈转变>，见《馥尘集》，页46-47。

<sup>214</sup> 詹明信 著，唐小兵 译《后现代社会与文化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21。

<sup>215</sup> 韦晕《陨石原》，页10、66。

实现社会与经济的成就必须克制和压抑内心欲望，这将导致人类丧失真实情感，而小珍加上背负了离散的特质，使她成为了处于“文明社会的缺憾”里的代表小说人物之一。

离散的身份认同则是能通过不断的转换，介于重生与再产的过程之中。当中的三位女子来说亦是如此，在看到人行街道中充斥着闪烁霓虹灯、楼层挂满商店招牌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其症结所在体察自身迷失在作为“现代人”的一份子，如伊格尔顿指出一种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无根状态（*expression of the rootless conditions of an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sup>216</sup>。此外，《陨石原》为了跳脱单纯的小说叙事，最后以“小珍”的日记为一连串的“事件”，描写她如何以遵从自己的内心，既享乐原则，而舍弃自己的道德原则与中华文化的根，以致个体的解放，对性关系的放纵。《陨石原》也将“文化杂糅”的特质与资本文化起到关系，它不仅是体现女主人翁认同的多变，当中频繁出现“青瑶”如何在街道不断听见她熟悉“南洋腔调”，使她在异地感受多重文化的混合；故事以西方经典人物的穿插与比较，在放大现代人的弊病之余“母国”文化也是作为保持个体的民族性与文化差异。韦晕将她们赋予女性与都市、消费生活接触等种种面向。对此，通过《陨石原》所传达的宗旨，当中的叙事亦证明离散不再只是单纯的乡愁或幽思，除了能从性/别隐喻中发现现代女性与家乡的问题，女性不再作为依附“家”文化和传统，它也在于重构女性与离散的关系和提供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的“家乡”，是如何进入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进程而被解构，以致通向文化“失根”与“无根”的机制。

## 2、“残缺”为失根隐喻

此外，韦晕也以“瘸脚”形象强化离散书写，除了能进一步深化战后暴力的残留，也将华人在扎根故土后的焦虑一并联系起来。例如在〈浪涛〉，故事可以说是拟仿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丈夫克里弗·查泰莱形象在二战过后下半身瘫痪，而导致终身阳痿。当中论述在战后中长期做轮椅，查泰莱的形象作为文本中主人翁“心存”的对应：

---

<sup>216</sup> 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 Said, introduction by Seamus Deane,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35.

“女的把眼向他的膝盖一瞧，那是一本泛亚堂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文版。男的轻轻把她的手移开，在灯光晃动下，他勉强咧开了口，有气没力的说：“我很好！”虽然这么用苦笑回答过了妻子的殷勤爱抚，但他那昏闭的脑海中，还是给查泰莱和他的妻子的幽灵，用几把手拉动他的神经，拉动着他的心。终于，他把沉郁眼睛正开，站在自己面前是素娟——自己的妻子，不是查泰莱夫人<sup>217</sup>”。

〈浪涛〉体现“心存”在身体和精神上残疾的表现，无非是由历史暴力创伤构成，当中的情节是心存在阅读劳伦斯的小说想像自己是个瘸脚的男性，最后毫无勇气跳海却无意牺牲太太素娟。这或许暗示华人面临失根的焦虑，而素娟在小说中作为工人阶级代表显然和查泰莱夫人有所不同，而是多了一份共患难的情怀<sup>218</sup>，只不过由于心存妄自菲薄，面临勒某种男人尊严的丧失（wounded masculinity）。笔者认为，〈浪涛〉并没出现通奸情节，而是男主人翁丧失身理上的主体性，太太成为接替和掌管心存生活的主导权。周蕾指出，尤其在大时代的社会转型期间 女性具有自我牺牲的特征，足以让她促成一种援助（stand-ins）的角色<sup>219</sup>。由此，从身理残疾转移到心灵残疾，亦是体现离散华人主体性的散失。

将身体残疾的潜移默化到个人意识里，这将导致身心的麻木、惶恐、空虚、寂寞，对现代社会认同的困境，构成了离散和残疾话语形成的可能（discourse of diaspora and disability）<sup>220</sup>。换言之，残疾的符号代表“从属关系”的声音，唤起离散华人的某种的缺失和挣扎。按照勒汉的观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再现的是一个英国旧工业时代的没落，而这个时代的崩塌是由故事主人翁克里弗·查泰莱的残疾、失去性功能化身形象，一种生命走向枯萎的象征。这展现劳伦斯对当时英国工业社会的不乐观，他崇尚自然、痛恨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扭曲病态，而笔下康斯坦思的婚外情，在生活上取代了丈夫克里弗·查泰莱，在这个新生活里寄托了通向一个新兴工业社会（a

<sup>217</sup> 韦晕〈浪涛〉，见《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年），页80-84。

<sup>218</sup> 同上，页87-88。

<sup>219</sup> 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70.

<sup>220</sup> Chris Ewart, "Terms of Disappropriation: Disability, Diaspora and Dionne Brand's What We All Long For", in *Journal of Literary & Cultural Disability Studies*, Volume 4, Number 2, 2010, p. 149.

new form of industrialism) 的希望<sup>221</sup>。就此，原文的可译性，必定为“译文”（异文）带出原文的重要和创新，激活了在场性的元素和力度。在这个层面上，韦晕把属于离散华人和马来西亚本土题材“全球化”，也将普遍的资本主义及议题“在地化”。

### 第三节 文化错位与认同抉择

“文化措置通常指得是离散艺术杂糅性的标志性定义…表征上超越了视觉上的陌生感…离散的存在是格日常经验的瓦解，是日常生活秩序的错乱。离散状态是一种紧绷的时间，夹携着生命的感知，以及永远丢失在存在的“时差” (time-lag) 中<sup>222</sup>”。

离散艺术作品的内涵之所以体现杂糅，主要在于它重塑视觉意义的时间性。这个时间性 (temporality) 是由艺术家的离散经验促成。经验落实到艺术作品中，其文本内具有对立、冲突的符号，不再是差异而分化，而是暗示一种内在的时间性 (imminent)，这也就打通传统阅读与书写的历时关系。对此以《陨石原》为例，它展现了两种的叙事分层：1、主人翁的叙事时间，以及 2、文本内符号出现的时序。两者时而重叠和交错，展现一副动态的叙事模式，体现韦晕在离散城市写下的一段跨城体验。这批女性从香港到台湾，在短短几天内所接触到的城市文化，是个由“资本化”、“空间化”和“政治化”的合成体。叙述中看似支离破碎毫无连贯的结构，这却可认为作者将“城市”作为素材和主人公主体性的错位，而当中对殖民文化的批判则是隐现的。

对此，在旅行的过程中，作者尽可能以抱着“寻根”与“离散”的辩证中，尝试寻求精神互动与超越。韦晕并非有实际的“旅美”或“流亡”的实际行为，然而我们能从具体的“双重离散”，横跨到文本内“多重离散”的文本空间，诠释韦晕在跨国寻根过程的大胆想像，以放大自身为东南亚华人流离感性，以及面临中西文化错位的延伸版图。

<sup>221</sup> Richard D. Lehan, *Literary Modernism and Beyond: The Extended Vision and The Realms of Text*, p. 56.

<sup>222</sup>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338-368.

## 1、异邦想像、旅美经验

收入在《寄泊站》小说集里的两篇小说〈他乡〉和〈秋情〉里，从《陨石原》的主题过度到描绘海外华人在亚洲与美国地区的生活情景，通过寻找某种文化遗址以探究其第三个层次的身份认同危机。从香港到美国的跨国叙事，进一步体现寻根的动机和扩大对异邦的想像。〈他乡〉中，以第一人称“我”在美国的“迈阿美”（Miami）到“旧金山”，目的虽是回到旧金山寻找旧相识的爱情故事，但是其中有关家乡的乡愁“看到旁着大西洋沿沙滩几株椰树和飘忽的白云，自己还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情怀逐渐在文本中被放大和聚焦。其中在文中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要寻找在旧金山唐人街里的“同乡馆”，而在寻找旧址的过程中，召唤出片断和零碎的记忆，迷失在快闪而过的美国大都会场景：

“这条街上下横叉出来的华盛顿街、士托顿街、加罇宽街和都板街几条歧路，穿来插去，大约还不会一下子迷路……我心里想，在这个旧金山的唐人区只是一个小圈子吧了，到处都有华文路牌，难道自己会认错了路<sup>223</sup>”？

“她说的不是旧金山同行的那种华南方言，而是清脆的宁波强调。过去，我在香港生活那段时间，与隔壁个开印物的宁波人老乡，交往惯了，我对上海方言也能多少明白过来<sup>224</sup>”。

一个异乡人面对熟悉曾经的地标和方言，或多或少有益于克服在异乡的陌生感，而在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之余，中国文化的印记浮现在美国地标和街道中，唤醒曾经在家的熟悉经验，一种从喧哗的声音和复杂的语码中辨识寻找自己的存在意识。当“我”第一次踏入美国寻根的情结，在一路上瞧见的“钟楼”、“石印”、“马褂”、“杏仁茶”、“华人馆子”、“广东馆子”、“彩墨画”、“四邑口音”，以及“我”与卖中国画的中国女性的交谈，展现一位香港华人的记忆与美国资本社会文化的措置，叙述主体本身一个混合文化形体。而在〈秋情〉里，则是通过主人翁“杜万”的视角，一窥二十年后再度重访香港市区“油麻地”和“湾仔”地区，并自称“自己从南

<sup>223</sup> 韦晕〈他乡〉，见《寄泊站》，（吉隆坡：马来亚印务有限公司，1986年），页53。

<sup>224</sup> 同上，页57。

洋回到岛上来，跟一般州府客回来吃风不一样”、“选择了捞着派客栈，暂时住下”。不过当他在离开新马一带尝试赴香港寻找从前生活的记忆与印记，他却认为：“从接驳的小汽船舱踏上了岛上的第一步，自己像只荒山里住惯了的老鹰，初次飞到了万紫千红的公园来了，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想起在南洋老是喝洋酒，有点腻胃<sup>225</sup>”。

此外，和〈他乡〉一样，〈秋情〉全文以“南洋”字眼贯穿主人翁的处身地，并非意味来自东南亚一带。许云樵在《南洋史》指出，“南洋为一特殊性之地理名词，古称南海，导源甚古…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规定，现意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sup>226</sup>，因此“南洋”一词早在东汉经学家刘熙指出已开始流传，并认为“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曰海名，故言南海”，其具“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篇小说的其叙事有异于一般主人翁是从马来西亚到香港，〈秋情〉中的杜万则是从“南洋”回归到香港，从移民个体来说承载一种远端的中华文化想像。有关跨界移民和身份认同的迷思，韦晕持有一定的敏锐性，将“南洋”视作一个和谐地缘的时空体，它与中国与香港历史的纽带关系，也是他在回归与否之间所面临的抉择。如是，〈他乡〉和〈秋情〉中展现的文化交错，离散华人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的不适应，由身理渗透到心理的挣扎，相较于南洋芭蕉细雨风景，美国的大雪纷飞更贴近游子的迷蒙之感。在寒冷的异乡，这样的措置感更加强烈隔明显。在展现一副错中复杂的寻觅之旅，迷失在大都会的人群和喧闹之中，在大街上瞧见的与意识中浮现的街景面貌，美国作为西方大国的文化更是淹没主体性的存在，对于异文化疏理感的可能。

美籍华裔学者周蕾（Rey Chow, 1957 -）曾指出，“中国性”（Chineseness）在海外的延续和差异，并不能从血缘关系加以定夺，是必须放在政治与社会话语下，才能解构（unlearn）其多元的指涉。她认为在二战结束后以来，香港在英殖民和中国共产党之中处于边缘地位。这是由历史因素构成的，因此可以将此视为一个离散事实（diasporic reality），香港更是以

<sup>225</sup> 韦晕〈秋情〉，见《寄泊站》，页38、45。

<sup>226</sup>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星洲：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页1，3。

作彻底的离散城市<sup>227</sup>。韦晕对于香港的离散书写，文化杂糅性质由城市印记所召唤出，并应印在不同区域的华人身份之上。有鉴与此，韦晕丰富了在地经验和嵌入不同的“香港经验”和（非）在场性，在赋予小说这个文本新的阐释能力，通向“在地性”书写的转移，彰显韦晕自我认同的复杂化。

## 2、从留学到“流亡”

按照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的观察，海外华人认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归根、生根、失根与无根<sup>228</sup>，其中展现华侨到华人身份转变，从传统式到后现代式的选择。这或许也呼应韦晕笔下的人物表现，虽失根，但不至于具有后现代式的“无根”，加上从文化杂糅到文化“错位”，韦晕所建构殖民时期的文学形象，无非是冀望体现“后移民”的书写潜能。无论是空间或文化措置感，所体现离散华人则是处在暧昧的国际关系里。以此，从刻画旅台书生的经验到描写偷渡、海关的面向，则是韦晕对香港这个充斥殖民文化场域的想像，从离散到“流亡”的表述，也就打破生根或归根的双向抉择。有关于韦晕与离散相关的副主题——“流亡”书写。

〈无影族〉淋漓尽致写下一段流亡者精彩的叙事，当中紧张的铺陈贯穿在香港“走私”，贯穿跨国移民的形式，当中也正好对清朝时期香港大量鸦片走私的历史，起到异曲同工之妙。故事以第三人称“卜吉”的瘸脚中年男子为中心，他如何作为中国南来移民成为无国籍的“流亡难民”，之间穿插不少有关逃亡叙事之外，被地头蛇利用贩毒。卜吉在走私的当儿，本身也幻象到美国淘金梦（gold rush）顺理成章成为美国公民。但不幸的在美国唐人街华人地区求投靠求生存。主人翁秉持着“无国籍”的身份，穿梭在历史、东南亚地缘政治的话语中：

<sup>227</sup>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25.

<sup>228</sup> 廖建裕〈现当代的中华移民及其后裔：归根、生根、失根与无根〉，见《亚洲文化》，2015年第39期，页44-59。

“卜吉像一条僵尸那样躺在板床上发呆。想起阿堂他们乘搭的那条木船，会不会安安稳稳到了公海，会不会南下到中国海边沿的马来水域，那儿有个收容难民营，让他们暂居，等待第三国收容他们？”<sup>229</sup>”

“想起自己这个浪荡族，几十年间从一个有国家的人，变成一个异国的移居者，有变成无国籍的人，再沦为一个逃难者，到处流荡，最后却成为目前这样的一个见不得光的非法移民，一再变成了无影族的一个成员”<sup>230</sup>”。

边界（borders）与经济和文化方面起到重要的相撞与融合（collide and converge）的分界点，而“真实”的边界通常以铁丝网、水泥墙、地雷区、海关，或军人把守<sup>231</sup>，尤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家边界成为现代世界地图上的要素，亦是充斥着扩充现代文明为发展<sup>232</sup>。在小说里出现与海关、海洋边界书写，它带领主人翁逃亡的视阈，由海域充当边界的海权，也就象征一种划分国际地理的权威，主人翁的认同与国家之间又了重新洗牌定位。原以香港辗转到美国的卜吉，可以获得“绿卡”成为当地公民。为了逃离而选择不被黑锅定罪，他成为政治逃犯，不仅使自己的淘金梦和成为美国公民的梦想幻灭，也沦为国家拘捕的流亡形象。韦晕并非刻意触碰“去国籍化”的论述，而是主人翁在“失根”和“寻根”的过程，扮演着一个无国籍的华裔流亡者，在不受到政治干扰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卜吉始终被背负着浓厚的流亡角色，无国籍的身份始终是个注定的标签。台湾学者侯如绮曾指出：

“流亡是被放逐，被迫离开「在家」的状态，期待一个乌托邦的国度…而离散一方面心系故国之情，一方面又努力的「生活在他方」，离散诉诸于摆荡在原乡与异乡的张力，聚焦于归属与认同的多元性”<sup>233</sup>”。

---

<sup>229</sup> 韦晕 <无影族的落户>，见《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页134。

<sup>230</sup> 同上，页144。

<sup>231</sup> Dallen J. Timoth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in Helmut Wachowiak eds., *Tourism and Borders: Contemporary Issues,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 11-13.

<sup>232</sup> 唐晓峰 <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页23。

<sup>233</sup> 侯如绮《双乡之间：台湾外省小说家的离散与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14年），页34。

“流亡” (exile) 一词在希腊文 (exilum, exul) 中意思为逃亡、畏避, 放逐, 而流亡的话语与人类精神文化活动, 一开始就有了与人之生存有之紧密联系。另外, 流亡属性带有政治因素 (或被迫害), 主体实质上触碰到官方的底线, 而被逐出国境之外的现象, 也因这层因素而有家回不得<sup>234</sup>。对此, 流亡和离散却有重叠和暧昧之处, 但我们可以将它分开为“作者经验”和“文本经验”来处理有关流亡和离散性质的体现。当然, 能肯定的是韦晕本身并不是一个受到政治“迫害”而成为逃亡的南来作家, 不过从写作层面来看, 我们在第二章论及的“在地离散”或境内离散, 以致到他在80年代写下的〈无影族落户〉里展现所谓的“离散”, 后者更多是增加中以强调国际边界的叙事元素, 通过“被叙事者”的角度处理主人翁因走私贩毒而踏上流亡的道路, 其中的“流亡”性质更胜“离散”的层面。

韦晕从这部小说所体现的流亡, 不仅是创作主体的内在的放逐, 它主要是建立在现实中进一步深化流离表现, 加上故事以走私主题与‘边界’紧密相连, 因此小说中的流亡形象建构并非偶然, 而是通过主人翁试图重重的边界而成为‘偷渡客’来建构一种流亡的话语。这里的流亡更是以个人行为主导, 但是当中有隐藏些许国家意识形态, 来表述‘偷渡’与‘流亡’之间的修辞。另外, 流亡者身份则是作为香港华人身份和中国人身份之间的隐喻。“香港”这个城市印记, 转换在韦晕笔下或许就是个以“流亡者”的命运角色进出, 即包含不中不西, 抱着东奔西走的流离状态, 即带着充斥现代文化的场域, 也是展现华人性在西方异乡的灰色地带。海域连结了香港、马来西亚和美国在地域转换, 像卜吉固然以政治逃犯的形象出入, 与其说是“流亡”, 本文认为〈无影族〉也隐含海外华人的放逐叙事。本身的性质将“回归”到马来西亚或香港已是被推迟, 被迫成为美国当地的底层人民。吉卜作为跨国叙事的主体, 以中国和香港作为乡也好, 跨国的海域边界也罢, 皆是形成主人翁自我放逐的文学地理指标。

---

<sup>234</sup> 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参见网址: [https://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archive2/DACHS\\_Leiden//archive/leiden/poetry/20040712/white-collar.net/01-author/g/01-gao\\_xingjian/029.htm](https://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archive2/DACHS_Leiden//archive/leiden/poetry/20040712/white-collar.net/01-author/g/01-gao_xingjian/029.htm)。萨义德曾在 *Intellectual Exile: Expatriates and Marginals* 〈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指出, 处于在现代语境中的“离散”, 并非如古代的“流亡”层面那种孤立无缘, 或是对家乡遥不可及之说。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 以确保主体对家园保留一种“中间性”的性质。另外, 流亡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性 (a metaphorical one) 的姿态, 主体是具有一种“精神流亡” (metaphysical sense), 体现若离若即的困境 (constantly being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others)。

此外，故事中也体现从香港到美国的“华裔学生”的困顿。这也使突现韦晕善于观察国际政治其下等文化冷战背景，夹杂在流亡的文本经验里。有学者指出，香港在文化冷战中受到美援文化的支持。在出版刊物的内容，不免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就如指的但凡从中国移民到香港的人民，一概视为‘难民’群像<sup>235</sup>，以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投靠的隐喻。因此，韦晕笔下的卜吉，由于经历逃亡而身体缺陷——跛脚的形象使他成为另一层隐喻，即再现了失了根的华人，以及在有家归不得的情况下，流浪和跛脚的主体也就成了笔下“合成性”的人物，一种“离散”于家园和“流亡”在国际政治经的阴影下的叙事主题。对此，〈无影族〉进一步深化“异邦的想像”之际，韦晕描写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人“不管你是越南人、是泰国人、中国人，过了番久了，跟这些南洋土著通婚后，他们的后代都是面色黄黄，不是长脸，就腮帮大大的阔板脸”，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从肤色和面向，将华人形象以偏概全。就如在〈旧地〉里的唯一华人“阿贵”，成为殖民文化下的弱势群体。从“留学”到“流亡”书写，无论阶级由高低之分，华人的形象再度说明华人在国际地位的尴尬与暧昧，还原自我和寻根的跨度，则愈上加难。

“河的对岸是另一个国家…这几天风声紧，上头查得严，倘使没有拿出证明文件投进去是很容易的，他们船夫可以把你混进去，可是到了明天回来时，就麻烦多了。两边的海关员和关境警察都像你找麻烦。丁明望过去这个中年男子，不像个中国人，可是说的话确是闽南话<sup>236</sup>”。

以上是小说〈边河〉里的“戴先生”在南中国担任小兵，他被日军俘虏后，成功逃出日本宪兵的魔掌，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事隔多年，戴先生过着流亡者的生活，后来在友人的掩护下成功从珠江潜逃到香港；在〈二公的退休〉“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破伞〉“瘸腿的流浪汉”、〈迟春〉的“谢文”移民到马来西亚“金山沟”数十年，辛苦攒钱使他对新马“心理和生理上衰萎因素…把他凝结成了一具机体的工具吧了

<sup>235</sup> Maud Russell, “Why Do Chinese ‘Refugees’ ‘Escape’ to Hong Kong?”, *Far East Reporters*, (New York, 1960), p. 5.

<sup>236</sup> 韦晕〈边河〉，见《日安·库斯科》，页39、41-42。

”。〈迟春〉里的“侨批”作为连接谢文在新马与香港的情结，不料被堂弟一夜之间卷走，举家逃离到美国，只剩谢文从番客成为难民。或许韦晕将自己的离散进行戏剧化，以其具跨国犯罪的放逐形象，暗示自我身份模糊不清，犹如一个被政治迫害而被迫放逐，连接美国、东南亚与香港形成“金三角”的跨国行迹，颇有引人入胜指出。

所谓“认同”的特质，并不是时间上某种持续性（not a set of traits or an 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s），它不仅不是被给定或本质化，而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属于被惯性的创造和维系的<sup>237</sup>。因此，我们能从韦晕一部或多个叙事文本中发现，当中的叙述主体是具有超验（transcendent）性质的，他/她可以是拥有马来亚西华人、香港人、南洋人或中国人的历史传承的关系，形成一种重叠的离散主体和文化分身（overlapping self identities）。无论是留台求学的居住经验、偷渡或是单纯的寻根目的，其行动说明海外华人对于回国或在居留国的模糊（unsure of going back and doubts of about remaining in），以文本里的几个地区如马来西亚和香港，甚至远在美国为例，在彰显一种自我识别与认同的困难<sup>238</sup>，进一步扩张寻根的版图。或许对于韦晕来说，唯有不断游走和保持游牧心态，才是他安身立命的选择。韦晕有关流亡书写里有难民的性质，虽在有家而归不得的情况下，韦晕极力在异乡塑造文字乌托邦，但这并非完全是与“政治迫害”有联系。换言之，笔下的流亡写作，更看作是尝试说明国族认同与华人失根的隐患。

### 3、性 / 别与国族叙事

如之前所论，韦晕除了刻画系列贫民百姓与居住新村的居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而女性与离散两者之间，它们主要建立在经济因素和和社会观念之上。通过叙事主体与流亡的关系，政治暴力在韦晕的笔下，文化杂糅更能体现性 / 别与国族叙事的纠葛。例如，小说中的慰安妇如何被迫离乡背

<sup>237</sup> 安东尼·纪登斯 著，赵旭东、方文 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社会晚期的自我与社会》，页 57-58。

<sup>238</sup>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 64-65.

井，同样的在失根于家乡、亲人和地方归属感的情况下，跟随在马来亚结识的伴侣生根或再移民的流动关系，承受迁移的痛苦和饱受性 / 别歧视：

“秀子那充满了仇恨的思想和人生观，终于改变过来，那是遇见了部队里的那个关井少尉以后的事”、“关井把秀子救出来，替他管家和管理食堂，不再受到那些禽兽一样的鬼子兵糟蹋和作为纯泄欲的工具”、“扮演拿丁太太的，是同在一出戏出演的秀子，那个可怜的阿萍，带上老花眼睛来，那脸颊上的位斑给掩住了，那灰黄眼瞳却比过去更加迷茫<sup>239</sup>”。

在阐述移民意识的问题化和文化内涵的扩张，一窥之前所分析的文本里，笔下不少人物则是经历彰显多重离散轨迹：从中国离散马来亚，为第一次的离散，从马来西亚到港台，为第二次，之后从来回马来西亚和港台之间出发，离散到美国，为第三次的“再离散”在文本中出现。对暴力的指涉与批判并非只限于实体暴力，陷入精神的疯狂亦是体现现代社会中对暴力的反抗。直到二战期间，一向受英殖民政府严厉管制的嫖妓制度，被日本放任政策和强行压迫下，妓院与慰安妇场所在东南亚区域大量开设，年轻少女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成为军妓或慰安妇<sup>240</sup>。韦晕笔下的女性，与其是说出身于底层社会而正面与历史暴力下被牺牲的群体，但这些女性如何“离散”，也形成某些反抗权力和政治隐喻。因此，在长篇小说《海不变》中描写对拿督一家子因仗着洋女婿的关系移民到夏威夷，到“外国去当 [三等公民]”，被视为“飞到那里，吃到那里”的过境蝗虫视之，以此为贬义比喻。因此，主体在“遥望”马来西亚充满着复杂的心情，叙事主体难免受到“生根”的拉力而有所矛盾。

战争的记忆、历史与暴力不仅指的是天灾人祸，战乱，革命（虽然革命/战争可使暴力合法化），它包括现代化的进程与意识形态、国族、阶级、身体方面息息相关<sup>241</sup>”，加速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另外，《浅滩》除了一

<sup>239</sup> 韦晕《海不变》，页95、98、217。

<sup>240</sup> 巴素《马来亚华侨史》，页121-128；Caroline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the China and Pacific wars*, Bloomsbury Academia, 2016, p. 15; Kumagai Naoko, translated by David Nobel, *The Comfort Women: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 Tokyo: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2016, p. 50-51.

<sup>241</sup>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王德威从姜贵小说《今樗机传》补充有关暴力叙事观点，认为革命必须以暴力和破坏为手段，它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得

窥从二战到战后六十年代马来亚底层人民的生活。韦晕尝试从慰安妇的视角，混合第三人称第一人的叙事模式，再现慰安妇所面临的归属和创伤记忆。故事里的“玉英”，个性温顺，曾经是日军中的慰安妇；后来邂逅于“张驿”这个汉奸，顺利从日军手里拯救出来，便娶她为张太太。但因丈夫贪念的促长，长期受雇于日军中，他后来姻出轨另找其他女子消遣，常年把玉英囚禁在房里：

“阿玉给那疯女人吃时，玉英就比往日更疯狂，哭了又笑，笑了又哭<sup>242</sup>”、“可怜的女人，又疯起来了。大力挣扎着，像一只野兽那样狰狞笑着。（对阿玉说）：“他们会听你的话，把我放出来吗？阿玉，你真是梦想，他们这计谋是毒辣呀，这房子会一辈子把我困到死”。屋外那株黄槐树，给风吹着，把墙角打得劈劈啪啪在响。金黄色得残阳，像碎金一样，射进这十五世纪得欧洲古堡似的房子里来<sup>243</sup>”。

文中的玉英成为慰安妇在贩运的过程中在被弱势化（victimized）。她们长时间受制着情感创伤和性暴力之中难以言堪，在囚禁的日子中，只有管家“阿玉”的用心良苦，对她百般照顾似乎能换来一丝暖意。不料，玉英最后被逼疯死去的情景，这是韦晕对流离于在现代暴力下的诅咒。丈夫对于玉英的死有所愧疚，但无计可施。从这样一个女性角色的安排，以悲剧收场，突显女性与身体抗议。在福柯看来人受制于权力而将“疯癫”视为一种惩罚的意象，与某种罪行表相或死亡的错觉<sup>244</sup>。对此，从《海不变》中的慰安妇形象与《浅滩》中被暴力的狂虐而自杀的玉英有所不同，《海不变》的女主人翁嫁给拿督成为拿丁太太，从原来名为“阿萍”到“秀子”到“拿丁太太”。虽然开始被诱骗来到马来亚生根后的华侨女性，最后再跟随丈夫与孩子的选择，移民到美国的经历，“阿萍”一生经历过三次身份的转换，从中

---

被禁忌所驱逐的暴力，及其理性的对立特质，在此被颠覆。换句话说，暴力不再是理性的对立面，暴力反而是革命逻辑的一环。

<sup>242</sup> 韦晕《浅滩》，页160。

<sup>243</sup> 同上，页175-176。

<sup>244</sup>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版），页26-28。

国移民、日本军妓、到拿丁太太，经历马来亚与殖民文化的洗礼，文化认同的转变与屈服，足以看出女性在离散背景下的变化与多面性。

是故，强烈的离散意识始终贯彻在叙事笔下，一方面流露出韦晕在寻找马来西亚华人的放逐姿态。结合之前第二章论述离散群体的“族群化”与殖民话语论述，因为被“母国”马来亚英殖民政府的边缘化，才需以“离开”的途径从而获得“承认的政治”。自早期《旧地》到《无影族落户》中，人物虽然具有流亡和放逐的经验，这可视作韦晕建构“内心重建的一个相对无所不在的中心、处于边缘的位置，灵魂的避难所<sup>245</sup>”，体现“外在离散”与“内在离散”的纠结。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者，为此展现出马来西亚、香港华人的民族情绪与跨国文化政治的断层。

#### 第四节 小结

本节以《陨石原》、《荆棘丛》、《无影族落户》、《风过处，水无垠》及其短篇的文本分析，展现马华族群跨国离乡背井的离散主题。当中展现的不再是单纯的离散困苦或混沌，而是化悲苦为生活在城市经验之旅，进一步把视角放在资本化和中西文化交会的场域，解构和重构离散与认同的意义。韦晕从个人经验和文本经验对时空与文化措置感的掌握，结合碎片化与片段式的书写模式，体现母国和居留地之间的亲密与暧昧关系。

韦晕以多处东南亚华人城市书写构成的独特的城市经验，这也是他建构双重离散和文化寻根的重要印记。在衔接香港、台湾以及中国上海，展现出不同城市文化的性格。笔下的香港则是一种零碎、片段式、拼贴式的表现。虽然韦晕没有“旅台”、“留美”或因政治迫害而“流亡”，甚至有关女性与其慰安妇形象，其人物穿梭在香港、台湾、美国，更多是出自于文本经验和想像在不同“中转站”。从马来亚的人文和历史经验出发，韦晕意在重新一窥整体的文化中国和想像，以及在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再现，这与跨境的殖民与文化记忆环环相扣，挥之不去。

对此，韦晕这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的延伸，马来西亚的文化政治作为贯穿文本的主轴，它不断“召唤”着漂泊的主体，也迫使追溯到祖籍地

---

<sup>245</sup>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页489。

中国原乡，甚至扩展体现东南亚华人的动态流离性质。或许只有不断“游走”，才能是韦晕的归属，即便地方性的书写位置已改变、转换或背离是因素而扭曲，韦晕以离散华人的角度，体现了一种错中繁复的寻根与离散面貌。即便“跨城体验”和“文化错觉”下从中展现离散经历发现对另类文化认同探索。

## 第四章

### 旅行的意义：发掘东方人文风景

在跨国行迹中，韦晕除了对异文化的包容，他尝试以不同身份和姿态进行文化转换，超越离散具有流亡与文化失根的悲苦之情。如前文所述，韦晕的中国情结与马来（西）亚的在地经验，有着连带关系，加上香港记忆与城市的经验，他将叙述 / 个体在文化杂糅的话语中寻求辩证，使他从多处的文化身份探寻自我及文化认同的可能。

就此，本章在进入探讨韦晕“离散华人”的多面性想像，思考“旅行”意义的变换，这里将从两个方向进行考察：首先，韦晕有关海域、水乡等意象与离散华人的关系，以发现笔下离散地景与“东方”（从马来亚出发）地理空间的交涉；再来，韦晕从“离散华人”到“华裔游客”的身份切换，他把目光投射在东南亚、亚洲和欧洲的风景切换中，从行脚到消费性的旅行，韦晕在如何检视自己“华裔”的身份而起到对马来亚进行“再域化”，作为深化与拓展离散之意义。

#### 第一节 从“珠江”到“巴生河”

“因为在孩子时代，我已经爱上了海，爱上了河流，甚至连小溪我都爱上”

——《大江》<sup>246</sup>

以上散文〈大江〉是描写有关对海洋与河域的眷恋，是韦晕离开香港和中国后，移居到马来亚的重要文化印记。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小说之外，其散文和随笔集里多以描写有关河流、海水、海洋，与韦晕的离散行迹形影不离。王赓武在〈无帝国商人〉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一文中，考察了自明清以来的海上贸易，发现西方列强如何对东南亚进行殖民及其往来，体现早期中国侨居者到东南亚的贸易情况。王指出，明清政府颁布海禁前后有中国人私自出海，加上殖民者在东南亚开埠的须要，大批侨居者从中国沿海

<sup>246</sup> 韦晕〈大江〉，见《东海·西海》，（香港：维华出版社，1962年），页3。这部散文集收入韦晕自1954年以来所写的作品。

远赴到南洋。因此，海洋贸易与早期东南亚华人的谋生有着密切关系。经过历史的推演。在海外的华人人数也因应当地发展，逐渐蓬勃起来。有关海洋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两者是推动文化交流的关键<sup>247</sup>。虽说海洋文明是由殖民者以拓荒与扩张殖民主义的结果，但东南亚地理位置由海峡和海湾包围，这无非就构成作家笔下对海潮文学的写作主题<sup>248</sup>，衍生出其具老生常谈“有海洋的地方，就有离散和移民”之说。

### 1、海域想像：民族情怀、诗意表述

韦晕自从广东珠江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霹靂州与雪兰莪后，有关其海域、海滩、河流、沙滩、渔村、岛屿等意象，皆是他在书写中的重要素材。由于曾长期居住在霹靂州的“巴生河”和“邦咯岛渔村”一带，韦晕对于在地认同的切入，与他从广东到马来亚息息相关。这些意象的组织形成笔下的非物理性表征，结合不少的诗意表达形成他眼中的离散地景。此外，韦晕摒弃一味的血缘和回归原乡叙述，通过从海外华人与在地联系诠释海陆文明的交叉，为此展现海域书写的第一种的表现形式：海域、谋生与民族情结的象征。在回到〈乌鸦港上黄昏〉里，当中体现跨族群的互动虽是小说的亮点，但更多是阐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主人翁“伙金”从中国到南洋的越洋冒险经历：

“在唐山土匪穴中溜出来，在鬼子的刺刀下超生，又跟什么抗日军，什么洪门的窄门挤出来…想起自己从那黑油油的海里，冒着一个山，一个山似的白浪，从舢舨里伸出来，虽然喝了一肚子那印度洋的苦涩的咸水，自己还拼命地抓了一只浮浆”<sup>249</sup>。

通过“伙金”的叙述，体现出海外华人的离散意识。即便小说种使用夸张的手法交代主人翁如何独自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南洋，之后与当地族群交好。但本文认为，〈乌鸦港〉非只是代表五十年代爱国主义时期的作品<sup>250</sup>。

<sup>247</sup>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 87-111.

<sup>248</sup> Brian Bernards,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p. 14.

<sup>249</sup> 韦晕〈乌鸦港上黄昏〉，见《乌鸦港上黄昏》，页19。

<sup>250</sup> 许文荣《马华文学研究类型》，页69、257。

这是韦晕通过记录华人越洋与谋生经验将“原乡中国”与“南洋在地”搭建桥梁，体现在地与华人移民史的重要性。在西方旅行文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二十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游记。劳伦斯擅长将“船”的意象进行换喻手法，用制船的材料“橡木”代替船的制造材料。这说明劳伦斯对机械主义的反抗，认为以原始的材料比起钢铁制造的“船”更显焕发自然生命力<sup>251</sup>。而《乌鸦港》中的“浮浆”看似在大海的漂木，但更看作伙金求生意识的代表，当中更多是描绘华人克服险境来到南洋谋生的经历。另外，这与《在热带海洋上》描写有关漂泊的华人老移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除了构成普遍华人移民的路向即经验，故事中生动将“老番客”与年轻“新客”之间交换着不同年代的移民经验，两人一来一往在同艘客船中，穿梭南中国海上。在《卖平米的地方》则是把焦点投射在马来亚半岛的某个渔村，因为在封港期“这渔村再有几条渔船停止出海了，几个常常来往大城市的人都带来不好的消息。台湾的渔船开到了星洲水域来了，星加坡几个有钱人跟日本渔业组合作了，运到马来西亚一大帮新式渔网，捕鱼雷达器，还从北海道运来了千千万万各技术人员<sup>252</sup>”。当中道出华人与海域的谋生策略，再结合当地政治与商机会的情况，如海商渔贩与印尼苏门答腊叛军的勾结、走私黑货和树胶等非法交易，更显得的华人谋生的艰辛与勇气。

本文认为，这些有关海洋与移民的刻画中，韦晕从文学性的表述丰富早期华人移民史中的“无帝国商人”贸易的情况。即便故事的背景则体现海洋流贸易相关的精神写照，而海域对于当地华人来说，这也远远超越殖民地文化与原乡论述可以赋予。不难发现，韦晕对于海外华人形象的刻画，一方面突现具有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勇气、当中对南洋的表述，这里也贯穿民族之间的情结与论述。

有关这类书写形式，韦晕也参杂大量的土地意象（earthly metaphors），而通过这些“褐色语言”的融合如泥土、泥沙、贝壳、沙滩，连接海陆岛的风景，更是从中寻求一种宁静的情景。因此，海洋风光及感官刺激的再现，则是将海洋作为布景，而人物随着布景的变幻，体现人的本真与存在哲学

<sup>251</sup> 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英国旅行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268。

<sup>252</sup> 韦晕《卖平米的地方》，见《韦晕小说选》，（吉隆坡：大马福联会雪福建设会馆，1986年），42-49。

。在本文第三章所指出〈黑岩石上〉中，除了带出“人诗意栖居”的特色之外，另一个书写海域的特色，也在于融合了“感觉诗学”的成分在内：

“在这个半岛的另一个西海岸，这时分应该是从一阵阵金光，变成紫色晚霞的时分了。那海滩上的红茄藤树林，聚拢了夜归的乌鸦，咕呱咕呱的配着海汐声。那是一副有声的画，在这个海岸，却一点也看不到。它只有逐渐暗淡下来的白蒙蒙<sup>253</sup>”。

韦晕在后记中提到此篇小说受到美国小说家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影响而写，但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判断〈黑岩石上〉是《老人与海》的改写版。文本中此时此地的地域空间聚焦在海滩，共同地域为两个故事提供了相似的位置，折射出的一种“空间投影”<sup>254</sup>。〈黑岩石上〉则是从散文化写法带出海岸的自然与纯朴，空间与时间是定格在黄昏过后的海岸线，规定了叙事中的艺术审美性。故事中安排“我”与老人的对话，呈现交换心声的空间，展现老翁内心的“私密浩瀚感”<sup>255</sup>。当中在面临遥远的中国原乡，两人却通过褐色语言与其生态，建构老一辈的移民和新生代土生土长对于在地与原乡的辩证。这里就如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 1946-2016）有关“凝视”的说法，他指出的两种类型的凝视：浪漫凝视（romantic gaze）和集体凝视（collective gaze），尤其前一种凝视是“孤独且隐秘的，是与凝视对象的一种个人的半精神层面的关系”<sup>256</sup>，颇为贴切形容韦晕如何与“水乡”的渊缘。本文认为，韦晕对于海域书写除了具有谋生的指向，另一层面则可以从“浪漫凝视”角度诠释。这是韦晕主要是突出更具个人孤独感的象征（solitude and personal），相对于之前有关海域书写的叙事，如在〈大江〉、〈咆哮南中国海〉、〈海的驿站〉、〈星的陨落〉、〈百里沙堤〉、〈北望印度洋〉、对于马来亚一带海峡的书写则是贯穿一段殖民史的风貌之余，具有私密化和诗意的倾向。诚如亨利·格柏森（Henri Bergson, 1959-1941）曾言，“当我们无力重新活化已消逝的时间绵延，我们只能沿着抽象的时间序列思考它。

<sup>253</sup> 韦晕〈黑岩石上〉，见《野马随风》，页101。

<sup>254</sup> 徐岱《小说叙事学》，页292。

<sup>255</sup>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浩瀚感”（immensité）是个属于白日梦的心理学术范畴。白日梦无疑以各色各样的景象为资粮，但是透过一种自然的趋向，它能让冥想其庞然巨大（grandeur）。浩瀚感就在我们自身体内，它与一种存有的扩张状态紧密联系，这种状态总会被生活钳制。当我们孤独一人时，它又再度复甦。见 加斯东·巴舍拉 著，龚卓军、王静慧 译《空间诗学》，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页279-280。

<sup>256</sup> John Urry, *Tourist Gaze*, (London &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150.

这种抽象的时间已无任何厚度可言，而回忆无所迁动，势必将它加以空间化。唯有透过空间的阐述才得以发现”。因此，在扩大自我的孤独存在之际，笔墨中不免道出无形的历史暴力与苦难。韦晕在描写在海上漂泊的或是选择在特定岛国定居、旅居、寄居的船客，对于来回南洋的船和海洋的描写海外华人的漂泊定律。

对韦晕来说，中国已经是遥不可及，既不可能回去，但可以从深入在地的族群与民族书写里，消解一种愁绪。再如〈旧地〉中的杜邦先生眼中的“莱茵河”、有关历史记忆中的〈大江〉山川河流等风景，不仅只是借助景物寄托和消解自我的思乡之情，更是丰富海景作为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文化载体从海域书写所衍生出对母体文化的原生感情，无疑身为韦晕身为海外华人，也所产生强烈的远端民族想像。韦晕在凝视的过程中包含了东方视角对于西方人事物的眼光。这里不仅强调地景的差异性，也展现以东方与西方不断的对话。在《噢，那感喟桥！》中，叙述主人翁游历于意大利水乡的感悟，“萧平站在这条感喟桥磴上，望着那还没有昏暗的运河流水，潺潺地从桥下流过…这个东方肤色的青年人视线，偶然又停到浮在水面那些古旧建筑物的地基，如何给河水腐蚀得斑驳支离，半浮半沉似的，像跟着这运河的潮汐起伏”<sup>257</sup>。在〈噢！那感喟桥〉娓娓叙述“萧平”以“游客”身份踏上意大利威尼斯水乡，首先感到的是将当地风俗与马来西亚进行一番比较。萧平在听了当地的导览后，对于这个意大利城市保有偏见，坚持认为“踏上欧洲大陆的第一片土地…它跟东方的新兴国家的多姿多彩，显然有相当距离，只有那蔚蓝的海峡上的海水，保持着几千几万年以来的色素<sup>258</sup>”。

在〈大江〉叙述中，作者对他钟爱的霹雳河及山川，媲美于美国大溪地“红土山脉”与香港“大屿山”，当中不乏从美国战争电影素材作为联系：“荷里活拍的影片，名叫「大江东去」，是描写美国密士失比河畔的传奇故事。让我想起半岛的彭亨河来了。这缓慢的河流，没有密士失比河那种急湍，也没有易北河那种淹没尸体的丑恶，可是它有着另一种景象<sup>259</sup>”。〈大江〉中作者尝试以早期美国好莱坞电影《大江东去》有所呼应，尤其对战后

<sup>257</sup> 韦晕〈噢，那感喟桥！〉，见《韦晕小说选》，页162-173。

<sup>258</sup> 韦晕〈吊古战场〉，见《野马随风》，（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1975年），页71

<sup>259</sup> 韦晕〈大江〉，见《东海·西海》，页3。

萧条的彭亨河进行比较，激活了在场性的元素和力度，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复制和保存韦晕个人历史记忆，把这些经验“散文化”进入马来亚文化的构建之中。

由此看来，海洋及其有关的意象作为韦晕体现离散书写的空间诗学，其意象的“所指”和“能指”，接轨帝国主义历史经验与华人移民的历史现象，从审美的角度赋予韦晕在自然情景寻求本真的存在。韦晕以“海洋”书写为生存策略，无非体现华人与海洋文明的交织，将它转化成美学经验。这构成系列海景与人、自然的融为一体，从作家对客观对应物的诠释寻求心灵上的慰藉，海域构成生命或殖民的共同体是个重要的连接点。这强调和深化作家作为高度流动性及不稳定性，在文本中呈现出浪涛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出乘风破浪的生机之源同，海域也成为韦晕的“公共”转向“私人”的转向，形成一段诗意和知性的航行。

## 2、展现知性：自然 与田园风光

除了海域书写以及展现城市书写的另一面，韦晕曾以马来亚的“乡村”或“山芭”强化本土真实感。只不过笔下的“乡”，可指马来亚，也可以是香港或中国，在隔空文本间再现三地的文化措置。所谓的“地方”（place）相对空间来说，前者视为主体追求能让人渴望回到童年时，所体会到一种舒适瞬间，它尤其穿透弥漫在我们的日常中（permeates in our everyday life），为生活提供意义<sup>260</sup>。韦晕自称自幼是商人阶级出身，创作与人生经历<sup>261</sup>，确实有别于一般马华写实主义作家。他具备画家对色彩线条的敏锐，也从中展现出他的“漫游情怀”的洞察力。中国唐宋两代文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陶渊明、苏轼的生活虽漂泊坎坷，但年少时期漫游山川湖水，各展现出各自不同的诗风；而西方有波德莱尔，号称是“漫游者”诗人，作为穿梭在现代都市人群中扮演类似漫游者，观察者现代文明与其生活。从中西诗人的漫游经验，确实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泉源，在诗歌创作史中立下不朽之绩。段义孚认为，能被主体瞧见或发现的“标志”（visible

<sup>260</sup>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erspective on exper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137-145. Tim Cresswell, "Landscape and the obliteration of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edited by Kay Anderson, Mona Domosh, 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3, p. 269.

<sup>261</sup> 韦晕《东海·西海》，页115。

signs) 能增强了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同, 而伴随这个标记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于地标的声音、气味、社区环境的渲染式须要被人记住, 随着时间积累的而产生地方感<sup>262</sup>。对此, 连结之前韦晕对于“乡”的解构与指向的不同, 韦晕对于海陆等地景与马来亚州府的情怀实属特殊。他在中年时期踏便西马的遗迹, 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失融合风景绘画的美感——田园式的风景, 不乏折射出具有有一种诗意 (poetic approach) 的知性和历史反思。就如里尔克在散文《论山水》指出: “一切都是舞台, 在人没有登台用他身体上快乐或悲哀的动作充实这场面的时候, 它是空虚的<sup>263</sup>”。

人作为实体, 必须通过实践去建构、想像和认知“风景”的重要途径, 若缺乏植入感官和主观感受对于地方的, 必须抛开物质的思维思考“山水”, “风景”的概念或, 所谓的地方之爱就无法产生。就如里尔克补充, 而人有了孤独, 他才会感受到“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 无限地单独, 一切物与人地结合, 都退至共同深处, 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 人对于周围的事物看得是多么不清楚, 常常必得从远方来一个人告诉我们周围的真面目。所以人也必须把万物从自己的身边推开, 以使后来善于取用较为正确而平静的方式, 以稀少的亲切和敬畏的隔离来同它们接近<sup>264</sup>”。与其说西马的岛屿是韦晕赞美的风景, 而当地的田园景观是成为他在虚构小说背景时常出现, 至于散文中则是并非静物, 而是化静为动。在〈夜宿山城〉中的“我”的叙述中展现出贯彻当地农民的知性田园风景:

“经过紧急法令的一段时间, 为了一件突发的事件, 那小镇的居民给迁徙到附近的新村去住, 那些爱土地更甚爱自己生命的农人, 逼得群莺乱飞, 有些般到文冬岭去, 继续采农生活, 有些索性改行, 搬到城市谋生… 没有犬吠声, 也没有夜行车的马达发动声, 这山城的夜, 永远像给我喝了半盅醇酒, 微醺地, 听着山岚、落花……也朦胧地看到花和树影的飘摇<sup>265</sup>”。

<sup>262</sup>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Perspective on experiences*, p. 159.

<sup>263</sup> 里尔克 著, 冯至 译 <论山水>, 见《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北京: 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1994年), 页38。

<sup>264</sup> 里尔克 著, 冯至 译 <论山水>, 页40。

<sup>265</sup> 韦晕 <夜宿山城>, 见《东海·西海》, 页20-25。

另外，在〈田畴〉一文中，对于西马一带田畴的景象不仅赞许，看见“这儿是一片嫩绿的禾苗，那儿是劳动妇女，捲着湿了半截沙龙，把两条腿插入泥潭中插苗”，认为“贫血的，没有灵魂的美人——赵飞燕和埃及的克利奥比特利亚”胜不过“在这些给热带阳光灼黑了的面孔，劳动使腰肢变得粗大的女农人，虽然引不起诗人的歌颂或画家的摹绘，可是她们的灵魂，不只美丽，而且坚强，她们用粗糙的刀，拿着收获使用的[多]，拿着那些舂椎……她们点缀得更加美丽<sup>266</sup>”。韦晕将劳动妇女作为南洋特殊的人文风景画，视为自然与美德的表现，叙述者尝试从西方人的视角，在“他者”眼里的田畴，如看到大溪地和“南海天堂小岛”一般，有土著女性红唇、鬓边的白花、岛上的椰树，跨国的热带情调的将马来亚和太平洋群岛联系在一起。在描写马来亚芙蓉和怡保田畴的地景，描绘心中的女性形象与抵京的结合，文中引出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懒肚皮不应消耗两手劳动的收获”以此结束。韦晕从相关离散风景结合个人审美志趣，并且意识到这些自然风景并不只是被观看/欣赏的对象，而是有助于建构起文化身份的过程。例如在《荆棘丛》描写到“在南洋，谁都看重劳动，其实，劳动就是华人的优良传统，是一种美德<sup>267</sup>”，土地与自然，美化和歌颂华人的开埠心酸史。因此，这就如说明韦晕的田园风景是历史特定的产物（product of a particular history），也是作为他确立自我存在的重要场所（important site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established ways of being）<sup>268</sup>。再如体现在〈海的驿站〉“那个富有英雄气息的邦咯岛…从船上远远望到邦咯岛，树木葱茏地从海面上堆高起来的一座小丘，我心里想，这就是几百年前，英国的殖民主义者跟这半岛的土候，缔结邦咯条约的所在地？<sup>269</sup>”，渔村的历史地理。为跨海域的描绘更是作为历史文化的建构，反思在历史中被遗忘的区域精神和交往。米切尔在《

<sup>266</sup> 韦晕〈田畴〉，见《东海·西海》，页35-38。

<sup>267</sup> 韦晕《荆棘丛》，页53。

<sup>268</sup> Tim Cresswell, “Landscape and the obliteration of practice”, p. 277.

<sup>269</sup> 韦晕〈海的驿站〉，见《东海·西海》，页68-74。

风景与权力》，观看风景是一种流动的过程，并指出两种观看风景的方法，第一种是“沉思型”，第二种则是“阐释型”。若借米切尔的观点，韦晕有关的风光（海洋 / 岛屿）再现可以归为第二种，既把风光看成是从人的内在主体出发，而发明成一个隐喻或寓言，风光的内在意义是被韦晕阐释出来，即所谓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光。在《诗之岛》里写道：“我更愿意，在狭窄的街道上，碰到各式各样的民族脸谱，在这美丽的小岛上，一贯来有着 [民族展览会] 的称谓，因为她跟泰国只是一衣带水，跟印尼，跟缅甸，跟印度……都是咫尺比邻。还有从西欧来的豪华游艇，白种游客受了马哥波罗的夸张描写的诱惑……在他们心中，东方式是神秘的，刺激，美丽，圣洁和魔道的结合体”，以及“先驱者把宝岛的荆棘铲除，将丹戎武雅的污浊渔村建设成为美丽的海域场<sup>270</sup>”，对早期新马开埠者的敬畏，一览为“东方文明”的马来亚更添历史感与异国情怀。

韦晕曾任过各行各业的工作，这其中包括巴士车长。在他其中一篇小说《他爬过文冬岭》（或同名小说《岭上》），当中描写孤独少年离开彭亨山城来到巴士公司找工作，在“我”的观察下感慨这个少年的身世。就此，笔者推断韦晕从本身的经验把自己文本化，把彭亨山脉一带平原公路如淡马（temerloh）、鲁通马兰等等，但作者笔下的描绘是包含了人文历史、文化的生活地景的含义，是一种具有独特和鲜明性格的“地方”。收入在《狮城的传说》诗歌集中，新华诗人钟琪，也曾写过《过文东岭》：“我的心一阵颤栗——/在暮色沉沉的悬崖上/我不是惊惧下面那万仞的深谷/而那是跟踪着我的战车啊！”，衔接马来亚的自然之景及其历史文化，与韦晕的重“文东岭”产生不一样的表述，更多批判战事与煽动民族情绪；另一首和《卖菜的小姑娘》：“你问姑娘为什么那么健康/请你去问那肥沃的土地/你问姑娘为什么这样红润/请你去问那早晨的太阳/红东东的脸庞/羞答答的模样/她们是谁？/她们就是/金马伦原上/卖菜的小姑娘”，和韦晕《田畴》相接呼应的地方，赞颂土地之与劳动妇女的自然之美。

自文艺复兴以来，风光作为“怡神之物”，源自于拉丁文“ameonus”，这里指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愉快的地方，特指美丽

---

<sup>270</sup> 韦晕《诗之岛》，见《东海·西海》，页75-79。

的田园和花园<sup>271</sup>，就如米歇尔对“风景”的诠释，他认为主体对风景的启蒙、认知，到觉醒，都属于文化建构的过程，并非与生俱来，这当中涉及景观化、人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sup>272</sup>，而韦晕试图在作者、读者与故事之间，有意识的将写小说的过程插入相关的认知，在不同层次穿梭文本内外，展开作者、读者与故事之间，颠覆作者与读者的既定关系。就此，不以中国为离散的“起点”与“终点”，而是从一个马来亚作为连接点，似乎更能说明韦晕在后期创作对于马来亚的归属感，借由风景与地理书写他开启另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在第三章有关城市书写中，如何突现都市空间的杂糅之外，更是涉及人性的空虚与性格上的扭曲，才能发现马来西亚风景的内在价值（an experience itself），诚如韦晕所追求的，他是扮演着一个抽离者来观察，将纯朴的乡间才是作为抵触一切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在面临暴力创伤和离散之苦，唯有从自然和田园风景中解脱，这也是韦晕将马来亚比做为“东方后花园”的重要原因，对于西方旅行书写的“变义”，以一种内在离散姿态出现，对“土地”的关怀亦能成为韦晕在马来亚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 第二节 “旅行”意义的转换

借用詹姆斯·克里弗的话来说，韦晕的“旅行”是个包容性的术语，他是在自动自发的情况下离开家，在不同文本中展现与离散、流亡等文学形象，目的是冀望在不同的地方与经验交错下，进入对当地的一种认识、拓宽视野，来获取某种知识和感受旅行的体验（除了劳苦之外，旅行也可以是启迪人心、激动人心，愉悦的）<sup>273</sup>，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因此，“旅行”是离散者必然经历的过程，韦晕对于马来亚的认知，无不是通过不同“旅行”方式促成的。

<sup>271</sup>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张翔 译 《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67。

<sup>272</sup> W.J.T Mitchell eds., *Landscape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5.

<sup>273</sup> James Clifford, "Anthropology and/as Travel", in *Stitching Ethnography*, Volume 22, No. 2, 1996, p. 9-10.

## 1、反思西马殖民史与其风物

在离散到马来亚后，韦晕所要书写的系列旅行印记，不只是有利于建构本土书写模式，其中也推前到西马的殖民史的观察以及对地方风物的刻画，以尝试把这块土地视为一个有机体的“风景”。风景（landscape）虽然与欧洲帝国主义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从美学角度而言，它更意味着人们把对自然的视觉消费从使用价值、商业、审美的形式，一种因自然本身而对其进行的再现或者感知<sup>274</sup>。从韦晕对马来亚风景的刻画与观察，主要以“东海岸”和“西海岸”来区分两种不同层次的风光和体现。在英国殖民背景下的西马，由于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行业的开发，也成就了东西海岸与地理有着不同的地景塑造。韦晕长期居住在霹雳与关丹，更多是以通过旅行和走访的方式，在尝试抛下“异乡人”的眼光同时，为西马风景赋予个人感性的体验。比起在小说里所具有带着离散者的忧虑与朦胧感，散文中具有的抒情笔调里是更添对殖民文化的反思。例如，在〈咆哮的南中国海〉描写“东海岸”渔村，出现在距离关丹不远的“米昔牙”、“多落尖不律”、“彭亨河”，以及关丹的“甘孟市镇”；以至到西海岸的海浴圣地如“波德申”、“丁加奴”、“巴都依淡”（黑石滩），以及“槟榔屿”。这些由不同地段的地标串联起来的地景，意在勾勒出马来亚与英殖民历史与对当地文化的错中复杂：

“在晨光曦微中，你站在河岸上对着河流对岸的丹戎隆坡的渔船，一双一双的出海情景，就比你看一副密勒的风景画，更多一份诗意…马来亚创垦者之一的陆佑的锡矿东兴公司就在区内。东兴隆公司为了将锡矿晕倒吉隆坡，开辟了那条横贯半岛的东西公路”<sup>275</sup>。

“马来西亚有今日的繁荣，谁能忘记先驱者的功绩呢？一八八五年，英人来马来亚后，为了发展锡矿业和树胶业…马来亚在一八八五年，筑成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从太平到卫特港的四厘长的铁路<sup>276</sup>”。

<sup>274</sup> W.J.T 米切尔 编，杨丽、万信琼 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页289。

<sup>275</sup> 韦晕〈咆哮的南中国海〉，见《野马随风》，页12。

<sup>276</sup> 韦晕〈湖光山色〉，见《野马随风》，页30。

韦晕形容静静的关丹河如“米勒的风景画”，可见知性中具有对于田园和土地风情的钟爱，和对于风景线条美感的鉴赏，因此进一步马来亚是韦晕精神寄托的后花园。以上〈湖光·山色〉中描写位于太平山的“太平湖”，这里不仅由岛屿和市镇风情促成的诗意风景，将此抒情化、小说化的一面〈东海·西海〉的笔调，不仅有反战字眼，扣紧军旅故事，与马来亚的连结。文中提到的锡矿“东兴隆公司”，这里又把视野拉回到19世纪初华侨商人“陆佑”与“刘伯群”从中国南下马来亚半岛到槟榔岛（现在的槟城）开采锡矿的情景扩展到马来亚各州的政绩。

在当中对于华人与英殖民开垦的经验是受到韦晕的赞许和纪念的里程碑。这也说明植根在殖民背景的马来亚离散地景，韦晕并没有直接对殖民势力加以批判，而是通过针对早期到马来亚的殖民史，冀望将华人参与移民和开埠事业的“合法性”和认同。此外，这些记录也有一般在小说中控诉暴力的霸权的不平等之外，也缔造另一种与马华“反殖民”的声调。韦晕以借由在地方经验重构，通往逆向行驶的“去帝国的叙事”，而将殖民经验植入在“风景”的建构之中。

韦晕重返了英殖民主义，来西马历史绘制出有关“马来亚”的风景线，便反复以“关丹”、“丁加奴”和“彭亨”西马三个出发点，叙说着西方资本主义对马来亚半岛对华人市镇的开发。在不断重溯和通过对当地的观察，对史前史时期的开采橡胶、铁路和锡矿事业建构起工业时期的马来亚，颇有一番叙述。就如威北华，他在《马来散记》里记载，锡矿自19世纪以来是马来亚重要的经济来源，自1862年霹靂州拿律战争、1886—1873年雪兰莪内战、叶莱亚的吉隆坡攻防战役以来，为了使争夺锡矿的产权，吸引大量华侨前来垦荒，而锡矿业得以繁荣，记录许多有关开埠的历史遗迹。“近打河流域”是霹靂州主要的产锡区。霹靂州出产锡矿，而这条河流在韦晕看来，它犹如的中国“黄河”，这里贯穿了浓厚的“远端乡愁”情绪，认为锡矿是离散华侨的劳动结晶，并肯定他们的开荒垦业的事迹。此外，旧锡矿或渔场后经过历史的洗礼，时移事易，后来迎合旅游业和商业发展需要成为重点旅游区：

“黑石滩这个海岸虽然美丽，但多少有些跟夏威夷，或是关岛，或是菲律宾的碧瑶，或是苏门答腊的多巴湖，多少有着同类的美<sup>277</sup>”。

“离开这蛇岛的渡头三哩许，便是一间，由一个外国工程师夫妇经营的知知屋，这种汽车旅馆在欧美的海滨地区，极为盛行，但在东方还不十分普遍……一觉醒来，你会怀疑，昨夜你是在美亚美海滩，或是大溪地的椰林下，玩了半夜。是一个梦的再现，还是幻想的破灭<sup>278</sup>”。

韦晕对马来西亚“黑石滩”景区的商业和消费化不免感到吃惊。另外，在〈北望印度洋〉<sup>279</sup>中出现位于西海岸的槟榔屿与殖民历史的东印属公司、开启海峡贸易，把早期马来亚多元文化的“混杂性”提升到“人种博览会”的景观加以形容。其中以当地宗教建筑聚焦，如位于“华夸街”里的乔治教堂的堂皇、“阿齐街”的摩尔回教文化、“大门楼”兴都庙的笛声；到“乔治市”、“升旗山”、“极乐寺”、“太平山”、“黑风洞”；以及又饮食文化“槟城拉沙”和“羊肉沙爹”等等，进一步强化马来亚本土的多元与蓬勃性。由于韦晕从马来亚出发，而笔下将殖民史镶入在马来亚地景内，促成笔下入万花筒般的历史镜像。其中贯彻色、香、味，的感官体验，不乏充斥着中西文明交汇的文化载体，描绘了自早期海峡华人开采，到所谓今时今日文化变迁的马来亚文化面貌。

自身的行旅经验或离散，都必须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下呈现意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行旅者如何移动、安顿或重新定义他们的位置<sup>280</sup>。这也说明，韦晕身为从旅行者的角度体现出具有“闲逛者”的性质，将置身的马来亚的历史性的一面植根在“现代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一面。在地风景与跨境身体的移动，交杂离散意识、记忆和身体在场书写的结晶。因此，笔下的滨登山脉、劳勿、彭亨、金马仑、福隆港、波德申、怡保、芙蓉、新古毛、槟榔屿（今日的槟城）、邦咯岛等地标，都是可视为与作者融为一体的有机风景，贯穿着二战历史，从作者的凭吊怀古到审美意图的贯穿。另外，韦晕也擅长将与中国相关的人文遗址

<sup>277</sup> 韦晕〈百里沙缇〉，见《野马随风》，页15。

<sup>278</sup> 同上，页17-18。

<sup>279</sup> 韦晕〈北望印度洋〉，同上，页24-25。

<sup>280</sup> 季进主编《文学行旅与世界想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页2。

与地标，如“南岛敦煌”概念移植到马来西亚的语境，对应于马来西亚雪兰莪的“黑风洞”，把中国风景“马来亚化”。回到历史场域视察，风景作为文化权利，代表韦晕对于马来亚的文化情怀的在场性。

韦晕更是回到殖民时期的“马来亚”情有独钟，或许充斥着西方殖民的“异国情调”更能带出一种历史传承性，对于土地的执着更显得没有距离感。之前论及韦晕“乡村”与“城市书写”的地方感表述，对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认知，这或许因视角的改变，而影响韦晕如何“重观”西马地景与风物，当中打破了时限的“此时此地”地方风貌，形成由是历史、文化、怀古、政治、地缘、自然、多元文化交织贯穿而成的一段历史话语。如前文所述，香港与马来亚两者是不可获缺的叙事，存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两者是作为作者努力求同存异的书写空间。从这里可以发现韦晕作为热爱马来亚土地的小说家，其认同的面向是文化的，而非政治主体。因此，马来亚作为笔下的离散风景，在小说中强调离散华人与种族政治抗争的一面，反而在散文和随笔里的面貌，则是成为一种审美和抒情的机制。

## 2、游客的视角：怀古与异国情调

韦晕开始从“离散者”角度，通过“旅行”的变义，则进入成为“旅客”的身份。约翰·厄里在旅行理论中，通过在旅游中游客对景点的参访，制造了“凝视”（tourist gaze）辞藻形容观察旅客在旅行过程，如何通过具有主观性的选择观看和消费“风景”的能力。厄里认为，旅游中的消费（consumption）虽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但通过系列的活动可让旅客在特定的景点‘观察’或‘凝视’特定事物。例如码头、塔楼、旧建筑、艺术品、食物、乡村等等。这种凝视在于提升旅行的体验，惟其在培养个人的感知上<sup>281</sup>。厄里甚至有趣提到，通过“消费”，其实是可以买取个人‘时间’的道理和意义。因此，有关东方风景的阐述，尤其在《野马随风》散文集中相关的跨国水乡描写、人为或自然的山水景观，都离不开与当地历史挂钩。当中虽然着重描绘当地战争史和地标之间的关系，并且将此与新马历史和其地景做个联系和对比想像的“异国”或“东方”，抒情中

<sup>281</sup> John Urry,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31-132.

带有某种消费性质。

作品里从早期华人移民下南洋经历，一直到东南亚民族国家先后独立，到全球化意识的普及。值得注意的是，韦晕叙事从来不脱离无论是处身的所在地或在想像异邦中，始终不脱离从历史的眼光连接自身与异域文化的交往，促成他的怀古与历史记忆皆可视为韦晕建构旅行书写的部分。除了叙述17—19世纪的历史，有关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的变迁尽收眼帘，当中多数从东南亚历史的角度再出发，起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韦晕将东西文化的比较下展现南北泰国在史上，作为非殖民国的蓬勃多彩的历史面向：

“在拉马王朝前，先罗曾经是很多小王国的组合，局势很混乱，北方的清迈王国，南邦王国，甘烹碧王国，中部的洛武里王国、昌莱王国等纷纷有自己的领地…在这个国家的古都废墟中，使我记起在罗马废墟巡礼的心情，这东西方两个富有宗教文物的国家，都有不少相同之处…这泰北的水库，跟台湾的石门水一比，似乎渺小…这里的几匹马车，有点像香港的黄包车<sup>282</sup>”。

其中不时唐朝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种时移世易的情景。就如有学者指出：“记忆已经嵌入的景观，对于理解社会如何赋予过去的意义至关重要。这些景观所启发或支持的具体实践也同样重要，如战争仪式和游客到这些场所的仪式行为记忆<sup>283</sup>”。因此，韦晕体现不仅是简单的观光，而是自己作为华裔，立足在多元族群的文化身份观物和观史，远远超越离散或旅行所赋予的负面及悲观论述。不过，笔下的泰国与东南亚殖民国家的不同，它没经历殖民主义的侵入而至今保留皇室制度。不过韦晕一窥泰国城市被市场化的情形，如何失去已有的原始和纯朴文化，不免感慨：“合艾在泰国的大都市中，无论是市容，街道和商业，经济地位，作为马来西亚人，我反而对它的爱慕不是很深邃。我想，檳城、新山和马六甲等尔等城市，比合艾更吸引人<sup>284</sup>”。即便

<sup>282</sup> 韦晕 <清迈行>，见《野马随风》，页61-63。

<sup>283</sup> Brenda S.A., Yeoh, Hamzah Muzaini, *Contested Memoryscapes: The Politics of Second World War Commemoration in Singapo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9.

<sup>284</sup> 韦晕 <宋卡的黄昏>，见《野马随风》，页43。

马来西亚已独立建国，韦晕始终认为在地文化相比起他城市更具有多元蓬勃的历史文化：

“这样一来，除了土著的马来人外，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其他亚洲人纷纷移居到这个岛屿来。所在华夸街存着那很有名的建筑，那圣乔治教堂的美轮美奂，成了西方文化的标志。回教堂建筑是直接继承了摩尔的回教文化。这里到处可看见不同的民族，这十足体现了人种的展览”<sup>285</sup>。

他也从中叙述有关东印属公司到马来亚独立的槟榔屿，从开拓前的野树丛生到“成为东西方贸易商港”，以对在地的认知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人种展览会”聚集地。

此外，韦晕在73岁到访英国旅游，写下系列有关参访欧洲的记录如：〈奥地利的一夜〉、〈奥意的边界山道〉、〈冷翡翠的暮色〉、〈罗马，永恒的城！〉、〈废墟巡礼〉、〈夜巴黎〉中，不免对当地东欧和西欧历史文物人物颇感敬畏。其中在〈犀牛、木乃伊和蜡像〉以博物馆的陈列犹如“象征着一个古老帝国的空壳，徒使人空留回忆”，对古文明和现代的映照，对现代化社会带来讽刺。无论是欧洲的哪一个城市，韦晕在地的视角反观自身的中华文化背景，不免显得生硬牵强。意大利以水乡文化文明世界，这或许能与韦晕自己的马来亚霹靂州“巴生河”产生联想便堪与媲美，折射出对于马来亚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此观念已植根在他日常观物的行迹中：“我们在星马常看到的遮荫树是雨树和红豆树、凤凰木、黄槐等，因为地居热带，这些树木一年常绿，反而缺少一种花开花谢的情致”<sup>286</sup>；“我总觉得意大利人富有人情味，跟我们东方人比较合得来”<sup>287</sup>。

在脱离一般走马观花心态之余，这不免掉入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眼光放在“世界公民”的角度，似乎体现了个人的偏执，有别于早期50-60年代作品里，对于多元族群关怀的深沉与敏锐的洞见。例如，在《再见在北回归线》小说中主人翁王参在戏班担任伶工皇上、将军、及其系列的古代人物如吕洞宾、吕布的角色，则是：

<sup>285</sup> 韦晕〈北望印度洋〉，同上，页23-24。

<sup>286</sup> 韦晕〈赛纳河的诱惑〉，同上，页110。

<sup>287</sup> 韦晕〈河山多具英雄气〉，同上，页101。

“打鼓元把王参这个内地来客带回自己的海滨木屋去，教他怎样去跟自己到那些游客中心地，去扮演一些故人的故事，给那些游客看，增加他们对这个小岛的兴趣……这些粉墨登场的伶工，就是中国的几千年来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再现<sup>288</sup>”。

叙述者为了提高马来亚的杂糅性，从游客的视角包装离散华人的形象。角色扮演（role-playing）在这部小说的作用，体现华裔眼里的“异国异族”，以及在外国游客眼中的东方形象。通过此玩味的角色替换，彰显“戏中有戏”的层次感来博取游客们的喜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亚的传播和移植增添一份“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ness）的假设。扮演“貂禅”的女伶工阿珍在全程配合演出之余，她却以具有批判性的灌入自觉的抽离意识，向王参说道：

“谁不是一样涂白了脸，涂红了脸，或是涂黑了脸上场？谁不是一样伸直了双脚，当作一个伶工在舞台上下场？一个扮戏的下了场后，又有那一个人记起他曾扮演过什么角色？<sup>289</sup>”。

这其中带有深意，尤其带有有意识的进行“表演”和“再现”，从“表演者—自我—旅客”的三者重叠身份，何尝不是对这些跨文化现象的抽丝剖茧和理解“自我”身份的建构。再连接第二章提到有关民族志寓言的塑造，王灿和阿珍的角色扮演，涉及一种集体凝视的欢乐（collective gaze involve conviviality），在旅客心目中留下一场类似嘉年华会的视觉盛宴（in a sense of carnival）。当中无论是参与表演者或观看着，这系列的再现足以表明这就是一个所谓游客眼中“地方特色”的再现<sup>290</sup>。本文认为，韦晕处身不同地域的书写，对于自身文化的称谓有所不同。当身在偏离东南亚华人地区，可见主体从西方或欧洲角度，反观新加坡、马来亚、港台地域，反而不自觉便称为纯粹的“中国人”或是“东方人”视之，可见“文化杂糅”也好“异国情调”也罢，在韦晕笔下并非是一种绝对。

<sup>288</sup> 韦晕 <再见在北回归线>，见《春冰集》，页54。

<sup>289</sup> 同上，页57。

<sup>290</sup> John Urry, *Tourist Gaze*, p. 150.

### 3、华裔、大中华意识

之前所论及，韦晕在书写马来亚之际并非对“中国性”进行消解，而转向对“华人性”的族群认同，以及从“中华性”（华裔）来巩固自身作为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方法。韦晕早年以“去侨民”的立场而投入马华本土书写，经历马来西亚独立的事实，接受自身“公民身份”，但着并无妨碍他作为“公民”（政治）和“文化”（中华性）身份形成的正面冲突。对此，当中在文本里阐述的“东方”风景，这里并非是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里的形象，萨义德认为，东方论述是由欧洲人与西方殖民者发明的产物，其中具有充满神秘与异国情调。那么我们在重新看待“东方”在韦晕笔下的含义，更是代表了马华和华裔的文化身份。就此，韦晕曾在诸多小说刻画混血人形象，除了通向非主流的华人叙事视角也突出对于和想像“东方”的几种层次。首先，韦晕作为有经验式的“可信观者”身份（believable spectator），探究散布在东南亚岛屿和台湾及香港，建构岛屿美学，以多重的文化符号和意象重构与连接对“东方”风景的情结。他尝试将自己化身为游客视角，一窥和他相似的彭亨河或巴生河以及“东方威尼斯”曼谷的河域文化：

“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市区内有很多河渠在街道上交织着网子，所以，我们把它看成为东方威尼斯这种水乡情调，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sup>291</sup>”。

“我想，这条基浪支流，大约是两岸的居民把垃圾随便抛入运河里，就常常缠绕着来往电船的机件了。看情形，在这曼谷的小运河航行时，比不上在威尼斯运河上乘坐「贡多拉」那样诗情画意<sup>292</sup>”。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一种“朝圣”（pilgrim）活动，虽然古代的朝圣与当今消费的旅游性质与意义大不相近，但游客如古代朝圣的圣徒一般，过程中必定会参访神龛，并此而获得某种令人振奋的体验（some kind of

<sup>291</sup> 韦晕 <寺和桥>，见《野马随风》，页49。

<sup>292</sup> 韦晕 <湄南河上>，见《野马随风》，页55。

uplifting experience)<sup>293</sup>。对此，韦晕对于自身对彭亨州巴生河的热爱，到了东南亚以游客身份辈出，在这样的跨文化对比之下，韦晕不仅以观光旅客身份进行观察，也对跨国文化和风俗做出理性思考。

再来，在这种属于“他者”风景的是植根于个人经验当中，从年轻至成人的时空延续。与其说这是他对水乡的青睐，不如说他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去感受。在后来70年代时候他游历于欧洲多个城市，其中对意大利威尼斯水乡极为倾倒。他除了陆地风景做了描述，也对观光水船贡多拉（gondola）寄托了他对东方这个想像的文化国度基于赞美和想念：“回到下宿的旅馆，沉思了许久，脑海萦绕着 [贡多拉] 的舟子那种身型，多少明白我们这些异乡人都存在着一些尝试南欧风味的小划船心理<sup>294</sup>”。

这样的想念并不是回归到任何的故乡，从一个赋有异国情调的氛围思考他认识的东方是应该如此。贡多拉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代步工具。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在《傻子旅行记》*The Innocents Abroad* 游记里，大量描写有关威尼斯的贡多拉如何作为意大利的现代海上工具，推动贸易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对此，据前面所述，海洋书写及其意象，在韦晕作品扮演重要角色，从谋生到诗意建构，改写了旅行的意义；从冒险精神到观光消费的转变，以自身与直接现场实现自我的大中华意识：

“在咱们中国人的心目中，认为是水都的，大约是首先想到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其次是东南亚的泰国首都曼谷，以及中国长江三角的几个地方。这些都是运河水道纵横交错的地区。意大利那个城邦威尼斯以及热那亚都是最先跟亚洲国有商业来往的<sup>295</sup>”。

“望到了那辽阔的那不勒斯湾，远远望到了那碧绿的尼亚海海浪，使我们这些远离了自己很远的海国儿女，兴起了思念的念头…怪不得大家也跟着跳动起来，把这海看作马六甲或新加坡还那样亲切<sup>296</sup>”。

<sup>293</sup> John Urry, *Tourist Gaze*, p. 9-11.

<sup>294</sup> 韦晕 <威尼斯的前途>, 见《野马随风》, 页86。

<sup>295</sup> 韦晕 <水都漫步>, 见《野马随风》, 页83。

<sup>296</sup> 韦晕 <那不勒斯湾的夜景>, 见《野马随风》, 页99。

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东海岸、西海岸，甚至印度洋的意象与船只都是作为韦晕小说有关的海洋意象。本文发现，韦晕以东方华人的视角，站在欧洲土地“反观”在远端的马西来亚，其中不乏从意大利诗情画意的水乡与家乡的河川相比。威尼斯作为历史中被文学家作品出现的水乡意象。对此，韦晕从马来亚视角下映照的东南亚风景，意在超越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把历史转化为“纪念物化”（monumentalization），将集体记忆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表达，建构起跨文化的对话。

通过在异地感受的风情，将自己转化为“东南亚人”的视角，争取在文化上取得与他国“可比性”的一份子。结合第二章与第三章的论述，笔者主要以韦晕小说为例，发现其中更加以“离散华人”姿态出现，既有游离的能动性、去中心和拒绝回归母体的含义；反而在随笔和散文里呈现的主体性，更具有后现代式的包容和随性更换。换言之，随着不同地方特色的转移，中国性的诠释也会有所不同。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主体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协商（renegotiated and rearticulated, both inside or outside China）<sup>297</sup>。这也说明“中国性”的文化符号是多意的。他既能从站在西方国家的视角，反观自我为“咱们中国人”，也接近杜唯明“文化中国”的说法。此外，韦晕在英国旅游曾被视为日本人的经历，引发他对自己的认同然起思考：

“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自然这种情形是极自然的，因为日本人到外地旅游，在威尼斯，在士巴那街就看见过一家写着日文招牌的[观光案内所]。英国人把我们看成为日本人就没那么奇怪了<sup>298</sup>”。

耐人寻味的是，此文带出资本和消费社会的行为，把肤色/种族同质化是西方人长久以来自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病，而韦晕以“华裔”证明自己的是“文化中国”的一份子，但不一味回流到中国的母体之中。因此，综观韦晕的旅行书写，文本呈现的并非一味的沉溺在旅游和观光客的消费行为，而是具有理性和知性批评的尺度存在。

<sup>297</sup>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5.

<sup>298</sup> 韦晕 <伦敦的绿灯区>，见《野马随风》，页118。

### 第三节 小结

韦晕在旅行途中的遭遇，不只是关注外地或本土的花花草草，他始终扮演者观察者的身份，从自身文化身份的“移植”和“漂流”中，进行深层的思考。笔下的彭亨河作为韦晕笔下的马来西亚“水乡”文化代表，它连接槟榔屿，到怡保芙蓉镇，直到“远跨”意大利的威尼斯水乡，体现一种跨海域的书写。与水有关的意象，从叙述“离散之苦”经历了淡化到终结，使这个意象不再受制于看似属于或漂泊的象征。韦晕以欧洲最具著名的水乡——意大利威尼斯，作为他从“异地”反观“家乡”的依据。

此外，韦晕并没有反或体现出（内在）离散意义的终止。通过离散固有的“旅行”性质从漂泊者到“游客”视角的身体流动，他对于“马来亚”印象在从小说到散文文类也有不同的印象。韦晕除了对马来亚这个土地的热爱，在他的行脚中不难发觉的亚洲布景与异国情调的结合，来发挥“文化寻根”的终极，致力于建构一种“大中华意识”。离散对于韦晕来说，或许没有结束，在认同和扎根于马来亚之余，韦晕与华人性、在地性与亚洲性的关系，是抱有深沉的人文关怀，以及将自身超越民族主义的态度，审查自我。无论是作为旅人或是对于水乡情怀的眷恋，当中贯穿的历史课题和叙事手法，始终也离不开东南亚和亚洲的视域，塑造一种属于东南亚的想像（the *imagining of southeast asia*）。

“在东南亚，我到过的地方中，看到每个国家的华裔，都对现政府抱着服从的美德去适应一切。过去，在军人执政的时代，即使有什么事件突发，那些华裔公民，大多站稳自己的岗位…他们没有激动，仓皇的神态，颇使我觉得世界上有太阳的地方，华裔公民就能生存下去<sup>299</sup>”。

这是他透过不同的身份转换以后，以华裔的一份子抱着乐观憧憬来面对自己的身份。因此，纵观以上韦晕在旅行“意义”上的改变，他不仅转换了观看风景的视角，也突现他本身晚年对马来西亚这个家乡，有了不同的体会。

---

<sup>299</sup> 韦晕 <寺和桥>，见《野马随风》，页51。

## 第五章

### 结论

韦晕身为一位劫后重生的南来文人，虽然未曾参加任何的文艺运动，如19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但这场文艺论争所衍伸出有关建构“本土性”的论点，可以提供我们重思南来作家对于的离散/本土书写的贡献，以及对本土认同的向度，做出考查。作为马华文坛的“独行者”，他从“离散者”到“游客”身份的转换、潜入历史语境、跨文化与族群场域观察，甚至对离散风景的诠释，都致力于思考马来亚殖民文化，及以来文化政治的课题，构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在跨界过程，韦晕对中国和香港的文化想像、记忆的延伸与再生，及其对于西方文化的在地化与转化，是建构离散书写的重要基石。这样看来，离散作为韦晕一以贯之又丰富多变的主题，并非只单纯出自于对故国的黍离之思，而是出自于本土性的交流与互动，体现离散和本土之间一体两面。作为早期第一代马华写作人，他并不屈服于单一的本土观来获得安身立命。纵使韦晕在亚洲觉醒到横跨全球化的语境下，“马来亚”始终是韦晕构想离散的“起点”，始终以不同叙事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以达到一种跨界寻根与自我认同反思的层面。

本文二章侧重勾勒韦晕的“在地离散叙事”的面貌。有学者认为韦晕“卸下”侨民意识的包袱，转向侧重马来亚半岛的本土书写。笔者发现在诸多的马来亚本土的文化载体、多元民族及其的刻画，是依据当时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导致在书写本土之余，构造了一种在地的离散叙事。这个在地的离散叙事里，它包含了对殖民主义、阶级和种族的问题，其中有关“异族形象”的刻画，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窥视“他者”。韦晕并未对“反殖民”进行强烈的批判，反而对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文化政治，以寓言、象征、讽喻、乌托邦式等，体现一种在地离散及格格不入的情怀，对马来西亚政治氛围进行些许的“调侃”，并把视角转移到底层人民，体现了移民及其后代所在体制下生存的面貌。韦晕承认殖民文化和风气的固化，新村的刻画正是在殖民主义的催促下，扩散到营造境内离散的部分，便以“在家的异客”来观察其中。

第三章主要是将“本土性”延伸到与香港和中国的文化场域，展开对韦晕作为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多重辩证。虽然早年写下侨民包袱，但对“第一个家乡”的情感上依然荡存。如前文里指出，香港和中国的记忆，是使韦晕“在地性”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和丰富，尤其对于书写都市印记和跨国寻根的层面是极为重要。加上通过写实主义以外的美学，如意识流的使用，以及对于西方文本经典人物的改造，有拓展和深化离散华人的印记。此外，韦晕不时通过文化分身（海外孤儿、变相移民、流亡海外的政治逃犯）来探问自己的身份，将“离散”的性质扩展，确立了离散华人复杂的心理表现。他自称以“华裔”身份辈出，并且在时空的断裂与暧昧下体现的离散。但在这过程并不落入“失语”的状态，而是从不同文化场域的印记，持有某种回归到文化马来亚为精神家园。

例如，在第四章的论述里，我们能从韦晕笔下所建构的离散风景，能一窥他不时回到马来（西）亚的文化场域反思自我。他在散文《雨·雾·山风》里也指出，“我总觉得台湾岛中部与玉山山脉与中国大陆是相连的…两个大小不同的陆地和海底是一脉相通的<sup>300</sup>”，以及韦晕常以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为接触邻区，印证了海域想像的去疆界化，以塑造跨殖民和跨民族的文化交界点，作为抚慰离散者心态和文化寻根的依据。在严格意义上来看，韦晕这种的“大中华意识”是以观光客的身份看待。他将自己的处在位置来呈现一个“再域化”的马来亚文化图景。

纵观韦晕展现的离散叙事模式，他借由身体的跨国“离散”属性（作者经验）与笔下的“再移民”（文本经验）的交叉，企图超越离散的悲苦，与其相关的流亡、放逐或漂泊的交叉，成为了整体创作姿态。笔下人物虽受到和经历政治迫害而流，以及经历再离散的两难与重重波折，作者本身则是从离散者属性扎根马来亚本土，展现其中离散模式，从在地抽离自我，将“原乡论”体现得更具备弹性。对此，与其说韦晕在认同层面的解构与建构是个渐进式的过程，大可认为他在叙述一种属于“离散”的“马来亚文化”。

有鉴与此，本文尝试以“文化马来亚”（Cultural Malaya）作为初步总结，来概括他的离散叙事模式。有如前文所述，他其对本土性的建构与意义非铁板一块，而是充分对“马来亚”做出历史与文化溯源的中心关怀。首

---

<sup>300</sup> 韦晕 <雨·雾·山风>，见《野马随风》，页1。

先，必须澄清的是，韦晕的“文化马来亚”和历史中“马来亚两邦计划”，两者大不相同，前者是属于指向文学和文化概念，具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一种表述，后者针对的是英殖民地政府制订的具体政策。当然要论述“文化马来亚”的实质内涵，我们回到韦晕作品内的特征与主题，和相关的历史叙述。笔者采纳“文化马来亚”而非“文化马来西亚”，主要原因在于韦晕的创作时间和文本时间内的“历史因素”。本文考据韦晕自50年代以来创作的作品开始，（1954年写下《乌鸦港上黄昏》1956年出版第一部同名小说集），其创作时间横跨马来西亚独立“前”与“后”（如《荆棘丛》、《陨石原》）。在文本时间的层面，韦晕不仅只有描写新马独立前后的历史与政治（选举）事件（例如：种族政治的再现（写于1958年《旧地》，以1950年代“玛利亚种族暴动”为线索）、1948年的紧急法令，新村书写，以及有关民族和政治寓言等表述），他也在散文，如：〈海的驿站〉、〈诗之岛〉、〈咆哮的南中国海〉、〈百里沙缇〉等等，记录不少有关马来亚在开埠时期，把时序拉回更早有关19世纪初英殖民登陆的历史与殖民文化的遗留。对此，他描写这些并非是一味的批判或反殖民主义，而是尝试建构和通向多元民族和种族认同的憧憬。所以，采用“文化马来亚”更能展现韦晕整体的家园关怀。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笔者对韦晕“文化马来亚”的雏形，这其中与温瑞安发起的“文化中国”，当中或许有些许内在联系，以折射出他们对“中性”的诠释。韦晕和温瑞安属于两个不同代的“马华作家”，以韦晕来说，他对于自己的祖籍地、出生地和移居地——香港、中国和马来亚（历史记忆/文化符号）的记录，是镶入在“本土书写”的视阈里：即在马来亚本土书写里展现“中国元素”，也“香港本土”召唤“马来（西）亚”的记忆，来阐述在不同“异地”里的“远端乡愁”，致力于表述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类似于杜唯明的“文化中国”理念）。不过，这里也就涉及其俩人“旅行”的方式和性质的不同。韦晕是从香港，中国南下的离散作家，温瑞安本身在70年代因“时政”原故无法到中国念书，而选择前往台湾的侨生，并且非常重视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sup>301</sup>。所以，他所展现的“中国性”，是充斥着一种“侠义精神”。他崇拜武侠小说，并且有习武的爱好，其中也就强化他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之后温瑞安与友人创办“神州诗社”和《青光年中

<sup>301</sup> 张宏敏 <“文化中国”概念溯源>，见《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 第3期，页57。

国杂志》、《坦荡神州》等文学刊物，以及在文学作品出现大量的中国意象，以表示对于中国文化强烈的追求和认同。这可视作在“海外”复兴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宗旨。相较于韦晕的“温和”大中华意识，温瑞安更是以改革式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传承工作。或许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出生和作为海外华人的他，感受到的文化乡愁，与马来西亚“在地政治”的原故，他的认同会比韦晕更为浓烈。所以，这里也就体现两代文人对于“中国性”接受与“文化内化”的差异。韦晕更多是因出生地和生长环境的关系，中国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以自然而然的态度去接受和认同的。

此外，本文使用“文化马来亚”而非“马来亚文化”，认为所谓“马来亚文化”的发生和建构，是由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时间和地理空间内所塑造和决定的文化现象，当中也包含有关在地社会、族群、阶级、政治各个层面的。“文化马来亚”指的是韦晕将“马来亚”视作一个能书写、解构和再建构的地理空间和文学想像。例如，韦晕将“马来亚”的思考纳入“在场”和“非在场”的视阈里，在书写中国的同时，有对马来亚殖民史的参照，而在书写马来亚风物之余，也涉及有关对原乡的想像。就如司徒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文化的离散化”（cultural diaspora-ization）说法，本义是将“在地文化”进行重组、剪辑和拼接，来印应不同在地文化的特色<sup>302</sup>，来寻求的自我和文化认同。

因此，“文化马来亚”展现的是离散的“马来亚文化”，既是一种非固化，而又能“再域化”的表述空间。此外，它不是单指马来性或种族排他性的属性。对此，以此作为模式可体现韦晕作品的离散主题或意识的旅行与变义，作为消解文化霸权的策略，从对历史的马来亚、殖民时期的马来亚的崇敬，将离散书写视为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dynamics）流通和连接中国、香港和马来亚三地的主要文化，相互呼应（echoed）和可协商（negotiable）的关系，映出韦晕整体叙事的主体性。

美中不足的是，在深入观察二战以来殖民主义带来的诟病，针对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政治社会实况，韦晕没有多加对照或有笔墨进行更多的描述，如1969年发生的5·13事件、马来亚共产党的书写等等，这些在文本中是缺席

---

<sup>302</sup> Stuart Hall, “New Ethnicities”,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448.

的。至于有关跨界书写的部分，香港文化记忆的记录颇有些许刻板印象（人物崇洋媚外，不中不西的文化代表），而对于香港本土文化的观察，主要凭感官的冲击与体验进行描绘，并无深入洞悉更深层的文化政治。这也是笔者为何偏向使用“文化马来亚”，而非“文化马来西亚”的考量所在。不过，韦晕的写作向度，可说是超越与他同年代的新马本土作家。他打破一般五十年代的马华文学以表达革命志愿与民族情感为主的基调，而强调了跨国体验与个人思考的重要性，在成为“当地人”与“局外人”之间，保持“精神流散”状态审视其文化错位和文化震荡，这也有助于避免过于迷信于“本土”，或将它简单化或片面化来去解读。

早期离散华人持有对原乡中国的召唤，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中，史书美承认“离散作为历史”，以批判“离散为价值”。纵观韦晕作品的整体呈现，他并不那么直接去表现后者的这个说法。即便“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是当今成为显学，但聚焦在韦晕笔下的族群刻画（也包括作家本身），尤其底层华族/非华族的社会面貌与人物刻画，他们是生活在殖民主义、马来西亚新兴政权体制之下，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所以这与史书美所论述的“定居殖民者”一类，是有所出入的地方。因此，从韦晕所建构的离散书写的体系来看，他更是一种介于“离散”和“在地”的辩证表现形式。韦晕在双边文化保持着“局外人”的姿态协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坐标以“马来亚”为起点。然而，本文以韦晕为单个研究对象，“文化马来亚”的论述，或许也未能等同于其他早期南来作家的离散书写，这也是值得未来待续的研究课题。

附录：本文主要分析的作品索引（ 短篇小说）

序号	篇名	作品集	出版日期
1	〈乌鸦港上黄昏〉	《乌鸦港上黄昏》	1956
2	〈在热带海洋上〉	《乌鸦港上黄昏》	1956
3	〈印度洋的守候〉	《乌鸦港上黄昏》	1956
4	〈使徒行传外记〉	《乌鸦港上黄昏》	1956
5	〈栖迟〉	《乌鸦港上黄昏》	1956
6	〈白区传来的消息〉	《都门抄》	1958
7	〈都门抄〉	《都门抄》	1958
8	〈冷门〉	《都门抄》	1958
9	〈沉香宫〉	《都门抄》	1958
10	〈旧地〉	《旧地》	1959
11	〈暮紫〉	《旧地》	1959
12	〈水墙〉	《春冰集》	1971
13	〈春汛〉	《春冰集》	1971
14	〈再见北回归线〉	《春冰集》	1971
15	〈他乡〉	《集泊站》	1986
16	〈秋情〉	《集泊站》	1986
17	〈噢，那感喟桥！〉	《韦晕小说选》	1986
18	〈风过处，水无垠〉	《日安，库斯科》	1991
19	〈让位〉	《日安，库斯科》	1991
20	〈无影族落户〉	《日安，库斯科》	1991
21	〈桃源行〉	《流霞》	1998
22	〈浪涛〉	《流霞》	1998
23	〈流霞〉	《流霞》	1998

(中篇小说)

序号	作品	出版日期
1	《荆棘丛》	1961
2	《陨石原》	1981

(长篇小说)

序号	作品	出版日期
1	《浅滩》	1960
2	《海不变》	1997

(散文 / 游记)

序号	篇名	作品集	出版日期
1	〈夜宿山城〉	《东海·西海》	1962
2	〈大江〉	《东海·西海》	1962
3	〈太平小品〉	《东海·西海》	1962
4	〈鸦背夕阳红〉	《东海·西海》	1962
5	〈灰鸦〉	《东海·西海》	1962
6	〈星的陨落〉	《东海·西海》	1962
7	〈田畴〉	《东海·西海》	1962
8	〈诗之岛〉	《东海·西海》	1962
7	〈黑岩石上〉	《野马随风》	1975
8	〈吊古战场〉	《野马随风》	1975
9	〈咆哮的南中国海〉	《野马随风》	1975
10	〈湖光·山色〉	《野马随风》	1975
11	〈百里沙缙〉	《野马随风》	1975
12	〈北望印度洋〉	《野马随风》	1975

续（散文 / 游记）

13	〈宋卡的黄昏〉	《野马随风》	1975
14	〈清迈行〉	《野马随风》	1975
15	〈莱茵河与多瑙河〉	《野马随风》	1975
16	〈赛纳河的诱惑〉	《野马随风》	1975
17	〈河山多具英雄〉	《野马随风》	1975
18	〈水都漫步〉	《野马随风》	1975
19	〈寺和桥〉	《野马随风》	1975
20	〈雨伞〉	《余尘集》	1998
21	〈浮叶〉	《余尘集》	1998
22	〈记相思〉	《余尘集》	1998

## 参考文献

### 中文资料

#### 韦晕作品集

##### （小说集）

- 韦晕《乌鸦港上黄昏》，（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6）。
- 《都门抄》，（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8）。
- 《旧地》，（香港：东亚书局，1959）。
- 《春冰集》，（新加坡：新社出版，1971）。
- 《韦晕小说选》，（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1986）。
- 《寄泊站》，（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印务，1986）。
- 《日安，库斯科》，（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
- 《流霞》，（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

##### （中篇）

- 《荆棘丛》，（香港：上海书局，1961）。
- 《陨石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81）。

##### （长篇）

- 《浅滩》，（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
- 《海不变》，（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7）。

##### （散文集）

- 《东海·西海》，（香港：维华出版社，1962）。
- 《野马随风》，（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协会，1975）。
- 《馀尘集》，（吉隆坡：野草出版社，1998）。

（文艺副刊）

韦晕〈今宵〉，见《新社文艺》，（星洲：教育出版社，1967年）。

——〈日暮·荒原〉，谢克 主编《新生代》文艺杂志，1969年11月，第105-156期。

——〈说是拥抱黄昏〉，见 谢克 主编《新生代》，1968年11月，第53-104期。

——〈身后文章和有名的卡夫卡〉，见 谢克 主编《新生代》文艺杂志，1969年11月。

——〈存在主义文学和卡缪〉，见 谢克 主编《新生代》，1968年11月。

——〈从现代散文谈起〉，见《写作人》集刊，第16期，（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1987年7月。

## 专著

阿里夫·德里克 著，李冠南、董一格 译《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安敏成 著，姜涛 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安东尼·纪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社会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田禾 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巴素 著，刘前度 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社，1950）。

蔡晓玲 主编《风过处，水无垠：韦晕小说集》，（台北：酿出版，2012）。

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

陈清侨《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陈雪风《墨笔丹心》，（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0）。

陈衍德《东亚海洋文明的历史演绎：华人移民·海域经济·文化重构》，（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

-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 戴小华，尤绰韬主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8）。
- 段义浮著，潘桂成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
- 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吉隆坡：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1981）。
- 方桂香《另一种解读：方桂香文学评论集》，（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2）。
- 方修《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烘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
-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 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 主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侯如绮《双乡之间：台湾外省小说家的离散与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14）。
- 加斯东·巴舍拉 著，龚卓军、王静慧 译：《空间诗学》，（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杰拉德·德兰迪、恩忻·伊欣 主编，李霞、李恭忠 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李过 主编，《新年的悲剧》，（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
-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
- 李廷辉 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篇〉、〈第八集：史料篇〉，（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

- 李有成《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3）。
- 李有成、张锦忠 主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成出版社，2010）。
- 雷内·韦勒克 著，刘象愚 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
- 梁秉均 主编《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联书店，1993）。
- 廖炳惠 编著《关键词200》，（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里尔克 著，冯至 译〈论山水〉，见《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4）。
-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 1927—1948》，（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
- 林延辉，宋婉莹著《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华社研究中心，2000）。
- 刘禾 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
- 罗永生《殖民无间道》，（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 M.H 艾布拉姆斯 著，吴松江 等译《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马夫之《新马作家论》，（吉隆坡：怀艺出版社，1992）。
- 《作家作品研究：评论集》，（吉隆坡：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
- 马仑《马华文学之窗》，（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7）。
- 《马华写作人剪影》，（柔佛：泰来出版社，1979）。
-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编《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台北：新锐文化，2012）。
-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潘毅、余丽文主编《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萨义德 著，李琨 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单德兴 译《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孙和声，王国璋 主编《风云五十年：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吉隆坡：燧人氏事业出版社，2007）。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

王锦发，陈和锦主编《云南园最后的鸟啼：南洋文艺 1994 散文年选》，（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5）。

W. J. T 米切尔 编，杨丽、万信琼 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湾：联经出版社，2017）。

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

王赓武《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温任平《马华文学板块观察》，（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许文荣《马华文学类型研究》，（台北：里仁出版社，2014）。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星洲：星洲世界书局，1961）。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杨松年《马华文学座谈会论文》，（吉隆坡：马大中文系出版，1987）。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詹明信 著，唐小兵译《后现代社会与文化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英国旅行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八打灵再也：友人出版社，2011）

。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17）。

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社，2002）。

赵一凡、张种载、李德恩 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郑文辉《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1819—1965》，（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7）。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朱耀伟《香港研究作为方法》，（香港：中华书局，2016）。

## 学术论文

陈荣强〈华语语系研究：海外华人与离散华人研究之反思〉，见《中国现代文学》，2012年，第22期。

陈鹏翔〈论韦晕的中长篇小说〉，见《华文文学》，2001年，第4期。

廖建裕〈现当代的中华移民及其后裔：归根、生根、失根与无根〉，见《亚洲文化》期刊，2015年，第39期。

贺淑芳《〈蕉风〉创刊初期（1955—1960）文学观递变》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7年 6月。

黄万华〈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见《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潘钥〈浅谈印度尼西亚四大风物传说的文化内涵〉，见《东南亚南亚研究》期刊，2015年，第2期。

苏晖、蔡晓玲〈论韦晕小说的回忆叙述〉，见《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像：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见《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

王振科〈艺术地表现生命本能——评《韦晕小说选》〉，见《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1992年，第20期。

生安峰〈后殖民性、全球化和文学的表述：霍米·巴巴访谈录〉，见《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杨林宜《论马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轨迹（1965—1989）》硕士学位论文，（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2014年。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张宏敏〈“文化中国”概念溯源〉，见《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张建英〈一样风情两种思考——沈从文《边城》与韦晕《春汛》的比较解读〉，见《海南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张锦忠〈文化回归、离散台湾与旅行跨国性：在台马华文学的案例〉，见《中外文学》，2004年，第33期。

## 报章报道

区如柏《作家须有使命感——韦晕》，见《联合早报》，1987年5月28日。

韦晕《寻求新突破的老作家》，见《联合晚报》，1987年5月17日。

## 访谈报道

霍米·巴巴 演讲，马楠、唐晓琳、刘萧、张静 等译，《论离散艺术：  
关于意义措置的思考》，2014，（演讲录）。

## 文学刊物

温瑞安 主编《青年中国杂志：青年中国》，1979年，第1期。

——《青年中国杂志：文化中国》，1979年，第3期。

## 访谈录音

‘Interview with Seah Kok Chua’（余克泉先生 @ 谢克），28 October 2003,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002761/95 (Reel No. 52),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 网络资料

刘小枫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https://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archive2/DACHS\\_Leiden//archive/leiden/poetry/20040712/white-collar.net/01-author/g/01-gao\\_xingjian/029.htm](https://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archive2/DACHS_Leiden//archive/leiden/poetry/20040712/white-collar.net/01-author/g/01-gao_xingjian/029.htm)

## 英文资料

### Books

Anderson, Benedict, *The Spectres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

Anderson, Kay, Domosh, Mona, Pile, Steve and Nigel Thrift eds. ,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3.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1.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f the Geography on Anger*,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ele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Bernards, Brian,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Brazier, Jana, Evans and Mannur, Anita, eds.,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Writing Diasporas: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lifford, James., and Marcus George E.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Daus, Ronald, *Portuguese Euras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 Eagleton, Terry, Jameson, Fredric and Said, Edward, W.,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eane, Seamus,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 Groppe, Alison M.,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Amherst &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3.
- Hooper, Glenn and Youngs, Tim eds., *Perspectives on travel writing*, USA: Ashgate, 2004.
- Hughes, Tom Eames, *Tangled Worlds: The Story of Maria Hertog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0.
- Kenley, David, L.,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Lehan, D. Richard, *Literary Modernism and Beyond: The Extended Vision and The Realms of Text*, US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Lionnet, Françoise, Shih, Shu-mei,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ukas, George,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lated by Hannah and Stanle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 Mills, Lennox A., *Malay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Morley, David and Chen, Kuan-Hsing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Myrna, Braga-Blake, Ann, Ebert-Oehlers, Alexius A Pereira eds, *Singapore Eurasians: Memories, Hopes and Dream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7.
- Norma, Caroline,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the China and Pacific wars*, Bloomsbury Academia, 2016.
- Oong, Hak Ching,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19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Bangi: Univeris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0.
- Rutherford, Jonathan eds.,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 Shih, Shu-mei, Tsai, Chien-hsin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Smith, Anthony,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 Suryadinata, Leo., (e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ast and We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rn Asian Studies, 2000.
- Syed, Muhd Khairudin Aljunied, *Colonialism, Violence and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ria Hertogh Controversy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Tal, Kalí,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an, Chee-Beng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Tsu, Jing and Wang, David Der-wei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 Brill, 2010.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Landscapes of Fe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1979.
- Urry, John,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Vincent B. Leitch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 Wachowiak, Helmut, eds., *Tourism and Borders: Contemporary Issues,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ldershot: Ashgate, 2006.
-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W.J.T, Mitchell eds., *Landscape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Yeoh, Brenda S.A., Muzaini, Hamzah, *Contested Memoriscapes: The Politics of  
Second World War Commemoration in Singapo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Journal Articles**

Clifford, James, "Anthropology and/as Travel", in *Stiching Ethnofoor*, Volume  
22, No. 2, 1996.

——,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Further Inflections: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the Future*, Volume 9, No. 3, 1994.

Ewart, Chris, "Terms of Disappropriation: Disability, Diaspora and Dionne  
Brand's What We All Long For", in *Journal of Literary & Cultural  
Disability Studies*, Volume 4, No. 2, 2010.

Said, Edward W., "Intellectual Exile: Expatriates and Marginals", in *Grand  
Street Journal*, Issue 47, 1993.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i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o.1, 1991.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heriphery as the centre", in *Daedalus*,  
Volume 120, No. 2, 1991.

### **Magazines**

Han, Su-yin, "Social Changes in Asia", in *Eastern Horiz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1, No.2, August 1960.

Russell, Maud, "Why Do Chinese 'Refugees' 'Escape' to Hong Kong?", in *Far  
East Reporters*, 1960.

### **Newspaper Article**

Song, Ong Siang, "The King's Chinese: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in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1936.